



甘肃史志

2013. 2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2013年6月25—2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一行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的陪同下，先后赴庆阳、平凉、兰州、天水等地调研指导地方志工作（6月27日全省地方志工作汇报会现场）



朱佳木、李富强同志到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资料室调研指导



朱佳木、李富强同志看望省史志办干部职工

地方史志工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钱 旭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的竞争。文化力量是竞争优势中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模仿复制的核心力量,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就我省来说,随着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包括地方史志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同时,丰富的地方史志资料还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信息,在制定规划、项目建设、开发资源、减灾防灾、发展旅游业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地方志作为官修的“地情书”,是外地客商了解甘肃、认识甘肃、考察甘肃的重要窗口,也是我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在宣传甘肃、推介甘肃、发展甘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当前,我省地方史志工作面临许多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党的十八大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摆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之中,为我们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提供了政治保障。二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颁布实施,使地方史志工作走上了依法管理、健康运行的轨道,为我们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我省地方史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我们做好地方史志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地方史志工作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要求更

高了。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省委提出建设文化大省,这对地方史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地方志工作如何为文化强国、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服务,特别是如何在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二是任务更重了。以往的地方史志工作仅限于编修一本志书,而在新形势下,则要求地方史志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拓展工作领域,在编修志书的同时,整理校注旧志、编辑综合年鉴、开发利用地方史志资源、实现地方史志资源的信息化、建设方志库(馆)、开展读志用志活动等,任务非常繁重,我们的工作思路和办法措施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三是时间更紧了。按照规划,我省要在“十二五”末完成二轮修志任务,但就进展情况看,二轮修志从2004年开始以来,截止目前,规划的72卷省志只出版了4卷,14部市州志只出版了3部,85部县区志只出版了29部,完成率仅为21%。到“十二五”末只剩下不到三年了,时间相当紧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修志编鉴为重点,以资政服务为动力,在地方史志资源开发利用上寻求突破,在信息化和库馆建设上加快步伐,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提升能力,努力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 14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地方史志工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 钱 旭

特 载

朱佳木同志在甘肃调研考察和指导工作

..... (4)

领导讲话

注意防止倾向性问题

巩固和发展地方志事业大好形势

——在 2013 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朱佳木(6)

史地考证

伏羲生于成纪新考(下) 马志荣(15)

试论陇南古道在古蜀道中的重要地位 魏泽民(25)

庆阳周祖不窟城考辨 李忠祥 李天琛(33)

经验交流

修志行文随笔 张志纯(37)

旧志整理

现存三种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版本考辨 ... 王立明(41)

历史回眸

今昔肃王府(下) 安文迟(43)

录

甘肃民国大事记 (53)

张仲良在庆阳的足迹 李培蕾(59)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镇原 何等强(63)

陇原人物

朱太岩小传 朱令昕(66)

丁益三传 沈明江(69)

乡土民情

武山秋歌 陆胤 唐吉林(73)

康乐地方名吃 马晓春(75)

志苑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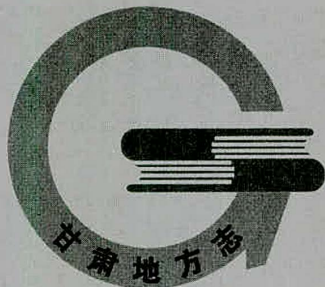
西行敦煌 张世民(78)

简讯

酒泉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精神... (12)

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召开(34)

《嘉峪关志》出版发行(22)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期责编:陈 谦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 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朱佳木同志在甘肃调研考察 和指导工作

2013年6月25—2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一行到甘肃调研考察,指导工作。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陪同调研。朱佳木同志一行考察了庆阳、平凉、兰州、天水等地的地方志工作和历史文化。

6月27日,朱佳木同志到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看望干部职工,并听取甘肃省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

汇报会议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俞建宁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李富强出席汇报会。俞建宁同志简要介绍了甘肃省情及近年来省政府加强和推动地方志所做的主要工作。李虎同志代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汇报了全省地方志系统基本情况和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李虎同志说,甘肃是全国编修新志较早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关怀指导下,全省地方志工作系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志为主体、史志年鉴多元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和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思路,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为主要抓手,全面推进地方志工作业务建设、制度建

设、基础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在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和与各市州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的推动下,全省工作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朱佳木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朱佳木同志首先代表陈奎元同志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向全省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朱佳木同志对甘肃省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甘肃第一轮修志总体完成,第二轮修志进展顺利,旧志整理、地情资料开发和服务社会工作也都做得有声有色。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全省地方志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通过调研,我们感到甘肃地方志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规格很高,省长亲任主任,省上“四大家”、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市州行政一把手参加,阵容强大;二是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绝大多数独立设置,这样有利于职能发挥,这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三是以省政府名义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并与各市州签订目标责任书,充分说明省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四是在正常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着眼于对重大事件的记载,组织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

和灾后重建志》，有效拓宽了地方志工作业务。

朱佳木同志就进一步做好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以更高的热情来对待地方志工作。地方志是记述自然、社会、历史、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甘肃历史积淀丰厚，自然形态多样，甘肃地方志所记的内容非常丰富。自然方面有黄土高原、大漠戈壁、山地草原。具体说有黄河、石林、丹霞地貌等等。社会方面有好多东西为甘肃所独有，如伏羲文化、农耕文化、秦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等等。同时甘肃还有许多历史人物和时代代表人物。这些都为地方志工作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深入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地方志工作者肩负着重要使命，一定要以更加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地方志工作，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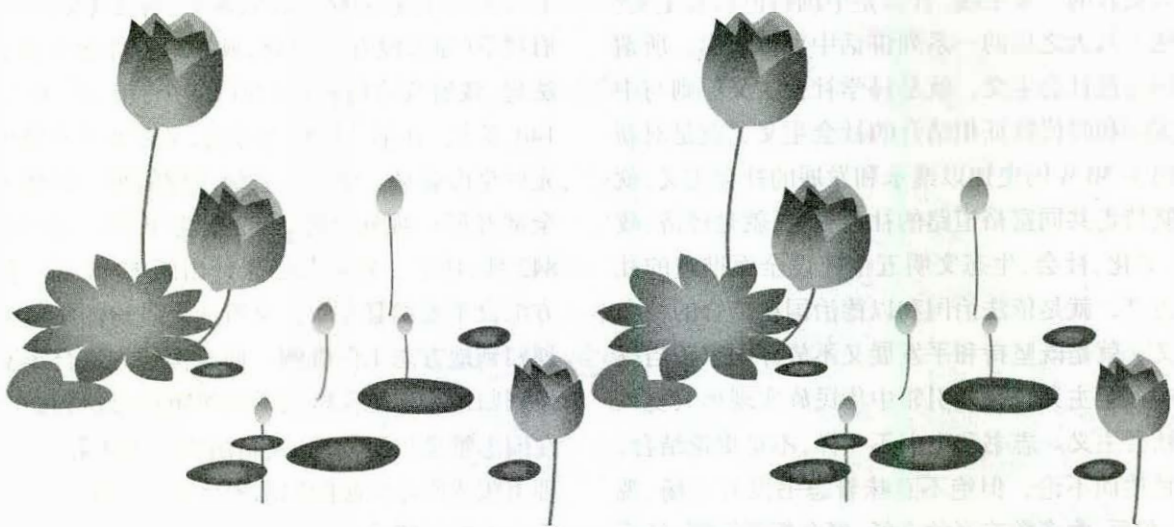
二是以更高的责任感来对待志书的质量。志书不是畅销书，但却是最具保存价值、最有生命力的书籍。要树立质量意识。包括旧志整理和年鉴编辑，都要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千方百计保证质量。省史志办不仅要保证自己编纂志书年鉴的质

量，还要抓好市州县区志书年鉴的业务指导。要尽可能参与市州县区志书年鉴的评议审定，确保各级志书年鉴的质量，多出精品佳作。

三是以更高的自觉性来对待方志开发利用。搞好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地方志事业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发利用最好的手段就是建设方志馆和网络。要把握好方志馆的定位。方志馆应当是国情地情展示和宣传教育的场所。要运用沙盘、模型、展板、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使其成为国情地情教育无以替代的重要场所。方志资料上网，地方志工作才能走向大众。网站建设要加快速度，并不断完善。

李富强同志充分肯定了甘肃近年来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李虎同志主持志办工作近两年来各方面工作都很有起色。希望省志办全体职工在志办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发奋努力，扎实工作，多出志书，做出更大的成绩。

汇报会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广智会见了朱佳木同志一行，就进一步做好甘肃省地方志工作交换了意见。



注意防止倾向性问题 巩固和发展地方志事业大好形势

——在2013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4月12日)

朱佳木

同志们：

2013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今天在历史文化名城郑州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陈奎元同志，向与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全军和武警部队，以及副省级城市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向列席本次会议的澳门特区文化局的官员及有关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向一贯重视和支持地方志工作的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以及为举办本次会议付出辛勤劳动的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的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是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背景下召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进行的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他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就是对新中国头30年历史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建设全面推进的社会主义，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就是既坚持和平发展又不放弃国家正当权益的社会主义，就是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志书和史书不一样，不是史论结合，而是述而不论，但绝不意味着志书没有立场、观点。相反，大多数志书的立场、观点都很鲜明，只不

过立场、观点寓于记述之中罢了。第二轮修志的内容已深入改革开放时期，更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十八大精神，以进一步端正观察问题、判断是非、遣词造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指导、检查、总结、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

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到现在已四年多。四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在各地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深入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大力开展第二轮修志、年鉴编纂、旧志整理、理论研究、读志用志、人员培训等工作，使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过去四年，在地方志工作法制化建设方面，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又有2个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原有4个），8个制定了政府规章（原有10个）；50个有立法权的城市中，有1个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原来没有），有9个制定了政府规章（原有1个）；30个有立法权的自治州中，有2个制定了政府规章（原来没有）。至此，颁布地方性地方志工作法规、政府规章的省份已有24个，市、县、区已有140多个。在第二轮修志方面，又有8个省级单位先后全面启动，使全国省级单位的第二轮修志已全部开展；规划中的5882部志书中，又出版了842部，使第二轮志书已累计出版1348部。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方面，又有3个省份的年鉴工作计划归到地方志工作机构，使全国地方综合年鉴工作计划归到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省级单位已达到26个。在旧志整理出版方面，又新出版了400余部，使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的旧志累计达到2000余部。在地方志网站建设方面，又新开通省级网站7个，市

级网站 81 个、县级网站 212 个,使省级网站达到 26 个,市级网站达到 196 个,县级网站达到 471 个,合计 693 个。在方志馆建设方面,又新建成省级馆 4 个、市级馆 22 个、县级馆 80 个,使省级馆达到 13 个,市级馆达到 53 个,县级馆达到 190 个,合计 256 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有的方志馆还有名无实,就是说,还没有像样的成规模的建筑,或者虽有建筑,但主要是放书,实际是志书馆。

过去四年,由国务院交办的新中国第一部国家层级的专门志《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经过数百个参编单位的共同努力,已按计划完成了全部 11 卷的编纂和初审、复审工作,形成 1500 万字的终审稿,进入终审验收阶段,可望于今年内出版。由中指组办公室主持编纂的《方志百科全书》,已完成大部分编写任务,有望今年内成书。中国地方志协会完成了换届,并经国家民政部审批,将“协会”更名为“学会”。中指组办公室和中国地方志学会联合建立了地方志学术年会制度,并先后在宁波和南通举办了两届年会。中指组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下,开展了地方志系统第二次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活动,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中指组办公室还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海内外好评,扩大了地方志文化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表明,我国新编地方志事业在已有基础上,正步入一个全盛时期。

但是,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越是在集中力量解决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越要注意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毛主席讲过:“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64 页)现在,大家都承认,地方志事业的形势是好的光明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在大好形势里,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存在不少或明或暗、或浅或深的倾向性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

比如,从全国范围看,既存在忽视方志理论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倾向,也存在忽视志书编纂的倾向;既存在忽视志书质量的倾向,也存在忽视修志进度的倾向;既存在忽视尽力收集资料的倾向,也存在忽视精选精编的倾向;既存在忽视自身特点的倾向,也存在忽视统一规定的倾向;既存在忽视改革创新倾向,也存在忽视总结经验、继承传统的倾向;既存在忽视履行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等行政职能的倾向,也存在忽视提高自身编纂业务水平的倾向;既存在忽视人员培训的倾向,也存在忽视人员选配的倾向;既存在忽视解决地方志工作中实际困难的倾向,也存在忽视尊重志书编修客观规律的倾向。对于这些倾向性问题,我们都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过去老话讲,“成绩要说够,问题要说透”;“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当然,成绩还是要说,不说,看不到成绩,也会影响信心。但看不到问题,则可能使小问题酿成大问题,更有危险性。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8 页)“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9 页)他还说过:“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96 页)在座的各位,都是省级、副省级单位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作为领导,头脑中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忧患意识”,而且,看问题要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解决问题要比别人抓得更准一些、办法更多一些。只有这样,才能挑起带领大家不断前进的担子,使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得以巩固和发展,使地方志事业做到可持续发展。

要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使问题的一面向解决的一面转化,首先需要深入学习和领会《地方志工作条例》,不断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在 2012 年宜昌召开的全国主任会议上曾

提出要增强十个方面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认真学习 and 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增强观察和预见问题的能力,注意防止倾向性问题,以巩固和发展地方志事业大好形势。在今天的全国主任会议上,我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一、在防止忽视方志理论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修志的倾向

在中国漫长的修志史上,修志机构和修志人员里的主要工作,曾有很长时间就是编修志书,此外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然而,随着时代和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各地为开展地方志工作普遍设立专门机构,地方志工作的内容早已突破单纯修志的旧框框,逐渐丰富起来。为了适应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更加方便广大读者的读志用志,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地方志工作机构在编修志书的同时,纷纷用各种形式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最初是编修简志,撰写地情书,在报刊和电视等媒体上开辟地方志知识专栏。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建立,各地开始将志书数字化、办地方志网站、建地方志数据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地方开始建方志馆,并通过沙盘、展板、实物、多媒体等手段,将志书中有关地情的内容加以展示。为了探索和把握地方志工作的规律,构建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又积极开展旧志整理和方志理论研究,并为此创办刊物,撰文著书,举办各种研讨会。由于这些新开辟的工作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被《地方志工作条例》纳入到地方志工作机构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中。近来,有人对新编地方志工作内容作了各种概括,例如,志、鉴、网、馆、研、库、用、书、会、刊,等等。总之,地方志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编纂志书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都充分认识到了新形势对地方志工作的新要求。有的仍然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编纂志书这一件事上,尤其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纷纷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以后,理论研究和撰写文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为此,我曾多次强调,

对于地方志工作机构来说,志书出版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的一半,还有一半工作是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等工作。我还在第四次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编纂《方志百科全书》,建立方志学术年会制度,并提议将“地方志协会”改名为“地方志学会”。后来,我又在南京召开的2010年全国主任会议上提出要把各级方志办建设成为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方志办;在2012年南通召开的第二届地方志学术年会上,着重强调了当前加强方志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今后,我们要继续花大力气抓紧抓好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方志理论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还有大量应当做也可以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不过,近些年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忽视修志工作,甚至只顾理论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而把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编纂志书撇在一边。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再搞“一本书主义”;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也不能搞“没有书主义”。方志理论研究也好,读志用志也罢,首先要有志。“九业”并举也好,“十业”并举也罢,修志永远是地方志工作的主业。离开了志书编纂,地方志工作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结果都会“归零”。道理很简单,地方志工作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从志书编纂中派生出来的。当然,没有新编志书,方志理论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也可以搞,但其对象只能是旧志。如果是那样,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就足够了,用不着再成立地方志工作的专门机构。所以,上述两种偏向,我们都要注意,都要防止,都要克服。

二、在防止忽视志书质量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修志进度的倾向

志书的生命在于质量,这是志书性质决定的;新编地方志要格外注意质量,这是新编地方志编纂方法决定的。志书不是畅销书,甚至是很不畅销的书,但它绝对是权威性和生命力最强的书之一。如果志书在史实或其他任何一个方面出现质量问题,都会遗患子孙后代,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新编地方志不再像旧志那样,仅由少数几个学者编

修,而是由包括政府各部门在内的众多单位出人参与撰稿,由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组织、指导、检查,即人们常说的众手成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特别重视质量问题,对各单位提供的稿子不予以严格把关,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出现重大质量事故。

第二轮修志刚开始时,也就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各地的主要倾向性问题是按兵不动,有的地方甚至撤销了修志机构。那时,我到各地调研强调的主要是修志不能间断,凡首轮修志任务完成的,要抓紧启动第二轮修志。后来,各地通过贯彻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陆续下发了政府文件,召开了动员大会,开展了第二轮修志。但在加快修志进度的同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急于成书的倾向。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地方志工作机构自身不正确的政绩观在起作用,也有领导部门要求尽快见书和财政经费划拨制度改革的原因。为克服这种倾向,我在前些年反复强调,第二轮修志要“四快一慢”,即启动要快,谋篇布局要快,组织培训队伍要快,拿出初稿要快,但定稿出书要慢。因为,根据首轮修志结束的大致时间和《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每隔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规定,第二轮修志结束时间大体在2020年前后,时间还比较充裕。志稿拿出后,不必急于出书,而应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否则,一旦出版,发现差错,再版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追悔莫及,“望书兴叹”。现在,这种急于出书而忽视质量的倾向仍然存在。比如,方志出版社的精品志书出版工程已实施八九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堪称精品的志书。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高质量的志稿不多,恐怕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有人认为,从已出版的第二轮志书看,总体不如首轮志书的质量。这个意见很值得我们注意。

然而,现在也存在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动作过慢,完全忽视进度。例如,有的市县至今还没有启动第二轮修志,更没有组织和培训队伍;有的虽然已经启动了七八年,但至今拿不出初稿。世界万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每个具体事物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对于任何一项

工作来说,好和快都是对立的统一,只讲快不讲好不行,只讲好不讲快也不行。如果修志只讲质量不讲进度,超过了时限,同样违背事物的运动规律。何况有些志书不仅编修进度慢,而且质量也不高,只能用“少慢差废”四个字形容。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首轮修志扫尾的问题。早在2001年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首轮修志工作基本完成”的概念,其标志是出版的志书已占规划志书的75.8%。到2008年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时,出版的志书大约占规划志书的90%左右,尚有16个省级单位的规划志书还没最终完成,所以,提出“首轮修志进入扫尾阶段”的概念。在过去四年里,首轮志书又出版了100部,使完成率达到98.1%,就是说,目前仅剩2%的规划志书还没有出版。我请中指组办公室把这2%的情况作了一个统计,不包括西藏和浙江,涉及1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又对这12个省级单位的情况作了一下分析,发现其中山西、江西已决定将剩下的几部市志、区志和省志分卷与第二轮修志合并;北京剩下的15部市志,12部已交付出版,另外3部最近也已通过终审;福建、海南和新疆剩下的几部省级志书均在付印之中;内蒙古剩下的22部省级志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剩下的2部省级志书,要么已通过终审,要么正等待终审。就是说,以上8个单位,在今年年底前都可最终完成首轮修志。在其余4个单位中,河北的省志中还有2部未完稿,贵州省的省志中还有1部未完稿,甘肃省志中的《总目录》刚完成初稿。另外,青海省的西宁市志还未出版的29部志稿中,12部已交付出版或通过了终审,只有14部未完稿,3部未启动。就是说,到今年年底仍然会留“尾巴”的,顶多只有省级志书4部、市级志书17部,合计21部,占首轮修志规划5987部的0.35%。届时,这21部志书可以和第二轮修志合并;即使不合并,我们也可以就此宣布首轮修志全部结束。

从首轮修志遗留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度同样不能放松。否则,个别单位就会拖整体的后腿,局部就会影响全省甚至全国。

现在,第二轮修志离截止时间还剩七年左右。从全局看,时间已不算宽裕。凡是还没拿出初稿的单位,要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凡是拿出初稿的单位,应当抓紧统稿、评审、修改。从2015年起,第二轮修志应在总体上进入终审、出版阶段。另外,从首轮修志的情况看,有个别地方确实不具备修志的基本人员和条件。对于这类地方,要从它们的实际出发,不要硬性下达修志的指标。可以考虑,修志力量较强的地方在完成本身修志任务后,以省为单位,抽出人力组成“修志专业队”,帮助缺少修志力量的地方修志。

三、在防止忽视资料详尽收集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资料精选精编的倾向

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因此内容要完整,横不能缺要项,纵不能断主线。而要做到这些,资料收集必须尽可能详尽,收集得越多越全越好。有些部门在资料收集阶段下功夫不够,结果往往在编撰过程中陆续发现新材料,只好返工,反而耽误时间;有的在志书出版后才看到新材料,只好留下遗憾。磨刀不误砍柴工。忽视资料收集而着急编书的态度,显然是要不得的。

但是,收集上来的资料不等于都能入志,更不等于都要入志。志书在编撰阶段,必须对资料进行甄别真伪、选择轻重的工作。现在参与修志的部门,受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影响,往往愿意把本部门的资料上得尽可能多一些,使入志标准宽严失据。第二轮修志基本是续修,上下限不过20多年,但志书字数却越搞越多,有的甚至超过了时间跨度几千年的首轮志书。志书不是资料汇编,而是资料性文献,是应当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权威性、让人信赖的著作,必须按照文献书的要求精选精编,做到取舍有据、详略有度、编排有当,绝不能良莠不分、事无巨细、有闻必录,那样势必内容庞杂,浩如烟海,精华反而会被淹没,可信度反而会被降低。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的精炼,要惜墨如金。”(《地方志工作

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我过去也说过,写地方志应当像写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那样讲究,能省一个字就省一个字。现在一些志书一味堆砌材料,弄得轻重混淆、真伪难辨,使科学性、权威性大打折扣,以至于有的学术部门规定不能引用新编志书。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

四、在防止忽视自身特点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统一要求的倾向

目前,大陆地区纳入三级志书编修的行政区划,省级单位有32个,地市级单位有330多个,县级单位多达2860多个。这些地方情况千差万别,反映到志书的编修上,也不应该千篇一律。例如,在篇目设置上,有的志书要突出名山大川、证券业、乡镇企业等等,而有的地方则不需要;在体例上,有的地方要把轻重工业分别设卷,甚至设冶金、化工、能源、电子、航空航天卷,而有的地方则不需要;在体裁上,有的地方要加导游图,而有的地方则不需要;在编撰方法上,有的地方要采用课题制,而有的地方则不需要。总之,在这些方面,应当提倡因地制宜,大胆创新,突出特色,不必强求一律。

然而,内地新编地方志工作毕竟是一项由中央统一部署、整体推进的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中央批准,从省到市到县都设有常设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而且绝大部分纳入政府序列,有编制、给经费;在中央层面还设有非常设的指导机构,负责全国地方志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国务院还为规范地方志工作,于2006年专门制定了行政法规。可见,新编地方志工作并不是民间修志,而是国家行为。其实古代和近代中国的修志,基本上也是政府行为,即使政府不直接出面主持,也要在幕后支持,否则很难进行。当前港澳台修志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个事实。例如,台湾地区修志实行政府采购的方式,即文化行政部门招标,由学者组团竞标,中标的团队由政府协助收集档案资料,志稿形成后由政府组织评审。澳门修志工作启动虽晚,但由特区政府负责提供经费和档案,因此进展顺利。而香港修志启动较早,但

特区政府没有介入,结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既然新编地方志是国家行为,总要有一些统一的规定,对统一的规定总要有所遵守。在这个范围内,不能也不应当各自为政。

例如,关于第二轮志书的上下限问题。中指组在《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第二轮志书的上下限“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个规定是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关于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和首轮修志的实际截止时间,以及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开启时间而作出的。但一些地方的第二轮志书,却将上限推至上世纪90年代或更晚,将下限延至2010年前后,据说有的下限计划延到2020年。这不仅混淆了志书与年鉴的区别,没有让志书内容经过必要的历史沉淀,而且也挤占了第三轮修志的空间,给今后实行“20年一修”的规定带来困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首轮修志结束时间晚,所以把第二轮志书上限放在上世纪90年代,下限只好相应后延;有的则为了能把第二轮修志期间的政绩写进去,所以志书下限尽量向后延。其实,遇到第一种情况,完全可以不拘泥于首轮志书与第二轮志书上下限的衔接,时间上有些交叉没有大碍。至于第二种情况,牵涉历史观、政绩观问题,对此,在下面还要专门讲。首轮修志由于历史原因,对志书下限没有作出统一规定,不整齐可以理解。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利用第二轮修志的机会,把它调整过来,使全国志书的上下限尽早统一,不使这种混乱状况继续延续下去。这是国家修志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过分要求。

再如,关于志书名称问题。《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中指组制定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都明确,县以上地方志书只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如“××省志”、“××市志”、“××县志”;以分志、分册等形式单独出版的地方志书,名称前冠以省、市、州等志名,中间加间隔号,如“××省志教育志”;续修地方志书名称后要标明上下限名称,如“××县志(××××—××××)”。但一些地方在志书名称中仍加“通”

字,如“××通志”。叫“通志”并无原则错误,古代就有叫“通志”的,然而既然中指组文件已明确规定志书名称不加“通”字,就应当照此执行,否则,都是政府主持编纂的地方志书,有的有“通”字,有的无“通”字,摆在一起,很不整齐,观感也不好。我希望尚未出版的志书严格执行中指组的规定,一律取消“通”字。

再如,关于志书开本问题。《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明确,志书一律用大16开本(889×1194),但有的地方却将志书印成16开本。如果各地志书放在一起,有大有小,有高有矮,观感肯定好不了。这虽然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也应当上升到新编地方志工作性质的高度加以认识,不应我行我素。

我现在强调的是国家修志该统一的要统一,其实,即使民间修志,也不能随心所欲,该统一的也要统一。例如,述而不论、生不立传等原则,只要是志书就要遵守,否则就不是志书,而是别的东西了。

五、在防止忽视创新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传承的倾向

在2011年深圳召开的全国主任会议上,我着重谈了地方志工作的创新问题。我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谈创新,国家要建成创新型国家,高校要办成创新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地方志工作也要弘扬创新精神,并且具体讲了制度上、体制机制上、工作内容上、志书编纂上、资料收集上、质量管理上、学科理论上、资源开发利用上、队伍组织与培训上等九个方面的创新;在志书编纂的创新上,又讲了指导思想、篇目设置、体例规范、编纂方法等四个方面的创新。修志作为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反对因循守旧、一切照搬传统的做法。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创新与传承割裂和对立起来。真正的创新,从来都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不总结和继承前人经验的所谓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花拳绣腿。我在2011年深圳会议上就说过:“创新并不是随心所欲,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对前人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对客观规律进行深

人探索,并从事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把创新精神与科学精神、求实精神、虚心学习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折不挠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现在,有的同志片面理解创新,为创新而创新,不重视总结和汲取首轮修志的经验,不学习、不领会《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这些首轮修志经验的结晶,就在那里搞所谓创新,这是很危险的。对于前人成功的经验,后人要做的首先是继承,然后才谈得上创新。对于前人失败的教训,后人也要先总结,弄清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如何避免前人的错误,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谈得上创新。几千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修志人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都应当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以便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六、在防止忽视履行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等行政职能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编纂业务水平提高的倾向

前面讲到,当代新编地方志面对的是古代、近代都无法比拟的极为丰富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新编地方志工作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由少数专业人员编修,而要动员政府各部门和一些重点企业、事业单位都来参与。《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第一项职责,正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因此,地方志工作机构把大量精力用在组织、指导、督促、检查参编单位的编修质量和进度上,是它的职责所在。如果地方志工作机构只顾自己埋头编修志书,忽略对同级各参编单位修志工作和下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的组织、指导、督促、检查,不认真开展人员培训,不主动联系法制部门对修志进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自己承编的志书写得再好,也是失职。

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志工作机构只满足于组织、指导、督促、检查其他部门的修志,而忽略自身编纂业务水平的提高,其组织、指导、督促、检查工作也是搞不好的。不错,地方志工作机构不

能再独自“包打天下”,但也不能把编纂业务完全交给别人,自己一点不搞。比如,县志和市志中的综述和大事记,总要以自己来写;省志的概述卷、大事记卷等综合类部分,总要以自己为主地写。再如,市县和一些省,分给各部门各地区撰写的志稿,自己都要统稿和审稿。另外,即使自己不撰稿,也不统稿,总要谋篇布局、对各单位参编人员进行培训。如果自己脱离编纂实践,不懂编纂业务,又怎么能搞好志书的谋篇布局和人员培训呢?又怎么能真正做好修志的组织、指导、检查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完全脱离修志,只满足于对别人的组织、指导、督促、检查,长此以往,就会发生地方志工作机构是否还有必要独立存在、是不是要并入其他相关部门的问题。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着想,地方志工作机构当然是以独立设置为好。既然如此,在下一轮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中,地方志工作机构就不能把编纂业务剥离出去,而只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如果那样,今后要想保留地方志工作机构,我看是很困难的。

七、在防止忽视人员培训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人员选配的倾向

地方志工作特别是修志工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新入地方志工作机构和被吸收参加修志工作的人员,都应当进行上岗培训,有时还要培训多次。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业务培训,致使一些参加地方志工作多年的人,连修志的基本文件都没看过,基本知识也不清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并设法给予纠正。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些地方的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把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志书参编部门组建的修志班子,当成是安排人的去处。例如,看到有的同志资格老了,要解决级别晋升问题,别处没位置,便往地方志工作机构放;看到有的同志在原岗位不适应,正好修志需要人,便往修志班子里塞。这些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当然,没做过地方志工作的人,干几年也可以熟悉地方志工作,也可以成为内行。但地方志工作机构和修志班子毕竟是具有较强业务性的地方,如果频繁调动领导,经常安排一些缺乏必要基础的人员进来,势必影响地

方志队伍的素质和修志工作的质量。我在下面调研,常有一些方志办的领导诉苦,说自己机关里真正能干活的人只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所以,我们既要通过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也要通过严把进人关,从源头上解决人员不适应的问题。

八、在防止忽视解决地方志工作实际困难的同时,也要防止忽视修志客观规律的倾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编地方志工作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及其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和“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工作经验。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和这些做法都是符合我国地方志工作实际情况的。但过去在很多地方、很长时间内,这个体制和这些做法坚持的并不好,地方志工作中的很多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

自从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领导不仅对地方志工作普遍比过去关心了,给地方志工作的经费普遍比过去充裕了,而且很多领导开始重视修志工作,经常过问志书的编纂情况。这本来是很好的现象,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扰。有个别地方、个别领导,对修志工作名为“关心”,实则干预。比如,希望志书多写些本地和本人的政绩,少写些失误与不足;希望志书的下限尽可能把自己的任期包括进去,使自己的名字、照片、履历能出现在志书上;希望在自己调任或退休前见到志书出版,等等。在这种“关心”下,有的志书在组织机构篇中大量收录各级领导的姓名和简历;有的志书借“人物简介”为领导干部树碑立传。所有这些都是党风不正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反映,是不正确的历史观、政绩观在修志问题上的表现。

再有,现在很多地方给地方志工作的经费比过去多了,但对修志进度的要求也比过去死了。有的地方志工作机构为了适应财政拨款制度,在作预算时把志书出版时间说得比较早,结果明知志书质量不行,因怕经费被收回去,只好硬着头皮出

版。

上述现象在首轮修志时是不多见的,也是违背地方志编修规律的。章学诚说过:“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就是说,志书本质上是一种史书,应当对历史和公众负责,修志人必须秉公、公正,不能为私、徇私。我们常说志书是“官书”,指的是它代表政府的立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并非说它是“官员”的书,或者是政治类、宣传类的书。如果把志书弄成为领导干部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书,修志就走歪了,变味了,就不是地方志了。对这种歪风,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另外,地方志工作机构自身也要端正对志书性质的认识,不要把志书当成一般宣传品,不要请领导或名人为志书题词,不要用宣传的口吻撰写志书。至于应对财政拨款制度的改革,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预算水平,另一方面要多宣传修志工作的特点,争取财政部门了解修志工作周期长、变数多的规律,使拨款办法更适合于修志的实际。

以上,我一共讲了8对问题,每对问题的前一个是我们已经注意和正在解决的问题,后一个是需要引起注意和设法防止的问题;前面6对半问题的解决和预防主要靠地方志工作机构自己,后1对半问题的解决和预防则需要得到有关领导和领导部门的支持。

我讲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它们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更不是说地方志工作的形势不好了,而是为了提醒大家在充分认识大好形势的同时,看到虽然不很明显但却客观存在着的有可能妨碍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的倾向性问题,并想办法把它们及时制止在萌芽状态,不使之发展成为主要倾向,影响和损坏地方志工作的大好形势。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要我们心热头冷,深图远虑,未雨绸缪,常抓不懈,就一定能有备无患,继往开来,把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下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志书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新编地方志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是传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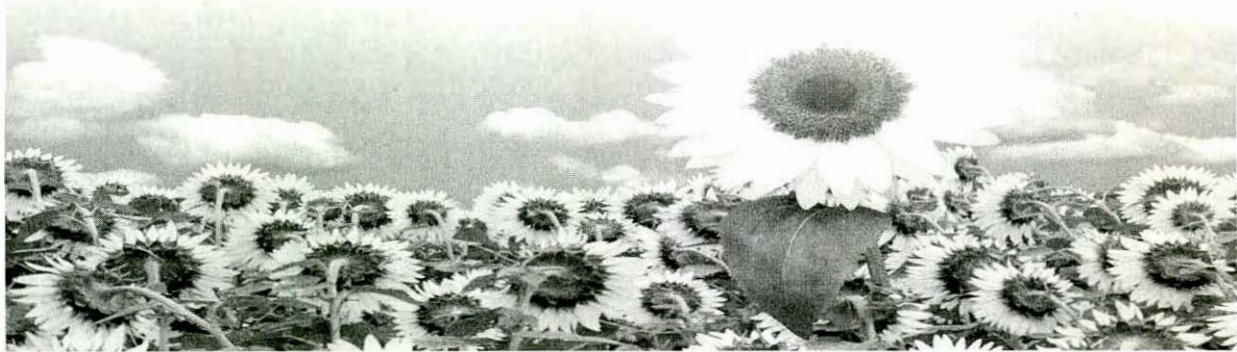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连接海内外炎黄子孙文化血脉的重要纽带,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就要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现在,距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还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用优异成绩迎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召开!

酒泉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精神

3月28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结束后,酒泉市参会领导立即向市政府市长、市史志编委会主任康军做了专题汇报。康军市长对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加快酒泉史志事业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做了专门批示。批示指出: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下,全市史志研究人员辛勤努力,编纂出版了《酒泉市志》、《酒泉通史》、《酒泉人口史》、《酒泉民族史》等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史志文献,为传承历史文化、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官书”、“官修”、“官责”的史志意识,增强做好史志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领导、靠实责任,健全机构、保障经费;努力抓好志书编修、政府综合年鉴编纂、地情资料库和地情信息网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广大史志工作者

要继续发扬忠于历史、勤奋敬业的精神,深入挖掘、研究博大精深的酒泉历史文化,系统记载酒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多出研究成果,多出精品佳作,为可持续发展资政,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精神食粮,为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将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康军市长的批示贯彻好、落实好,酒泉市政府于4月3日召开了全市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各县市区分管副县长(市区)长、史志办主任,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驻酒各单位分管负责人1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回顾和总结了十年来史志工作,研究解决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安排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史志工作的重点任务,并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酒泉市副市长、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柴绍豪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伏羲生于成纪新考(下)

马志荣

(接《甘肃史志》2013年第一期)

(四)大地湾文化的伏羲文化特征及其初始意义

《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虽然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但是反过来说一种文化能够在其发生、发展地发现与其相一致的文化现象，就可以认定创造文化的人与产生文化地区的关系。因此，伏羲文化产生在伏羲出生地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从大地湾遗址发掘的大量珍贵文物和遗迹来看，与伏羲时代和伏羲文化相吻合，而且大地湾文化更具有明显的初始性质。

1. 龙文化和大地湾

龙是中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图腾之神，是伏羲部落的徽号，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北宋《太平御览》引《帝系谱》曰：“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这和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庖羲生于成纪，蛇身人首”的记述相同。伏羲蛇身人首的形象隐喻着伏羲部族是以“蛇”为图腾。伏羲风姓的“风”从虫，《说文》有“风动虫生”的解释。在甲骨卜辞中，“虫”和“巳”为同一个字，而“巳”就是蛇。在十二生肖中蛇就是用“巳”来表示。《山海经·海外南经》有“虫为蛇”之说，所载的龙是能乘骑的，名曰“龙鱼”。在略阳古城，人们至今把“蛇”叫长虫。距今约7800年的大地湾遗址所处的山梁至今一直称“长虫梁”。可见，蛇就是简化了的龙形象。（或者是龙的早期形躯）伏羲是“蛇身人首”的形象，出自“蛇”氏族的标记，同时说明伏羲时代的伏羲部族曾经是以“蛇”为图腾的，伏羲的“蛇身”实际上是龙身。伏羲是龙的化身，部族的图腾是龙，“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北宋刘恕《资

治通鉴外纪》曰：“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端，因而名官始以龙记，号曰龙师。命朱褒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混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畴。粟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源。又名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

在以龙名官和以龙为图腾的伏羲时代，伏羲部族沿渭河东徙并建立政权于陈。同时，由黄土高原沿渭水和西汉水向东向南的中原大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流动迁徙，经过一个漫长时段的交融和渗透，陕西、河南以及黄河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许多部族被逐渐征服和兼并。随着部族的大交融，伏羲氏族在自己的原始龙图腾中融入了其他部族的马、牛、狗、鹿、鱼、鸟等图腾，逐渐形成了由多图腾组成的龙图腾，伏羲也就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龙。这样，龙图腾成了伏羲文化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龙文化。几千年来，在龙图腾的旗帜下，构成了华夏民族大团结的纽带，龙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历代帝王成了龙的化身，以龙为其符印，在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上都刻画着龙的标志。龙文化成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精神支柱。

伏羲部族留给中华民族的龙图腾传承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和富有魅力的龙文化，深深地积淀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而经久不衰。在中国神州大地，以龙字命名的人名地名、山川河流、亭台楼阁、寺观庙宇等不计其数，举不胜举。从物质世界到精神天地，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俗，龙无所不在，中华大地几乎是龙的世界。

龙的形象经几千年中华民族的锤炼,已成为牛耳马齿、鹿角虾须、鱼鳞蛇身、狮鼻虎爪的虚拟生物,坚忍不拔,威武雄壮,从而成为中国人的象征,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龙有着不可替代的牢固地位。无论何时何地,“龙的传人”这一口号始终是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寻根觅祖的归结点和民族团结的黏合剂。从伏羲及其而下的炎帝神农、轩辕黄帝、勾芒、共工、颛顼、祝融等远古英雄到现代的人民大众生活,都继承了龙图腾的精神之所在;浩浩荡荡的华夏历史长河,博大精深的远古传承文明,坚忍不拔的民族意志,无不汇集在这龙图腾的向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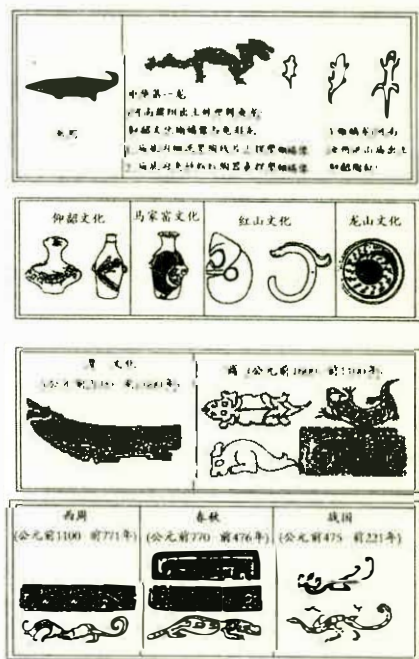
无独有偶,我们在前面已研究了大地湾“龙虎兽”,其特征正与近年来的一些研究相吻合。有些学者继闻一多先生的思路,在对一些少数民族历史遗存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伏羲氏早期是以虎为图腾的,甚至有些学者直接认为伏羲本人生就虎像(虎鼻山准),太皞之“皞”也是虎的意思。从大地湾“龙虎兽”的特征看,似乎也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大地湾“龙虎兽”的发现,使我们对龙文化、龙图腾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龙以蛇为母本、多种动物肢体组合的说法已成定论。但大地湾“龙虎兽”的发现无疑是对龙文化内涵的极大丰富。传统认为龙躯为蛇身,大地湾“龙虎兽”则是“鳞身”(鱼身)。“龙”以“蛇躯”为身的说法源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现能看到的是女娲伏羲人头蛇身的交尾图,是不是以此为据,断定女娲伏羲是“人头蛇身”,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建于西汉(公元前154-127年)的鲁灵光殿墙壁画中“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则应是一幅较早期的壁画,说明伏羲早期本来不是“蛇躯”,而是“鳞身”。所谓“鳞身”,应是指“鱼”,“鳞”字也从“鱼”。这也符合女娲伏羲时代的社会特征。伏羲时代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是充满母权和父权之间的激烈斗争,父权取得主导地位是经过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大地湾“龙虎兽”以鱼为躯,是这个斗争的妥协或者是过渡的自然反映。这也符合当时人的直观思维特点。人们对长足动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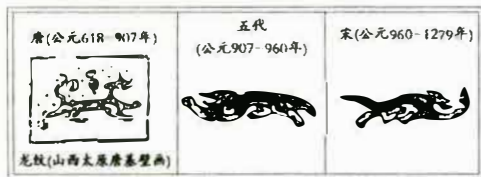
认识首先是兽类,把多种动物结合起来,应该是有对照物的。在传统文化中不见蛇长足的说法,相反把“画蛇添足”作为对某些人的讥讽,但给鱼添足者则不少。《山海经》应是我国成书较早的文献,它记载了许多长足的鱼和会飞的鱼,这与后世的龙水、陆、空三栖品质基本一致。由此可见,给鱼长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那么,龙是怎么成为长身躯的呢?这应该与鱼有关。鱼越大越凶猛,长也是大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地湾遗存中就有长躯体鱼(图8)。另外,大地湾“龙虎兽”的虎尾应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也是对鱼躯的延长,将其与鱼躯完全融合时,就成了有力量的长身躯。所有这些都与龙的品格相吻合。因此,应该说大地湾“龙虎兽”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附中国龙形态文化图)。



图8



丰富多彩的龙图纹造型(刘雁群著,伏羲庙志,2003)



丰富多彩的龙图纹造型(刘雁翔著,伏羲庙志,2003)

2. 阴阳现象符号化的发现及爻的形成

“阴阳”是伏羲“八卦”的灵魂,也是伏羲氏“观天法地”的成果。《易经·系辞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易经·说卦传》又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八卦。”这里说“仰则观象于天”,在观什么?在远古,不像现在观的东西很多,专门有天文学。远古观天象,就是观太阳,观察太阳运动与变化。所谓“俯则观法于地”,“法”就是规律,观法就是通过观察找到太阳照射到地球上,大地与万物自身变化与相互之间变化的规律性现象。“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就是观察鸟兽身上的花纹在太阳光下及不同生态环境下变化的情况,尤如“变色龙”之类的鸟兽更是观察的重点对象。所有这些就是观察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这些东西中间的规律找到了,“八卦”也就形成了。即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八卦”。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以人自身为主体,把身边的万物纳入人的感受中,通过类比分析,感悟其间异同,实现认识的升华。远古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极其有限的,与对自然的认识一样

存在着神秘感,许多认识是通过类比而获得的。“立八卦”的主体是人,便体现着人对天地万物的认知能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既是伏羲氏认识自然的方法,也是“立八卦”的基础。

(1) 阴阳现象符号的形成

大地在太阳的照射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这些现象每个人天天都在接触或感受着。要将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就需要将其符号化,如同太阳符号“+”一样。现在我们来“一”与“--”的形成。很简单,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光明,用“一”表示,就是阳;地势低凹的地方,太阳光不能照射得到,就没有光明(阳光),就暗。换言之“暗”即“阴”也,以“--”表示,这是个示意符号,两端平行的二个小平线,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太阳照射不到,就“暗”,就是阴。这就是告诉我们“一”、“--”就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这个抽象过程对人们的启示也是深远的。后来人们用古钱币占卜,就运用了这个原理。三个古钱币抛出去,一个正面朝上者为阳,以“一”表示;二个正面朝上者为阴,以“--”表示。这与阴阳符号生成何其相似。如果将“--”分开看,不就是二个“一”吗,也不正是古钱币的两个正面吗?

(2) 从阴阳符号到爻的变化

“一”、“--”独立成体,为阳,为阴;置于卦中则为爻。《易经·说卦传》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刚柔以生爻。”这里的阴阳当指广义的阴阳变化规律,是立卦的原理。伏羲八卦是自然界八种物质(物体)和自然现象。这八种物质(物体)与自然现象和人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人对其的感受也最深刻。它们的发生、变化,都与太阳(阴阳)的变化有关,也就是阴阳变化的结果,这是卦的本质。爻是卦的基本单位,它的属性是“刚”、“柔”。这个“刚”、“柔”也是源于阴阳的本质,是“观法于地”的产物。“一”、“--”符号的发生地是黄土地。黄土是颗粒状湿陷性的土质,易于下陷的地方,也就是生“阴”的地方,土质就疏松,当地称作“软”,即“柔”;不易下陷的地方,土质就硬,即“刚”。就是说“一”、“--”在卦中的本质属性同样源于对自然物性的认识与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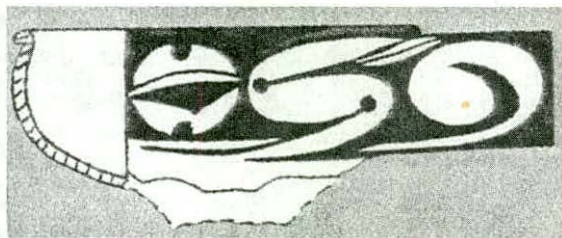


图 9

(3) 太极图的演化过程

有人说太极图是宋代形成的,本文无意去究其底细,但在大地湾遗存中发现了极似太极图的图案(图 9),这就有理由说,太极图的图案出现是比较早的,并且与阴阳消长规律相联系。我们已经知道,大地湾先民们在观察太阳时,发现了阳面多了,阴面就少了;阴面多了,阳面就少了的现象,久而久之,就有了“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的概念。要将这种规律用最简单的办法(形式)表示出来,并一目了然,人们就想到用图示表示的方式。我们在大地湾遗存中发现了这样的图式。就是一条直线将一个长方形图从对角分开,一边为阳(白色)一边为阴(黑色),将一个直线垂直置于其上,左右平行移动,就会表现阴阳消长的变化形态(图 10)。为了说明变化的不同形态,大地湾人将四个不同方向的上述图式组成四方阵式(图 11)。但这种表示方式较笨,不能有效地反映阴阳在运动中变化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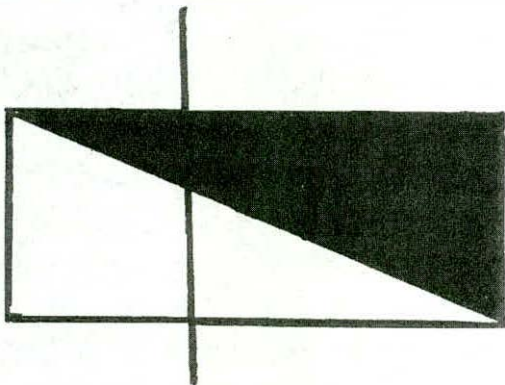


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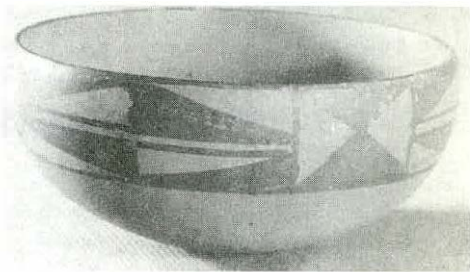


图 11

我们从图 9 已经知道,大地湾先民们已经了解了物体旋转和旋转可以改变物体视觉形态的现象。于是在长方形的阴阳消长图中中间打一个孔,置于一个作用相当于轴的物体上,让其旋转起来,就可以看到类似“太极图”的形态,将这种形态固定下来,就是原始的“太极图”。我们得知汉代较早的伏羲八卦图中中心是有孔的,且从上到下有一条直线(图 12)。这与大地湾“阴阳消长”图不谋而合。



图 12 汉代早期八卦图

(五) 先进的生产力创造了先进的文化

文化现象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伏羲文化也就离不开大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凭空产生。下面我们再看看大地湾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

1. 农业生产技术

大地湾遗址惊现了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黍”的碳化物,被证明是距今 8000 年前的“黍种”,说

明在大地湾农业发展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出土了骨耒、磨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先进农业的生产工具。诸多考古学者认为，大地湾是黍种植的故乡，是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农业生产是受自然力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有赖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适应，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要求伏羲联盟的代表人物——伏羲不断提升部落对自然的适应力。这就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动力。

2. 最早的彩陶技术

朗树德先生在《彩陶》一书中指出，“大地湾彩陶与世界最早出现彩陶的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争论多年的中国彩陶起源问题终有了答案，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彩陶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大地湾是中国彩陶的故乡”。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制陶的技术。陶器是水土火综合作用的产物，彩陶的制作技术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水、火、土性能及相互之间作用（反应）的自觉利用水平。可见大地湾先民们用水、用土、用火的技术在当时也是非常高超的，这对伏羲文化的核心——八卦的形成不会不产生重要的影响。

3. 高超的房屋建造技术

房屋建造是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大地湾 F901 宫殿式大屋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是一座非常了不起的早期宫殿。

F901 大屋建造在视野开阔、日照充足的半山腰，坐北朝南，是个结构复杂的组合式建筑，总面积 420 平方米，由前厅、主室、后室、左右侧室及前棚廊等六部组成，被专家称为“原始人民大会堂”。F901 大屋的建造充分展示了大地湾先民们对多项技术的掌握及综合运用的能力，这里就与本文论题有关几个技术进行简单的探讨。

(1) 先进的地理方位知识和测日技术。F901 大屋的地理方位很讲究，整个建筑面南偏西 30 度，正好是古人十分推崇的“昃”字位置，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综合考察，当时的大地湾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地理方位之类的知识，并有了自觉运用的意识，也说明当时的大地湾人已掌握了相当高

超的测日技术。

(2) 先进的计算技术。这么宏大复杂的大屋，其结构安排十分合理，没有相应的计算技术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尚不能知道大地湾先民们运用什么样的计算办法，但从几件遗物中使我们略见一斑。在 F901 大屋遗址中发现了一个“条形盘”、一个“铲形抄”、一个“箕形抄”。这几件遗物给我们惊人的启示：“条形盘”的测试容积为 264.3 立方厘米，“铲形抄”的测试容积为 2 650.7 立方厘米，正好是“条形盘”的十倍；“箕形抄”的测试容积为 5 288.4 立方厘米，正好是“铲形抄”的两倍。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大地湾的先民们已经发现并在使用“十进位”、“二进位”和“倍数”的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这与伏羲八卦二进位的概念何其一致。

(3) 建筑力学在远古运用的活标本。在远古肯定没有力学的概念，但大地湾的先民在本能地运用力学的原理。F901 大屋遗址总面积 420 平方米，主室面积就有 200 平方米见方，房高 6—7 米，大屋顶构件，仅靠室中心偏后的两根顶梁柱和四周的墙壁就支撑了这么大的屋顶，没有力学方面的经验是不可能的。F901 是大地湾晚期的遗址，即是其早期（7 800 年前）的“半地穴蜗形窝棚”式建筑，已经在朦胧地运用力的原理，“半地穴蜗形窝棚”地上部分为攒顶结构，在与地面接触部位，是以蜗形半地穴边沿内收一端的一根较粗的柱子为起点，其他较小的椽子沿蜗形半地穴边线旋转成圆形，顶部攒在一起（图 3）。这样既扩大了棚内的实用面积，其外伸一端又形同屋檐，将门遮挡起来以避风雨。这是大地湾人的又一亮点。

(4) 先进的工匠技术。F901 大屋高 6—7 米，屋顶面积 200 平方米，它的支撑体除了两个顶梁柱外，就是四边墙壁。这个墙壁也是高技术产物。墙体是以 142 根内柱为骨架，以小枝条为筋，编织成类似篱笆的“筋骨架”，层层涂上泥巴形成墙体，既有较强的承压能力，又能起到有效的防火作用。这种建筑方式与现代“钢筋水泥”结构的墙体何其相似。更使人惊叹的是其地面用料与技术，大屋地面十分平整，也十分坚硬，据压力测试，相当于 100

号水泥的强度,这样的技术出现在5 000多年前,可谓是奇迹。

(5)先进的用火技术和防火技术。大地湾人对火的运用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早期的“半地穴蜗形窝棚”的门口就有一个火坑,除了生活用火外,将火坑置在门口有利于冬天防寒,也有效地防御野兽在夜间袭击。使人意外的是,在火坑内壁上有一个小洞,据说是用作保存火种的设施。其办法是将火种放于小洞之中,洞口用炉灰封起来,减缓火种的燃烧,从而使火种保留下来。与现代人炉灰封炉火的办法一致。这项技术出现在远古,真是又奇又妙!在防火技术方面,大地湾F901大屋的柱子、树条墙壁都是用泥糊起来。此外,在大屋还有两个大陶器,如同北京故宫消防用的大水缸,可见大地湾先民们消防意识之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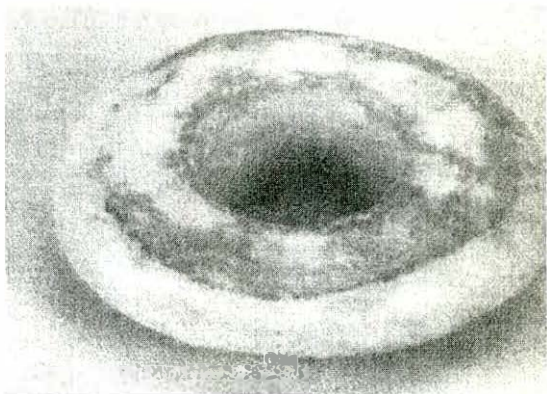
四、大地湾的王气与伏羲文化的发展路线

《易经》“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王”天下的文化无疑散发着“王气”。大地湾遗存中也发现了有关王者的遗物。F901大屋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的确有“天子临轩”的气概。就在这里还有一件遗物——“四足鼎”,系红砂陶器,虽然体积不大,但有“国之重器”的风格。此鼎圆形四个直足(图13),如同四根天柱撑起了圆形的天,与伏羲对天地的认识完全吻合。应是伏羲联盟的祭祀礼器。此外还有一件大理石做成的太阳形状的“权杖头”

图14 权杖头



图13 四足鼎



如果他们的主人手持权杖,不正是王者?(图14)。如此看来,这时的伏羲联盟已有了“称制”的苗头。与此相适应的是先进文明的工具(我们在前文已论及),文字也开始出现。在大地湾遗存中已发现类似文字的符号16个之多,视作太阳符号的“+”就在其中。

然而这个“王气”文化仍然是按照人类一般迁徙规律而发展。据实地考察,伏羲文化从发生到成熟是走了一条渐次南进的路线,并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地湾所在的略阳川水是葫芦河的支流,伏羲从这里沿河而下,来到是略阳川水注入葫芦河后第一个小盆地——小坑川(早期的显亲川)。据考察,从陇城(古略阳)到这里,曾经建过多座城池。这里就是汉成纪县治的旧址。《水经注》讲的女娲庙,就在这里的庙嘴上。据传说,伏羲在这里也曾撰(演)过八卦。这真是“天意”。看来伏羲很可能在这里既吸收了营养,也得到启发“天外有天”。于是沿河南下,就来到葫芦河入渭的三阳川,见到了更大的河,更大的川,卦台山吸引了他在这里驻足,继续演绎八卦,伏羲文化从这里走向成熟,传遍中华。更有意义的是,伏羲出生及其文化发生在略阳川,伏羲与女娲成亲及其文化南进的第一站在显亲川即阳儿川,建卦台于三阳川。从略阳川到三阳川,正好是“三阳”,是伏羲文化南进的早期三阶段。这恐怕不是巧合,与伏羲文化的内涵特征是有关联的。现在人们解释三阳川之“三阳”,一是“三阳开泰”说,二是“曾有一日见到三个太阳现象”说。现在看来,尚需进一步的探究——为什么伏羲氏生活过的地方地名都带有“阳”字。

五、汉成纪县考

(一)汉代成纪县旧治地小坑川考

千百年来,有许多人在书斋中考古,在故纸堆里寻祖,直至今日,对有关伏羲及其文化和古老文明起源的文字浩如烟海,众说纷纭。争辩存疑越来越多。有的仅仅凭借古典中只言片语将伏羲乃至伏羲文化归之于神话和传说,甚至有的是自己的主观臆测。近十几年来,也有人根据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说汉代成纪县旧治地在静宁治平,并且提出了汉成纪县“三迁之说”,这是没有根据的。

经过翻阅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深入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汉代成纪县和成纪水存在矛盾和疑点。《水经注》载:瓦亭水源于二水,一水“东北出陇山,其水西流,右迳瓦亭南,隗嚣闻略阳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一水亦出陇山,东南流历瓦亭北,又西南合为一水,谓之瓦亭川,西南流,迳清滨溪北,又西南与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迳黑城西,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之,水东北出陇垂,西南流历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水,又有潜水,自西来会,世谓之鹿角口,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侵陇右,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即此城也。其水又南与燕无水合,水源延发东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皓庖羲所生之处也,汉以为天水郡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东南入瓦亭水……”。其后又有略阳川水注入瓦亭水。

这一段文字表述,对不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人来说的确难于理解,好在专家一致认为瓦亭水系古今基本没有变化。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方便,我们对照地图来读这段文字,可以确定瓦亭水就是现在的葫芦河,有些史称作长源水、陇水。这样,《水经注》中记载的汉代成纪县和成纪水就存在两个方面的矛盾和疑点:

1.《注》曰:“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但从地图上看,阿阳县城(现静宁县)以南境内,瓦亭水流经的地方,没有古城遗迹。也没有《注》自谓的“成

纪县”。更使人迷惑的是《注》在“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的“成纪县”下注曰:“成纪县,汉旧县,瓦亭水东去县一百里”。瓦亭水是向南流入渭河的。“东去县一百里”就是瓦亭水的某一段或某一地点向东一百里是“成纪县”。这段文字本身存在矛盾,不可信。

2.所谓“成纪水”,是因成纪而取名,但此水并未流经“瓦亭水又南迳”的“成纪县”,而是流经了又一个“成纪县”。据考证,这里的所谓“成纪水”在史书中称作“仁当川水”,又名“悠江”,今称作治平河。发源于现在通渭县西北八十里之黄蒿滩,流经静宁县的治平川入葫芦河(瓦亭川水)。今有人据此将治平说成汉成纪故址,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注》又说此处为“王莽阿阳郡治也”,并未见于其他正史记载。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辞海·历史地理》说“《水经注》四十卷,原书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乃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本文引用的上述《水经注》文字是编入“四库全书”的官本。它的《序》说,“兹取用互校,与朱(谋玮)、赵(读邨)同者,列为正文”。就是说一些注家的文字写入了《水经注》的正文,使之真伪混杂。

后人怎样“割裂改编”的呢?又有哪些注家之言写入正文呢?王国维先生的校本(为节约文字,只从阿阳县开始引):瓦亭水“……南迳阿阳故城东,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侵陇右,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即此城也。其水又南与(燕)无水合,水源延发东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源导(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读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皓庖羲所生之处也,汉氏)以为天(水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东南入瓦亭川,川)水又东南……”。这里把括号里的文字和划黑线的文字去掉(划黑线的文字在官本《注》虽在正文,但以小号字书写),这段文字就很难理解,它很有可能就是宋代遗失的部分,经后人“割裂改编”的作品。为此,《甘肃地輿志》、《甘肃新通志》等正史均不引用此文。明代胡缵

宗作《秦安县志》直接引用了桑氏《水经》，其中也没有“成纪水”和“成纪县”的痕迹。我们当然明白，《水经注》要比《水经》详而全，但成纪县绝不是小地名，而且是因伏羲而置的名县，不可能落掉。

那么，汉代成纪县旧治在什么地方呢？《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成纪亦徙新城”。这个记载是成纪县治所最明确的一次表述。这里需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小坑川在什么地方，二是讲移治为什么还要讲“徙新城”。成纪移治敬亲川是唐代之事，唐人讲唐事，可信度应该是高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成纪县旧治“小坑川”在哪里，又移治在什么地方。唐时的两部著名的地理巨作《括地志》、《元和志》是后人注释古代历史地理的权威依据，是可信可靠的。《括地志》曰：“成纪，汉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元和志》曰：“成纪县东南至州一百里”。现将上述文字联系起来，就可以确定，汉代成纪县治地“小坑川”在秦州成纪（敬亲川）北二里，东南至州（秦州）一百里的安伏川。《晋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上邽、冀、始昌、新阳、显新、成纪；略阳郡：临渭、略阳、平襄、清水”。很清楚成纪属天水郡。我们再按照惯例将临渭、略阳、平襄连接起来，清楚地看到，有些人称作“成纪县旧治”的治平，连略阳郡都算不上，就是说“治平”与天水郡之间还隔了一个略阳郡，更不可能在天水郡境内（图15）。汉代成纪县应当在现秦安境内。这与《括地志》、《元和志》的记载相一致。根据上述考证可以确定，“小坑川”就是现在的秦安安伏川，是汉代成纪县治旧地。瓦亭水正是流经此地。

（二）汉成纪县治为什么不在伏羲出生地



平襄即今通渭县 阿阳即今静宁县
略阳即今秦安县陇城镇 瓦亭水即
今葫芦河 略阳川水即今五营河
“成纪水”（仁当川水）即今治平河

图 15

西汉“黄龙见成纪”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王朝“德运”之争。“德运”是在封建王朝，尤其是汉代武帝及以后，各王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这件事。

《史记·封禅书》说，汉文帝十三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为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易改正朔易服色，色为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也。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后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于是“改历服色事”以“祈郊上帝诸神”而代之。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汉书·郊祀志》也记载了这个历史事件，并说，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缙绅都希望天子封禅正度也（师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武帝即招贤良赵绾、王藏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改历服色”，遭到窦太后的反对而“未就”。“改历服色事”未弄成，但成了武帝的一块大“心病”，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也就是在太初元年，武帝采纳兒宽、司马迁等人建议，“遂顺黄德”。从太初即位欲议“改历服色”，到太初元年“遂顺黄德”，历经36年，这期间，武帝始终没有忘记“黄龙见成纪”和“改历服色”事。封泰山的同时，还要祭“后土”，郊祀也要突出赤黄二帝。但是让他简单处置此事，也不是武帝的性格。首先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是强调“慎终追远”和“敬祖”的。孔子本人对《易》是推崇备致，见之恨晚，潜心钻研，以至“纬编三绝”，撰写了有名的《易经》中的《十翼》（亦称作《易传》），《易经》成为儒家经典。伏羲与周文王、孔子同尊为“三圣”。伏羲又尊为人文始祖。奉为“泰帝”。武帝更尊《易经》为五经之首，并于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以授弟子。他对伏羲的推崇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我们也清楚，“黄龙见成纪”对王朝的影响。武帝比谁都明白。再加上文帝以来国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等与争夺皇权有关的不安定事件，很有可能与黄龙见成纪联系起来。“黄龙见”应“土

德”，与汉之“水德”相悖。必然要想方设法“抑土兴水”，以保国运。

我们回到汉成纪置县的元鼎三年，武帝基本完成了“攘却胡越，开天斥境”的伟业，在行政区划改革中，成纪设置问题提出来了。一是“伏羲生于成纪”，“五尺孩童皆能口诵”，有社会舆论基础；二是伏羲及《易》都是儒家推崇的，对治国有用，有政治需要。成纪置县肯定是要置的。但颇费了一番心思。要是在伏羲出生地，也就是“黄龙见”的地方置县，无疑是强化“此地王气”，与“水德”王朝不利，不能这样做。解决的办法有二，一是“祈郊上帝诸神……”，这个办法文帝做了，武帝也作了几十年，在武帝看来效果不佳。二是斩龙脉破风水“逐散王气”。但伏羲出生之地毕竟不是一般的龙脉之地。万全之策就是设法转移“龙运”，淡化“王气”不影响国运。办法就是成纪县异地而置。这样既不冒忘祖之嫌，又可以淡化黄龙之气。

于是“双管齐下”：一是将成纪县仅作为纪念性的县制，治所就在伏羲、女娲成亲的显亲川，也是可以说的通的。但此后成纪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至少在唐以前没有形成与其文化历史位置相称的地位。也给后世研究成纪造成了许多不便。二是将“见黄龙”的古成纪有意贬低，大地湾遗址周边以龙命名的地方、山脉很多，唯独将略阳川的大地湾（黄龙见的地方）所在地名唤作“长虫梁”，其用意不言而喻。现在看来，武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古成纪存在那么多展示“王气”的宝物。有宫殿、有权杖、有国之重器的“鼎”，又是“黄龙见成纪”，还有王气十足的《易经》，如果武帝不重视这些才是不正常的。

（三）显亲川、敬亲川与小坑川

显亲川是为纪念伏羲女娲成亲而得名，是略阳川依水东进的延伸地，是伏羲女娲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是汉置成纪县“异地而置”的治地。据明《秦安县志》的记载与实地考察，显亲川的地理位置在今秦安县的安伏川一带。略阳川水注入瓦亭水后，西南出“显亲峡”，即为“显亲川”（安伏川），东汉封“显亲侯”，筑“显亲城”即在成纪县东北“显亲峡”口之处。魏黄初二年（221年）改置显亲侯国

为显亲县，县治显亲故城。后来显亲县移治阳兀川（今秦安叶堡川），阳兀川随显亲县名亦称显亲川。唐时改名敬亲川，即开元二十二年成纪县从小坑川移治于此。

小坑川之名仅见于《旧唐书·地理志》，而且是与成纪县移治敬亲川相联系的。此前小坑川为人鲜知。我们前面已讨论了汉成纪县“异地而置”显亲川的问题，也讨论了显亲川、敬亲川的沿革变化，特别是唐《括地志》、《元和志》更加明确了汉成纪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东南去州一百里”之处。这里所说的“秦州成纪”当然是治于敬亲川（即今秦安叶堡川）的唐成纪县，它的北二里，就在安伏川（早期的显亲川）。东南去州（今天水）一百里，也在安伏川。据此，作者又进行了大面积的实地考察，可以确定小坑川即在现秦安县安伏川。这里是略阳川水入瓦亭水出显亲峡后的第一个小盆地，这里山清水秀，充满灵气，葫芦河从中间由东向西穿过，将小盆地分为南北两半。这里的山远近高低层次分明，据当地农民介绍，这里的山都有“苍龙”、“华胥沟”之类的名称，北斗星在不同的月份（农历）指向山（沟）的不同位点，还真有些天然观象台的味道。人们在此，发远古之情思，浮想联翩。这里又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古今交通都很方便，是筑城置县的好位置。在这里残留着汉成纪的城墙（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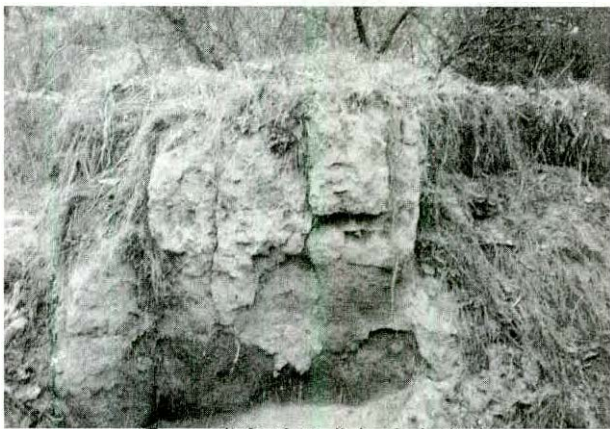


图16 残留的汉成纪县古城墙

显亲川的属地在今秦安县移治阳兀川前后是不同的。此前的显亲川即唐时的小坑川，与唐敬亲川同属显亲川。实地考察，敬亲川与小坑川仅由一个

小山嘴相隔为两个半隔半连的盆地，小坑川盆地小于敬亲川盆地故名小坑川。但因显亲川之名太“显”，小坑川一直为人鲜知，直到唐时移徙县治时，小坑川才见于史册。

(四)成纪三迁问题

成纪非一般的地名或者县名，它以纪念伏羲而名而置，因而不论如何迁动都应与纪念的对象有关才行。“三迁说”中的所谓第二地址显亲川是伏羲成亲之所在；第三地址天水，是伏羲活动尤其是演“八卦”的主要地方。这两个地址十分明了。而在第一地址上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由与伏羲活动有关的史料说话。这里要说一下“迁”和“移”的不同。关于“迁”，《说文》说

“迁”登也。现代汉语引申为迁徙。按照成纪“三迁说”的理解，“一迁”就是上百里之外，也就是较大区域的迁动。而“移”则不同。《说文》说“禾相倚移也”，就是靠的很近。“移治”就是小范围的“移动”。从“小坑川”到“敬亲川”只有二里之遥，当然是小移动了。至于“成纪徙新城”，一方面说明新旧两城相距不远，一方面说明这次移治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有计划的行动，所以先筑城，再移动，保证这次移动更加完美。可以看出，唐人对伏羲是格外崇敬的，显亲川改名敬亲川，小坑川移治敬亲川，又补《史记·三皇本纪》，才使伏羲见之于正史。

(作者单位：甘肃联合大学)

《嘉峪关志》出版发行

《嘉峪关志》是在中共嘉峪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文物局、文化广播电视局、档案局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下而结出的劳动成果。《嘉峪关志》出版面世，结束了嘉峪关有关无志的历史，填补了嘉峪关的历史空白。

《嘉峪关志》由嘉峪关市委书记郑亚军作序，由《嘉峪关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经甘肃人民出版社审核出版发行。《嘉峪关志》是初创的名胜古迹志，是嘉峪关市的一部文物专志，是填补历史空白之作。嘉峪关古、近代文化人才奇缺，基本无著述、碑刻等可凭资料，撰述嘉峪关古、近代历史十分困难，嘉峪关市志办公室在校注《肃州新志校注》和《重修肃州新志校注》两部古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历史上有关嘉峪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从2007年开始编修，《嘉峪关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市文物局、文化局、档案局、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酒泉市志办公室、金塔县志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历时五载，反复修改，增删取舍，终成志稿，实属不易。因此可以说，《嘉峪关志》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嘉峪关志》严格遵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

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嘉峪关城建关至今自然、历史、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嘉峪关志》上限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下限断至2010年底。历史沿革延伸至先秦时期，附录中内容延伸至2011年底。《嘉峪关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载体记述，用编、章、节、目体编辑法，设大事记、建置、建关置隘、兵防、商贸交通、文物古迹、长城的保护维修与开发利用、文化、人物九编，共二十九章，八十九节。增设了概述、附录两部分，附录中收录了维修嘉峪关城的重要文书资料、记述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嘉峪关城的回忆文章，名人墨宝和百年关城老照片。



试论陇南古道在古蜀道中的重要地位

魏泽民

【内容提要】陇南古道是联系古蜀道的重要路段,是出入蜀中的门户,是连接西南、西北和进入中原,乃至进入欧洲的交通要道,在古蜀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地位。古蜀道又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蜀道上发现的茶马古道文化遗迹,以实物的形式佐证了陇南古道——古蜀道在古代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沿途经济社会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陇南古道 蜀道 茶马互市 脚户 马帮

一、陇南与蜀川的地缘关系

陇南与蜀川因一江(嘉陵江)一山(秦岭)而连接在一起,位居秦岭南坡的陇南,自古以来就通过蜀道与蜀川互有往来。“蜀道”之名,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就有了蜀道。战国时期,秦昭王就拜李冰为蜀郡太守,修筑了都江堰。秦汉时期,今陇南一带属西南夷,汉武帝开发西南以后,在成都设置益州刺史部,武都郡(治所在今西和洛峪)所辖九县归其管辖。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兵出祁山,其中有三次就走陇蜀道。古蜀道因其险难崎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乐府曲牌《蜀道难》,简文帝、刘孝威等就用此曲牌填词。到了唐代,李白《蜀道难》以“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振聋发聩,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以“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丘”而流传古今。南宋时期,吴家军把守的陇南前线成了阻挡金人南下入蜀的名副其实的“蜀门”。蜀道因其艰险崎岖,才留下了许多诗文佳句和人文景观;也因其艰险崎岖,才造成了蜀地的相对封闭,以致蜀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宋人洪适在释《隶续·汉建平郾县碑》时颇有感慨地说:“右《建平郾县碑》二十九字。建平者,哀帝之纪年,其五年已改为元寿矣……殆蜀道未知改元尔。”惟其如此,才形成了神秘莫测的古代巴蜀文明,后又因历代诗人墨客

的吟咏而使巴蜀文明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视野,并使这种文明通过古蜀道走向世界。千百年来,古蜀道上蕴育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景观,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抑或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景观、民俗事项,都堪称华夏独有,天下一绝。

广义上的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包括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自云南入蜀的犍道,从甘肃入蜀的陇蜀道,从汉中入蜀的秦蜀道等,以及联络蜀中各地的各种水陆交通线路。影响比较大的古蜀道,南起成都,过广汉、德阳、罗江、绵阳、梓潼,越大小剑山,经广元而出川,在陕西褒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全长约1000余公里。狭义的蜀道概念仅包括四川境内的路段,南起成都,北止于广元棋盘关,全长约450公里,这条通道衔接着关中到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支线。

无论广义的蜀道,还是狭义的蜀道,在陇南和陕南都有支线分布,并形成了以古蜀道为主干线,连接西南和西北,通向青藏、中原乃至欧洲、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漠北的古代西部交通网,而陇南与陕南是蜀道从西南向西北延伸的重要路段,李白《蜀道难》所吟咏的“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

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中的“青泥”，就是陇南徽县与陕西略阳之间的青泥岭。

在古蜀道上，很早就有了人类的迁徙活动和商贸、文化、军事活动。金沙江畔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极度夸张的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都江堰二龙庙的三目神造型，与远在西北陇南仇池山一带（古武都）的刑天神话传说，氏羌文明的三目神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以推测，至迟在三千年前，陇蜀之间在这一通道上就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大迁徙，只是“蜀道”这一名称出现的比较迟罢了。

在古代，牧区与农耕区、山区与沿海、内地各区域的商业贸易主要依靠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驼帮、漕运、脚户和背脚子实现互通有无的，茶叶、丝绸、食盐、药材、牲畜等是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北方和中原大部分地方不产茶，饮用的茶叶，大多数是从西南产茶区贩运而来，而蜀道上繁忙的茶马贩运就是古代西部最主要的商品运输景观，并且因茶马互市而形成了一条重要商路。

陇南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联系西南、西北和中原的重要商道，秦蜀道和陇蜀道几乎都要过境陇南。在《战国策·秦策》中，就有秦昭王的丞相范雎所说的“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秦汉时期，褒斜道已成为一条重要通道。《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的记载，说明此道是关中和蜀汉经济联系的交通要道。东汉时期，褒斜道也曾有过修筑。时任武都郡守的李翕了解到武都郡的西峡道是通往梁州（相当于现今陕西南部地区，包括汉中、城固、南郑、勉县等市县及宁强县北部地区）、益州（今四川、重庆一带）的重要通道，但那里地势险绝，通行十分困难。为了打通这条险道，李翕与府丞功曹李昊等人亲自勘察线路，发动吏民，奋力修路，凿崖清障，削高垫低，截弯取直，采用“火焚水激之法”开通了新路，方便了行旅。他还命令属官仇审修治东坂，李瑾修治西坂。道路修成后，人们作颂刻石，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狭颂》。建宁四年（171年），李翕派遣他的

部下、主管山林的官员下辨（今成县）人仇审负责，督促民众修建了一座析里桥阁，并整修加宽了散关通往略阳境的故道。建宁五年（172年），郾阁栈道修通。建宁六年（173年），人们又作颂刻石，这就是汉隶的又一代表作《郾阁颂》。

“栈阁北来连陇蜀”，古代人们为了越过秦岭、巴山，开拓了包括故道、子午道、褒斜道、傥骆道和丹霸道5条道路。唐天宝十五年（755年）玄宗入蜀避难，即取道褒斜，路过现在的陇南市徽县。

二、祁山道——嘉陵道

祁山道北起甘肃天水，南到汉中，顺嘉陵道可达蜀中。唐乾元二年（759年），诗圣杜甫就是沿这条线路入川的。诗人从离开关中，到达秦州，卜居同谷，前往成都，在167天中创作诗歌120多首，一地一诗，以记行程见闻感受。这些纪行诗用无可比拟的艺术手法记录了陇蜀道沿途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奇异的风光山水、艰难的生存际遇、恐惧的心理状态，以及沿途经见的官贪吏掠、民生疾苦，记录了他沿途的经历和感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堪称“诗史”^①，是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历史”。

诗人从天水出发，一地一诗，次第写下了《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过祁山——长道，进入寒峡，又写下了《寒峡》——《法镜寺》，过成州汉源县——横岭山，进入青阳峡，先后写下《青阳峡》——《龙门镇》——《石龕》——《积草岭》——《泥功山》，在同谷县小住期间，写下了《凤凰台》——《同谷七歌》，12月1日出发，向蜀中进发，又依次写下了《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

在成西公路西和县横岭山东崖，有一摩崖石刻，年代无考，字迹模糊，但犹可辨识“轨级贾道”四字。“轨级”者，疑为古代道路的国家级（抑或郡县级）标准；“贾道”者，商旅之路也。顺成西公路南行，到石峡镇坦途关双庙寺又有一则开元年间的摩崖石刻《新路颂》。其文曰：

路泛垫，隘吞湮。郡南阳冲，蜀门之隙，控仇池

之险要，自开凿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之……曲磴临空，连白云而斜亘；危梁跨道，倚青山而直□□是。劳驯骑，弊征轩，凄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公，委□□□，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邨堂清闲，朱涯以延，敞牧野以□□□而傍按于是，询口黄口俭，鼓足以蹈之，蠢蠢黎人，以采歌以乐之。恭成颂云，或旌社事。

颂曰：我太守兮化融，坐甘棠兮易旧，布仁风兮列郡，苍生叹息口暮，越水登山兮辟新路。不弊口艰危，人□□劳于输转；冰壶挺操，霜镜凝似。刻石雕文兮□□□□，千秋万岁兮奉扬德音！

《新路颂并序》摩崖，今存西和县石峡乡坦途关双石寺西崖南壁，唐开元间镌刻，可识文字约200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汉阳郡太守赵承奉旨修筑南龙门谷栈道，历时十年竣工的史实。

根据陇南师专蔡副全先生的研究，《新路颂并序》所谓的“我太守赵公”，疑或“汉阳太守赵承”，他任成州刺史并开凿新路，当在唐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二年（721—723年）前后，距杜甫陇右之行早了38年，杜甫所行之路就是唐开元中赵承所开新路。新路颂摩崖所在的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双十寺北崖栈道，直至晚清依然存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三月十六日，叶昌炽途经坦途关（潭土关），在其《缘督庐日记》中写道：“过上下潭土关，峻坂崭绝，山坡下羊肠一线，断处皆支木板，或捷石填土以渡，俨然阁道。涧中乱石如麻，青色浮现，葱翠欲滴。最高一山削出青冥，林立丛蔚，日色皆为所隔”^②。

石峡河汇入西汉水，古栈道也顺着西汉水向成县、康县方向延伸，在西和县大桥乡鱼洞村西汉水崖壁上留下了大量古栈道遗迹。

据兰州日报2010年1月6日消息，2010年1月，陇南成县文物普查组在苏元乡董家坝村发现了1处汉代古栈道遗址，分布在长80米、宽20米、面积达1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有栈道孔70个，东侧有一段总长约120米的道路与栈道相接。

2009年甘肃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半块“茶马贩通番捷路”碑刻，从碑文中间接反映的古代陇南行政、地理、道路、关防、交

通等重要信息看，望关原是茶马贩运线路上的重要路段，也是连接蜀道的重要关口。

甘肃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还在甘南舟曲（古“沓中”）石门沟栈道遗址发现了北宋皇祐四年的摩崖石刻题记一处，记载了公元1052年10月，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判阶州事朱处仁，经石门沟栈道巡检关隘城寨的情况。沓中是古蜀道西线的交通孔道，唐宋以后逐渐形成茶马古道，成为蜀茶北上上的重要线路。这条入川线路，也是陇南商户贩运商品的重要通道，是脚户和背脚子常走的线路。至今，西和的社火曲词中还在吟唱着《下四川》，仍保留着《划旱船》。西礼民歌中也保留着下四川背背子的内容，诸如“想背背子下四川，家里有个心不安”；“走过高山走大弯，小哥哥盘茶下四川”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发自肺腑的质朴粗犷的歌，就能充分说明千百年来陇南人民在古蜀道上贩运商品，艰难谋生的情形，也能说明古道与蜀道的密切联系。

早在先秦时期，秦人就在西汉水上游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他们虽然以农耕和畜牧为主业，但因为秦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和浓厚的功利性色彩，所以一直重视商业贸易活动。从当年中湫占据西垂立邑兴邦到嬴政（赵正）一统天下，西垂故地一直是秦人用心经营的祖宗陵寝之地和重要的战略后方，驻扎在西垂的女防一族始终与同宗的季胜等保持联系，在西汉水上游的西礼成康与渭河流域的天水地区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主要交易牛马、食盐、玉石、粮食、钢铁等商品，商贸活动成了他们谋生图强的方式。后世礼县盐官镇发展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牲畜交易市场，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③。

按甘肃著名学者祝中熹先生的说法，在汉中与关中之间，自古就有一条绕过秦岭山脉的“陇道”：从汉中出发，先沿着沔水河谷西行，翻越陇山，再经过现在的马鹿、恭门、张家川、至古略阳（今清水县），再经清水河至天水，然后向西南进入铁塘峡，再沿西汉水至盐官、祁山，南入建安河谷（即今之西和河的大弯峡），然后折而东行，逆兰坑水（今西和县东河）而上，经十里，又分为两路：一

路越过横岭山,进入青羊峡,沿石峡河南下,(今西和石峡镇坦途关双石寺有唐开元二年修建栈道的摩崖石刻一处)进入现在的成县小川,进入康县望子关;或者经过何坝、洛峪,进入大桥,沿着西汉水(今西和县大桥乡鱼洞村西汉水崖壁上有规模较大的古栈道孔群),进入昌河坝,再折而东行,进入康县的窑坪、汉中市的阳平关,就与西南茶马古道联通为一体了。这条道路似乎迂远,但相对平坦。陇坂虽然高峻,车马尚可通行。一旦渡过渭河而进入西汉水流域,则抵达汉中就十分畅顺。战国以前,西北地区与四川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条“陇道”实现的。

到了汉代,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在陇南北部原西犬丘之地设置陇西郡西县,对这一地区继续实行有效管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茶叶的生产和贸易进一步扩大,并开始向海外传播。在北方,当时中国商人在西北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丝绸之路的再度畅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向东,则传入日本、朝鲜一带。川、陕、甘脚户的马帮到汉中的阳平关后,先进入康县的窑坪,而窑坪就是过去靠茶马古道而繁华起来的一座集市,曾经商队云集,贸易活跃,在此交易的农副土特产品又数量大,品类多。

从康县的窑坪过大南峪(古南皋镇)、大山岔(古散关),翻越乔家山,进入关门沟,再经寺台、大堡、巩集,过菜子埡、长坝,到望子关岔路口。至此分路后,一路过歇马店、甘泉,翻米仓山,到现在的陇南市武都区,可通甘南的舟曲(古沓中);或过宕昌,经岷洮,到兰州,直通到青海、西藏。另一条则从康县沿平洛河北上,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大川坝,过官渡到成县小川,穿越西狭,到西和、礼县和天水。陇南这段茶马古道虽然是中国西部茶马古道上的一段支线,但也是川陕经甘肃进入青海、西藏的孔道,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和畜牧产品,如茶叶、马匹、土布、蚕丝、药材、麻纸、核桃、木

耳、栗子、柿饼、蜂蜜、皮毛、天麻、麝香和食盐等^⑤。

三、蜀道上的茶马互市

蜀道与茶马古道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地理概念,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从地理空间上讲,蜀道指蜀地的道路和出入蜀地的道路,而茶马古道则范围更大,路径更长;从货运的内容来讲,茶马贩运大都要通过蜀道,蜀道是茶马贩运的载体之一部分,而茶马则是蜀道上贩运的主要货物。

从唐代开始,历代王朝都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作为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和治边策略,因为对食肉饮酪的游牧民族来说,茶叶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而对中原政权来说,马又是战略储备,是国防建设的必须,所以著名战将、主持西北军务的吴璠曾感慨地说:“马者,兵之用也,吾宁罢去,不忍一日误国军马。”

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在蒙古回纥地区,回纥人驱马与唐人做茶马交易,开创了茶马互市的先河。马匹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储备,朝廷一直非常重视。为了扩大西北、西南茶马贸易额度,大唐朝廷曾诏命汉阳郡太守赵承修建了从成州同谷县至秦州的必经之地——南龙门谷(今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一带)栈道。到了宋代,茶马互市更加繁荣,陇南茶马古道在茶马互市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以来,宕昌马市所买马匹已经占到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买战马由宕昌经良恭(今宕昌南阳)驿、牛尾(今礼县金沙乡牛尾关)驿,到大潭县城(今礼县太塘),再由大潭到龙林,过西汉水,到西和州,由西和经成州、河池(今徽县),翻越铁山至兴州(今陕西略阳),入兴元(今陕西汉中),转拨内地。北宋时牛尾关西面的宕昌、舟曲(古“沓中”)一带是羌藏民族的聚居地,藏区出产的骡马、药材、皮毛和内地出产的布匹、食盐、茶叶以及日用器皿,在内地与藏区间的高山峡谷中南来北往,并日趋繁荣,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路段。牛尾关古道是联系礼县下四区的交通要冲,是“唐蕃古道”西北道的一条重要支线,也是将宕昌

良恭马匹经由西和州运抵两宋前线的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西和县石峡河沿岸的栈道孔和大桥乡鱼洞村西汉水崖壁上的栈道孔,以及近年来在康县望子关发现的明代《茶马贩番捷路》告示石碑残文,都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证明了这条商路就是从秦州过成州、经过康县望子关通往窑坪,再往汉中或阶州、文州,一直到成都的古蜀道西线分支,也是古蜀道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东西方向可经西和、礼县江口、中坝、白关,过牛尾关,宕昌的好梯、南阳、临江铺到宕昌与国道212线相接;西北方向则可以从岷县的阎井、锁龙,经牛尾关、白河、桥头、草坪,向西南经武都,直达四川。

这条古道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和宕昌羌建立的宕昌国时期,但其作用凸现则是在宋金对峙时期。当时,陕甘青川交界地带的宕昌是全国最大的茶马互市的市場之一,宕昌羌马在当时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茶马市的兴衰与马匹的交易数量、质量,对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朝廷曾派名臣张舜民在宕昌钦化禅院监管茶马互市,而将宕昌羌马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从宕昌赶往西和州,牛尾古道就是最便捷的通道。为保障这条通道的畅通,将战马及时送抵前线,朝廷一方面下诏凿岩打孔、伐木锯树、修筑栈道,一方面在沿途所经州县驿站储备草料,补充营养^⑥。

北宋时,由于西夏和契丹的崛起,北方的茶马互市主要活跃在川、陕、甘地区,而川、陕、甘交界的陇南地区就成了茶马交易的重要市场。交易马匹的茶叶就地取材于陇南、陕南和蜀川,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通过古蜀道和陇道,从事茶马贸易。为了活跃茶马贸易,获取更多的战马,北宋还于熙宁九年(1076年)九月和元丰四年(1081年)分别在岷州和秦州设置铸钱监,铸造铁钱和铜钱,以便进行茶马贸易。

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后,陇南和陕南成了宋金对峙的西北前线,在四川制置使和吴家军的坚守下,成了阻止金人南下入蜀的北大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战争间隙,在

包括现在陇南市的西和、武都、康县、文县在内的川陕边境开设了八个茶马场进行茶马交易。绍兴年间,宋金议和,南宋又在沿边的西和州威远(今西和县城附近)、旧州(今宕昌理川)、岷州胜间(今岷县阎井)等地设置博买铺,与金人控制的秦陇地区通商贸易,主要是购买战马。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抗金名将吴玠奉诏在西和、阶州、成州开设茶马市,购买番马,并将所买番马赶往宋孝宗所在的江南行宫,以备行宫防卫之用。此时茶马贸易更加活跃,仅淳熙四年(1177年),在西和一州,就交易番马3000匹,居诸州之冠。此后因战事不断,茶马互市一度中断。到淳熙十二年(1185年),茶马司在西和州的大潭县、长道县等处设置丰草监,储备草料,接济过往马匹,等马匹体力回复后,再调拨前线,供作战之用。随着宕昌马市的繁荣,过往西和马匹的激增,给西和州的长道县(当时仅有8400户)和大潭县(当时仅有1400户)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压力。据礼县太塘乡发现的宋庆元二年(1196年)所立《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记载:“自朝廷立市西戎之马于宕昌,马政乌秣之重首事于潭邑。吾乡之民盼盼然,没于马政,困于赋税,诉于州家及监司者凡数载。后值上宪李大政来巡视,遵旧制判:两两县赋税总额不变,长道缴纳八分,大潭缴纳二分。”

开禧元年(1205年),又设置西和马监。即使如此,由于路途遥远,所买马匹也难以及时调拨军队或者赶赴江南各地。直到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再度议和,才重开边境茶马场,茶马互市得以恢复^⑦。

宋南渡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而西北茶马古道则显得相对萧条了,一直到明朝,才又恢复了西北茶马古道,到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的茶马交易最终结束。但陇南的这段茶马古道一直到1955年才宣告停歇^⑧。

明代又恢复了被元朝一度废止了的茶马治边政策,而且强化了这项政策,把它作为统治西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要手段,严禁私人从事茶马贸易,官营茶马贸易一度繁荣,马匹的交

易价格昂贵。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换 120 斤茶叶，但平均每匹马只能换 40 斤茶叶。到了明万历年间，则一匹上等马就能换 30 筐茶叶（即 300 斤），一匹中等马也能换 20 筐茶叶（即 200 斤），就是一匹下等马也可换 15 筐茶叶（即 150 斤），可见从明初洪武年间直到明万历年间，在茶马贸易中，马的交易价格一直在上涨，而茶叶的交易价则相对暴跌，马显得非常值钱了。西北、西南游牧民族在茶马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茶马交易市场相当繁荣（注：按清代通行的算法，10 斤为 1 筐，1 筐为 2 封。虽为明代之事，但与清代相比，计量单位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才在其《茶马》诗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而羌马正是氏羌杂居的西北青海和甘肃陇南地区一带所产之马。

到了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贩运私茶的商人增多，官营的茶马贸易衰退，茶马交易的行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匹上等马才能换回 120 斤茶叶，一匹中等的马能换回 90 斤茶叶，一匹下等马就只能换回 70 斤茶叶了，马驹就只能换回 50 斤茶叶了。所以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 年），官营茶马交易中“费茶多而获马少”，官营茶马交易制度最终被废止了^①。茶马古道部分路段也因贸易萧条、年久失修而坍塌。据立碑于康熙五十五年（1717 年）的《牛尾关梯崖路碑》记载：当地马帮富户张赞、贾氏夫妇独家捐资，发动乡民杨可德、杜国清等，从康熙四十九年开始，用了六年时间，重修了牛尾关梯崖汤坝（今钟滩坝）一段坍塌的古道，完工后张赞夫妇请人撰文立碑^②。

茶马互市的治边政策从隋唐始，至清雍正十三年止，历时近千年。在茶马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和马蹄，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创造了影响深远的茶马文化。

四、行走在陇南古道——古蜀道上的脚户和背脚子

官营的茶马贸易废止后，民间的茶马贸易就相对活跃起来了，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成千上

万辛勤的脚步、马帮和肩挑背负的苦力“背脚子”。在古代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商人贩运商品，全靠人背畜驮，其中，专门用牲畜从事长途贩运业务的人被称为“脚户”，而靠人力肩挑背负，贩运商品的人，被称为“背脚子”。大的客商，往往雇佣脚户的马帮来贩运茶叶等商品，而小的客商则雇佣背脚子去背“茶背子”和“糖背子”等商品。

背脚子脚穿草鞋，带上火烧（陇南的一种烧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嗒嗒的马蹄声和挥洒的汗水，开辟了一条从西南通往西北和中原以及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的经贸之路。他们在旅途中的食宿全部由客商负担，每日三餐吃的基本上都是粗粮，只管吃饱，少油缺盐，几乎没有蔬菜副食，可是背的“背子”实在太重，而且往返都要背“背子”。商人们去四川成都一带“盘茶”时，下四川背的是陇南当地的土特产，回陇南主要贩运的是茶叶、番马、药材、砂糖、皮毛，有时也贩运鸦片。背脚子每人至少要给客商背一百八十斤（按：此为老式计量，按 1 斤为 16 两计，实际还是 120 斤）重的商品，力气大的还要另外给自己捎带一两个“牛儿”（一个牛儿约 10 斤，计二三十斤）。他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三步两打拐”，每日行程五六十里，往返一趟得花七十多天的功夫，一趟“背子”背回来时，“茶背子”上靠脊背的一层茶往往被汗水浸湿并长出毛来，如此辛苦，才赚得 12—20 个银元，在西和当时能余一石（700 斤）小麦^③。

背脚子从东家出发前，雇主家要备酒菜招待，此即“启程”；在中途遇到饭馆也要招待，这叫“打牙祭”；在四川茶园背上“茶背子”上路时，雇主主要给背脚子每人送 1 斤茶，背“糖背子”时则送 1 对糖（红白分包，1 对为 5 斤），这算是老板给背脚子的一点小费。背脚子返回后“歇脚”，雇主还要再招待一次^④。

长年累月地在茶马古道上行走和生活，脚户和背脚子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茶马人的“行话”。这种行话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生活忌讳语，为的是避灾祸，求吉祥，一路顺风；另一类是“黑话”，目的是为预防

走漏消息,被路人知晓,发生抢劫等意外事故,所以交流信息时多用“黑话”。茶马古道上的脚户和背脚子们有很多忌讳:如称土匪为“线子上的”,称小偷为“梁子上的”,偷来的东西叫“水上来的”,“炆浆水”说成“热酸菜”,他们忌讳“炆”字,因为“炆”与“抢”同音,最怕遇上土匪杀人掠货。背上“背子”上路前,一般忌讳用火烫豌豆吃。把“到站了”说成“拢了”,把“船靠岸了”说成“拢岸了”,把“拾东西”说成“拣东西”,把“返回”家乡,叫“涨了”。杯子里的水被打翻了,叫“小溢了”,背的茶背子倒了,叫“抓了”,打拐休息后准备抬脚,叫“提拐”,途中休息,叫“放哨”。泡干馍馍吃,叫“碎上”或者“掐上”,不说“泡上”,东西丢了,说是“落了”,货物短缺了,叫“货空”。水深了叫“厚”,水浅了叫“薄”,杀鸡叫“宰了”。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叫“起、览、斜、缠、盘、乃、新、考、稍、齐”^⑩。

这种茶马行话也与礼县盐官骡马交易市场上“六成行”的“行话”略有差异。比如:在“六成行”里,一仍读如一,二就读如啣(丑),三读如斜,四读如缠,五读如盘(曼),六读如乃,七读如心,八读如考,九读如丸,十读如起儿。另外,十一读如捻一,十二读如叶啣(丑),十三读如叶斜,十四读如叶缠……十九读如叶丸,到二十,又读如重啣(丑)(重有二、双之意),二十一读如啣(丑)一……,三十三读如两斜,三十四读如斜缠,直到四十读如缠,四十一读如缠一,四十二读如缠啣(丑)……以此类推,只要记住一些特殊读法,其余的就能逐个推出^⑪。但六成行的人(牙行)说话时,为了保守交易时的商业秘密,还往往配以手语(在袖筒中掐捏指头)。茶马古道上的脚户和背脚子说行话(即“黑话”),则是为了旅途安全。虽然都是为了预防被他人知晓,但真的是各有各行,隔行如隔山。

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废止官营茶马贸易,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脚户的马帮和背脚子在高山深谷中的茶马古道上蜿蜒穿行了二百多年后,才完全消失在了历史的时空里^⑫,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铁路运输和公路、民航、川江航道运输。

五、结论

陇南古道是联系蜀道的重要路段,是出入蜀中的门户,是连接西南、西北和进入中原,乃至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在蜀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漠视的地位。蜀道又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陇南古道是茶马古道从西南向西北的延伸路段,在古代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陇南古道——古蜀道是与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重要的古代中国商贸之路,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马帮挑夫的商旅之路。古蜀道——陇南古道从西南向西北延伸,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小的支线,将陇南与川、滇、藏、桂、黔、陕、甘紧密联结在一起,使陇南地区成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藏和中原的必经孔道,也使陇南成为出入蜀地的北大门。

祁山道北出天水,可与丝绸之路相接,通过河湟谷地,进入青藏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天山南、北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东出康县和两当,可通陕西,进入中原;也可顺嘉陵江南下四川、重庆、云南,通往印度、缅甸和东南亚,所以,陇南自古就是蜀道上商贸活动的重要地区,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千多年来,古蜀道向西北延伸的陇南古道一直就是中国西部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走廊,它维系着沿途不同风俗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各个民族,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活跃了商品市场,发展了当地经济,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社会进步,实际上也巩固了边防。与此同时,佛教和傩戏、傩舞也在蜀道上得以广泛传播。另外,异域文明的传入和本土文化的外传与交融,使蜀道沿线的文化、风俗、宗教、艺术以及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在蜀道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用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多神秘的色彩。

正如专家们所说的,古蜀道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它的历史至今已有3000多年,比古罗马大道的历史还要悠久,是保存至今的人类

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在海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蜀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过陇南古道通往西南的孔道,与丝绸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条条曾经辉煌过的陇南古道——古蜀道,是商贩们的脚板和马蹄踩踏出来的一条条文明与文化的传播之路,是一条条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融合之路,是一条条异彩纷呈的民族民俗文化走廊,也是一条条精神境界的超越之路,是一笔可资开发的珍贵文化遗产。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宝成铁路、川陕公路的开通,终结了行走在陇南古道——蜀道上马帮和背脚子们的商贸活动,但留在陇蜀古道上的探险足迹、马蹄的印记、铃铛的清响,还有背脚子们“放哨”时高亢的山歌,沿途的惊险经历和发生的种种故事,以及对茶马贸易及其陇蜀古道上的文化记忆,则又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和久远的历史文化记忆,则是西部各族人民一座永恒的精神文化的丰碑,永远记载着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荣耀与光辉。

【参考资料】

①魏泽民《杜甫在陇右的诗歌创作》,《民主协商报·文史》2005年6月6日)

②蔡副全《天水师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③祝中熹《“西”邑衰落原因》(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陇南文史》第四辑)

④⑧⑨⑩丁运苍《茶马古道探源》(2004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

⑤魏泽民《陇南与茶马古道》(《民主协商报·文史》2011年8月26日、9月2日第三版连载)

⑥⑩杨鑫《寻找礼县“牛尾古道”》(《民主协商报》2011年7月22日第三版《文史》专栏)

⑦《陇南文史概论》和1995版《西和县志》

赵琪伟《礼县红河流域的早期秦文化遗俗》(2010年5月10日《文化陇南·秦文化专号》)

⑪⑫黄金鼎《西和商品运转中的“背脚子”》(见2004年8月政协西和县委员会所编《西和文史资料》第二辑)

⑬⑭⑮文辉《陇南盐官骡马市场行话探》(2009年11月7日沈文博博文)

(作者系民盟陇南市委委员、中学高级教师)



庆阳周祖不窋城考辨

李忠祥 李天琛

当今，史志学界对先周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斐然，好多疑案已逐个被解。在这项有意义的研讨工作中，对庆阳周祖不窋坟似乎很偏爱，但却对周祖“不窋城”有所忽视，甚至被冷落了。周祖不窋城究竟在何处？是庆城及附近的哪一座古城，其遗址如今说法尚且不一，或含糊不清。笔者抛砖引玉，以期及早澄清史实，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古为今用。为此，怀着斗胆对不窋城作一考辨。

历代史典的记述

周祖不窋城在何处，最早的说法可见唐初的《括地志》：“不窋古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唐代中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在庆州顺化县条目下言：“今州理，东南三里不窋故城是也。”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所成的《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三，在庆州条目下记：“今州里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这三部唐宋著名的地理志说法比较具体、清楚。遗憾的是后代及当今的志书上，有关不窋城的记述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进入了一个怪圈。

明·嘉靖《庆阳府志》未提及不窋城。在“庆阳府（安化县附）”目下写：“城因原阜之势而成，其形似凤，故曰凤凰城”。接着记述了南关瓮城和北关城有关情况。《明一统志》在“庆阳府古迹”目下言：

“不窋城，在府境内，夏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建邑而居，即此城。”清·顺治《庆阳府志》中的记述和明·嘉靖《庆阳府志》的雷同。民国二十年（1931年）张精义等所撰修的《庆阳县志·城池》中记，庆阳县凤城（凤凰城简称）“按《府志》‘即不窋故城’（《史记》不窋失官窜戎，建城于此）”。1993年版的《庆阳府志·文物志》在“古城遗迹分布表”中这样记道：“不窋城，汉郁郅城，宋庆州城，庆阳府城，今庆阳城。”该年的《庆阳县志》仅言庆城“为周祖不窋所筑，原为高阜。”

认真看了以上典籍史志的记载，令人不知所就，实感惋惜和遗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首先提出错误说法的是1931年的《庆阳县志·城池》，此后才以讹传讹的！庆城今有4座古城遗址，由北向南依次即为田城、皇城、凤凰城（即唐代的弘化县城）、及凤城南三里莲池的麻家堡寨城。究竟哪一座古城是不窋城呢？观点明确有二：早期文献说不窋城在今庆城（即凤城）南三里即麻家堡城；后期文献说今庆城就是不窋城。当今人也就随声附和着。

多年来，鉴于我们对故乡庆阳有深厚的文史情结，早已留心“不窋城”之话题。常有一种直觉在心头萦绕，不窋的时代大约在前十七世纪，北地人口稀少，生产工具落后，怎能一下修筑庆阳凤凰城这样一座规模宏大，城高如阜，岿也如山的伟城

呢?近年发现《括地志》所言,“不窋古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这才叫人豁然省悟,心悦诚服,原来庆阳凤城并非不窋城。

周祖不窋城考辨

关于周祖不窋城,由上文回顾的唐宋三部典籍史料的记述,明确可知:不窋城遗址应在今庆城东南三里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这三部我国地理名著中的记述,后人有什么理由将其记述否定了呢?民国以后的志书怎么能轻率地改写出新的结论呢?这种“言不忠信,行不笃敬”的作为,实在令人瞠目和不解?细思之,既就是否定也得通过辨析,考证应有充分的依据方可,然至今未见这类文章问世。

《明一统志》说不窋城“在府境内”,嘉靖《庆阳府志》没说在何处,清代顺治《庆阳府志》也没写。这些志书,较谨慎、客观。1931年的《庆阳县志》言,庆阳凤城“即不窋故城”。自此开了错误的先河,如今的《庆阳地区志》《庆阳县志》等志书,就堂而皇之的说庆城就是不窋城。若细一掂量,今人也许可出于“好意”,不窋城就应当是今雄伟高大的庆阳凤城,这多么体面。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要真实的历史、要科学好,还是要体面好。要体面就会闹出许多笑话,历史是无情的,搞经济、搞建设、搞科研同是一个理,不讲科学,是要走弯路的。回避历史的真实,后人会耻笑的,怎能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呢?

我们也曾看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关于不窋城在弘化城(今庆城)的记述,这不可信。因原著宋代已佚5卷,今本乃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的^①。其原著所记,肯定与唐宋三部巨著说法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首先还是应尊重可信的古籍史典记载为妥。《括地志》等三部巨典所说的唐代庆州弘化县治,顺化县治及庆州州治都是指今庆城县城——凤城。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周祖不窋城遗址,在今庆城县城东南三里处。况且这里俨然有一座大城堡,即教子川口的莲池古城堡遗址^②。笔者认为非此莫属,岂能有他。因为,一般情况下

最早的史典说法,应该是权威的。

其次,经实地考察,莲池麻家堡及其附近的十里坪、斩山湾、梁坪处都有新石器时代和先周文化遗存。虽然后代破坏严重,文化层复杂,叠压关系不清,但如今还能找到古窑穴、灰坑、泥质红灰陶、夹砂灰陶片。另外,麻家堡故城垣还依稀可见。这说明此地是一处先周文化遗址,自然这成为不窋城址的佐证。

第三,据我们初步推算不窋子孙筑城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左右,庆阳凤城修筑的时间大致在春秋义渠建国时期“筑城廓以自守”,即公元前800—前500年间,这两个时间相差将近1000年左右。按常理前者筑城规模不会太大,后者筑城规模不会太小。再者公刘子庆节在今宁县庙咀坪修建的古豳国的国都面积才为16万平方米的面积,其先祖氏族部落就能在今庆城建一个48万平米的大城垣,大风城吗?因此,《括地志》等三部巨著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关于“斩断山”改河道工程,民间有动人的传说故事,“周懒王生庆阳龙脉斩断”。这毕竟是虚构的故事,“懒”可能是周王朝末代帝王“赧”的串音。从迷信角度和风水理论讲,后人将周朝灭亡的责任怪在了周赧王斩断龙脉这件事上。根据史料记述,“不窋城”在今庆城东南三里处。即可推想,“斩断山”疏河道,修筑不窋城这两大工程是不窋、鞠陶、公刘这三代周先祖所为。相传,是用文笔峰上的莲草割断龙脉,才完成了大工程。这说明了工程的复杂和艰巨性。再者,在斩山的同时,一举两得,一则用挖下的土石筑堤坝堵住西侧旧河道口;二则顺理成章修筑起了“不窋城”。

经踏勘,不窋城呈长方形,原东西长约650米,南北宽约150米,周长约1600米,面积为9.6万平方米。城墙高约15—20米。如今,四面切削严重,遗址周长约960米。在先周时期,一个部落在北地有这么大的城堡,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窋落脚处的猜想

关于“周祖不窋城在何处”之课题,庆阳一些

有识之士实际早已提出好的见解，刘文戈先生1998年写的《周祖文化与古庆阳》一书第31页就提及此事。原因可能是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似乎谬误说一百遍也成了真理。可喜的是2009年出版的于俊德先生编著的《中国·庆阳历史大观》强调了这一史实：“不窾当时所筑三城，在庆城县南三里处，俗名叫‘不窾城’^③。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神秘，一是唐庆州“弘化县南”（或东南大方向都可以这样说）三里”本应从南城门外算起。二是刘先生所说的，庆城南环江边是“不窾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明·嘉靖《庆阳府志》第2页说得很清楚，那是南关瓮城，为“成化初（1465）参政朱英建，寻环于水。副使曹宏复筑之。”嘉靖二十八年（1459年）“七月初三日，为大水淹没”。后又曾增筑，才“据阻山带河之险，完金城汤池之固，复成一方险要云”。由此可见，庆城南门外这个低矮的瓮城是明代才修筑的，况且洪水曾多次淹没过。试想早于先周时已将“龙脉斩断”，明代洪水还如此肆虐凶猛，不窾时还会于此低矮之处筑城吗？故刘先生说的“从南门计”才是正确的。因此，现在基本可以论证：不窾城在今庆城县城南三里之莲池的一段土梁上，即“斩断山”西面的麻家堡山丘上。明代麻氏族人曾于此修筑堡寨，后称“麻家堡”，实际上原本为不窾城遗址。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周祖不窾率族众初来乍到“戎狄之间”的庆阳时，落脚处先在庆城县北的刘巴沟东之沟头天子掌、天子崕一带，不是一来就到不窾城落脚的。因他们是“窜”、“奔戎狄之间”的，夏末因怕追剿，先要在山林里隐居。后来，到商代中前期才渐南迁今庆城附近的。明南京刑部尚书邑人李祯在《创修延庆宫记》^④中写得很好：“粤稽延庆镇，周不窾肇生之处也。东留眷马山，西遗手拍墙，若天子掌、娃儿岬、砚台冢、圣水塘、白马涧、擂鼓坪，旧迹昭然尚存”。庆阳东川（今玄马、悦乐、元城、柔远所在之川）还有周祖白马泉、马蹬砭、玄马湾、天子崕、月落堡等许多活动遗址。足见周祖不窾子孙三代初到庆阳是在东川刘巴沟落脚的。不窾子孙在刘巴沟天子掌、天子崕、姬家山、樊老庄（相传为公刘庄，也许是公刘出生地）擂鼓坪

各地“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⑤。“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⑥。从而取信于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凭着崇高的威望和聪明的才智，南下庆阳凿山梁、改河道、“斩龙脉”，为庆城周围人民消除了淹没良田和家园的洪涝灾害。相继在修斩东山梁改河道后留下的土梁台上，修筑起不窾城，做为他们新的落脚处。这也许就是《笃公刘》^⑦中所说之“迺陟南冈，乃覲于京”。这个功绩为什么没记在不窾和鞠陶身上呢？也许是因为公刘正逢年轻气盛，大展雄才韬略之时，是他敢想、敢说、敢干提出并施工斩断东山后，为爷爷修筑的“不窾城”。此故城雄峙川腹，东有环江、东河合成的马莲河，西南有教子川河水，北有古河道滞水形成的莲池，四面环水，犹如孤岛仙境，好不美哉！如今“不窾城”、“莲池”以及“崕山湾”的遗址仍然幸存！这是庆阳一处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很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以前，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现在，我们绝不能忽视和抛弃它，应将其作为周人和庆阳人的故居来珍爱它，建设它，更应采取有效得力的保护措施，古为今用，将它建设成为庆阳引人刮目相看的新景点和新的风景区。

试想，在当今开放改革，建设美好幸福家园的伟大时代里，我们庆阳人应高瞻远瞩，发扬周祖的创业精神，古为今用，绘制一幅新修不窾城的蓝图：在庆城马莲河的南川口修筑起一座大坝，在不窾故城四周形成一个人工湖，让干涸了千年的莲池复苏，让不窾故城四周环流着碧波荡漾的湖水，长满婀娜多姿的垂柳，修成一个秀丽如画的“不窾城游览风景区”，造福于后人。若能那样做，必定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美好蓝图和集祭祖、游览、灌溉、蓄水、发电为一体的，利国益民的大好工程，也是一个极有乐趣的庆阳文明建设的新亮点。在当今太平盛世，何乐而不为，还等何时呢？

笔者在勘察不窾城遗址时，发现民间流传着一首赞美不窾莲池胜景的诗歌，录记于此：

莲池仙景

周祖不窋城，四周河道环。
老王斩龙脉，文笔峰上莲。
峭壁有古洞，河心见龙胆。
为民来造福，莲池变良田。
公刘肇生地，神丘五千年。
仙境美如画，太平盛世现。
网络接地气，桥虹过山湾。
果园十里香，小康知本源。

- ③《中国·庆阳历史大观》第三章 56 页
④《庆阳县志·艺文志》(1931)2004 年版 778 页
⑤《史记》卷四(1988 年 10 月版)26 页
⑥《史记》卷四(1988 年 10 月版)20 页
⑦《笃公刘》，指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较著名的一篇诗歌《诗·大雅·公刘》
(作者单位：华池县文化馆)

【注释】：

①《辞海》(1989)1813 页

●庆阳莲池古城址，指庆城南三里之麻家堡。

莲池，可见明嘉靖《庆阳府志》卷二第 23 页

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召开

2013 年 4 月 16 日，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在水迎宾馆召开，市直部门 12 个单位分管领导、五县两区志办主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共计 34 人参加了会议。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宽余传达了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并分析了当前我市地方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安排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

近年来，我市部门专业志启动编纂达到 80 多家，目前已出版有《中国共产党天水市委员会志》、《天水市政协志》、《天水市电力工业志》3 部。完成终审并即将出版的有 7 部，完成初稿，正在严格按照三审程序开展初审、复审的有 22 部。基本完成初稿的 11 部。部门专业志编修完成任务量过半。年鉴编纂工作已进入地方志常规工作，我市两区五县共 8 部综合年鉴 2011 卷全部编纂出版，《天水年鉴(2011)》卷被中国版协年鉴工委评为三等奖。地方志网站建设开通运行。

会议要求，要正确认识我市地方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贯彻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编修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佳志，推动全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围绕重点工作配置力量，攻坚克难，提高认识，增加驾驭工作的能力，调整工作部署，安排好工作进度，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年鉴等工作任务。要贯彻好省上的地方史志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督促检查，各单位要将贯彻落实情况及时书面报市地方志办公室，对不依法履行修志职责、推、拖、等、靠，拒不履行修志义务的，要坚决落实到位。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裴守业、吴宏波还就各自分管联系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分析研究了面临的困难和机遇，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修志行文随笔(续)

张志纯

四十一、纪念日、期限年应标符号。在许多史志和报刊、文件、文章中涉及的有关纪念日,有的标符号,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其中用圆点区别前是月,后是日,月日分明;用引号显示节日的时间。这给读者以明晰的概念。有的舍不得标符号,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这对当今俗成者说,当然知晓是什么节日,什么时间,不必非议。但要非议的是,也可说成是三十八个妇女节,五十一个劳动节等等,因为你没理由不让人家这样理解。鉴此,笔者认为,还是标上符号比不标的好。

有关期限年,也是如此。有的标符号,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五”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二·五”计划等,它的引号标明计划的时期,引号里的圆点将序号与年数隔开,不致使人产生歧义。不标符号的如《张掖日报》2012年10月23日头版有篇文章引用的一个文件标题是《张掖市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其中的十二五怎样理解?知者说就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不知者不知“十”是什么,“二”是什么,“五”又是什么,连起来又是什么,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把圆点加上,就变成《张掖市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这显然把第十二个序次与年数区别开了。笔者认为,这个小圆点还是点上为好。

四十二、姓名排列的问题。不少文字载体上,对人名的排列,也有标符号与不标符号的现象,如在一长串名字中标符号的是(假设):张强、王志仁、李海、赵茂林、乌兰琪美、孙伟、欧阳生辉、董其铁山;不标符号的是:张强王志仁李海赵茂林乌兰

琪美孙伟欧阳生辉董其铁山。这在当地当年当时来说,知道这些人,认识这些人的人就清楚某某是谁,谁谁是某。反之,时过境迁之后,外地外人目睹,怎么能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单中辨认出二字名是谁、三字名是谁,四字双姓名又是谁;如果其中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的六字以上、甚至名中还有间隔圆点的名字连写在之间,又如何辨认?持不标符号者说,报纸、文件标题的人名谁都知道是谁,不必点顿号,点上是累赘。这是只顾当前、不想长远,只想当地,不管外地的狭隘观点。从方便当代与后代、本地与外地、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多方面的读者考虑,名字之间点上顿号利大弊小。如果不点号,名字之间空一字位,也是起到间隔作用。由此想起上小学时,武建勋老师讲的一句话两种标号形成两个截然相反意思的例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客人标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想让主人表态,因天下雨不能走,把他留下不要走。而主人不想留他,就标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若真如此,主客岂不尴尬?

四十三、标述干部职务应确切。职务有正、副之分,该正则正,该副则副,不得含糊。但在人际这间的口语呼叫时可以笼统地称呼:“王局长你好。”这个“王局长”是正职,也可能是副职,此处的称谓等级无关紧要,因为是人对人的呼唤称号而已,也是一种尊敬对方、抬举对方的称谓。不必呼“王正局长”或“王副局长”。而在文字标述上,应明确标为确切职务,如干部任免文件上,×××任市林业局局长,不得简为×××任市林业局长。

在标写职务时,不得有尾无头的略写机关名称,如“×××任××市委书记”或“×××任××

县委常委”。此称无主词；即“市委”“县委”是哪个党派的？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青年团的组织也可称为“市委”“县委”，政协组织也是如此。如“共青团××市委”“政协××县委”等。不管他现行文件上怎样写，修志者应名正言确地写，在前例“市委”“县委”之前加上“中共”二字。

“同志”一词本是一种在领导讲话、会议报告、聚会演讲、人际交谈、书信往来时的口语称谓，但在某些公文上，甚至史志中，也多此一举地写上“×××同志任县建设局局长”“免去×××同志的县建设局副局长职务”，其中“职务”“的”字更是多余文字。凡史志类书里，应只写其姓名，不必赘“同志”。

四十四、标示方位应具体。在某些文章、文件、史志中曾有这样的载记“距张掖地区60公里”“位于张掖东南”“在肃南山区发现鼠疫”“地震波及民乐一带”“分布在祁连山区的森林”等模糊语言。

“距张掖市60公里”一说欠妥。因为张掖市辖域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领属6个县（区），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东、西长数百公里，这个“距”给人以“漫无边际”之感，不得其解。标方位应有具体目标，如“距张掖市甘州城60公里”。

“位于张掖东南”一说欠当。所谓“位于”，即一定的地理位置，不应是大概方向，应有确切地方名称，如“位于张掖东南山丹马场的黑土滩”。

“在肃南山区发现鼠疫”一说不妥。肃南山区西起嘉峪关之南，东至武威以南，地跨大半河西走廊的祁连山，难道在这一广袤的山区都发生鼠疫？故应标明发生鼠疫的确切地点，如“在肃南马蹄区大泉沟马连滩发生鼠疫”。

“地震波及民乐一带”一说不当。根据地震一般规律，震区基本处于“一点一线”，点是震中，线是波及区域，不可能全县四面八方的各乡村都有同级震感，历史事实是某一块地方，如“地震波及民乐南部沿山一带”。

“分布在祁连山区的森林”之说亦不确切。因为祁连山区很大很广，不可能到处都分布森林。表述者应弄清森林分布的确切位置，把具体布点写

上，如“分布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森林”。

四十五、记载数据、事情应标明时间。某些志书中偶有这样的句子：“现有职工145人”“在现价的基数上上调0.5%”“××工作会议于2011年2月召开”“当前农村的主要工作是”“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等等。这样的表述都缺乏时间概念，没有时间的成份是不完整的事物，有碍于事物价值的分析与定论。

“现有职工145人”，这是某单位领导人在某年某月某日给上级检查工作的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口语，写在“志留千古”的书里，是与志体格格不入的。存史要求应写具体时间：“2005年有职工145人”或“截至2005年有职工145人。”

“在现价的基数上调0.5%”，与前例相同，缺乏时间，应标明具体时间，起码反映到年月，如“在2012年3月定价的基数上上调0.5%”。

“××工作会议于2011年2月召开”，这种写法明显背离事实。因为各种会议都是在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应如实记录。缺乏日期的要查清写上，不能为历史留下缺憾。

“当前”“目前”“以前”“以后”“现在”“今后”等不确定之词是史志类书籍所坚决忌讳的用语。在表达此意时，应选用较为恰当的文字去记事，是否以“××××年初夏”“自××××年始”“从××××年以后”等基本具有时间概念的文字表述。

四十六、他与它的对象应找对（复议廿四）。许多史志等书籍和文章中显而易见地把“他”用在“它”的“物类”中，如“该县其他农作物品种还有荞麦、青稞、刀豆等”“除牛、马外，其他小牲畜的管理条件都很差”“其他矿藏”等等；把“它”用在他的“人类”中，如“其它民族”“其它人员”“其它机关”“其它活动”等等。

“他”与“它”字，都是代词，两者的使用是针对其特定范围而各投其主的，按理不得混用。凡属“人”类范畴的，应用“他”字，省、市、县、乡、村，是行政区划的管理建制，性能为“人管理—管理人”，故称“其他省”“其他市”“其他县”“其他乡”“其他村”“其他地方”而不能称“其它省”“其它

县”等等；机关、团体、单位是人的活动集体，应呼“其他机关”、“其他单位”，而不得称“其它机关”、“其它单位”，等等；各种会议、聚会、培训班等都是由人参与，由人所为，故属此方面者都用“他”来称，而不应用“它”去称；凡涉及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核心、以人为运作的活动、行为的事业、事务、事情都应用“他”代称。与此相反的是与“人”类之外的物产、物资、物品、物质等万物之类都称为“它”。

四十七、年限、年代、年度、年份的区别。在各级各类地方志的统计表格中，常出现这四个年号，且有相互混用的现象，即该用“年代”却用的是“年度”；该用“年度”却用了“年份”，实际还不啻于此。这有用者习惯问题、认识问题、忽略问题。严格地说，这四个年号是各有其义、各有其位，不得混用。

词典解释，“年限”是指作为一定期限的年数，如大学本科四年，专科二年；五年计划、十年总结等。在此类统计表的表例三角框中应标“年限”，而不应标“年代”。“年代”是连续若干年的年称，在《××县1949年—1959年人口统计表》的表例三角框中应标“年代”，而不应标“年度”。“年度”是指特定的专业年度，有一定的起迄日期，如教学年度、财政年度、粮食年度等，此类表格如《县财政局2009年财政决算表》的表例三角框中应标年度，而不应标“年份”。年份是指当年或某年一年而言，在《××年2012年牲畜统计表》的表例三角框中应标“年份”，而不应标“年限”。

在许多统计表的表例框中对这些年号的定名使用大多不被注重，它们在表中虽无轻重，在某些应时性的数据表上，对人们来说无关紧要，但作为存史的《志》中表来说，应把这些区区小词也不被留讹为宜。

四十八、新、旧历时间的标注。历法的新历与旧历时间符号的使用，本应有严格的分工区别，互不混淆，但在运用活动中，随心所欲的现象随处可见，也随有发生。例如，1969年正月十五日，1976年九月3日，一九九四年10月10日等。按历法符号的标注规矩，新历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即1949年10月1日；旧历使用的是汉字小写，如一九四九年十月初一。使用符号时应根据内容所述

性质，该用旧历表述即用汉字小写，该以新历表述即用阿拉伯数字，严格区分，不能交叉混用。使用旧历符号，应完全是汉字小写，不能“年”是汉字小写，“月”“日”却写成阿拉伯数字。同样，使用新历符号，应完全是阿拉伯数字，不能“年”是阿拉伯数字，“月”“日”却写成汉字小写。

在标用新、旧历时间时，针对所需，可在年代符号前标明年别，如公历2013年，农历二零一三年。根据需要还应标上干支，如2013年（农历癸巳年），或2013年（农历癸巳蛇年）。星期时间皆为汉字小写“星期一”，不得写为“星期1”。

在某些题辞赋诗、作画制幅时，文人们喜于干支年后酌义署上农历月份的别称，显得即文雅又富有节令季息。别称是：

一月：正月、陬月、孟月、端月、孟春、初春、始春、元春。

二月：如月、杏月、仲春、早春。

三月：病月、桃月、季春、炳月、三春、阳春、暮春。

四月：余月、清和月、槐月、孟夏。

五月：皋月、榴月、蒲月、仲夏。

六月：且月、荷月、伏月、季夏。

七月：相月、巧月、霜月、孟秋、桐月。

八月：壮月、桂月、仲秋、中秋月。

九月：亥月、菊月、季秋。

十月：阳月、小阳春、孟冬。

十一月：辜月、葭月、仲冬。

十二月：涂月、腊月、嘉平月、季冬。

旧时，对每天的时辰用十二支计记：夜11点至凌晨1点为“子时”，1点至3点为“丑时”，3点至5点为“寅时”，5点至7点为“卯时”，7点至9点为“辰时”，9点至11点为“巳时”，11点至13时为“午时”，13点至15点为“未时”，15点至17点为“申时”，17点至19点为“酉时”，19点至21点为“戌时”，21点至23点为“亥时”。

四十九、志书中的多余字不必要。志书对文字的要求是“惜墨如金”、“点石成金”、“文简事博”“文约事丰”，以最少最精的文字叙事述物，使志书文字呈显一派“简洁、干净、利索、鲜明”特色，不拖

泥、不带水、不罗嗦,不描写、不渲染、不溢美。以只述不论、只记不渲、就事写事的笔法撰文编志。志体文字的表述忌讳的是可有可无的大话、空话、套话,甚至根本不需要的废话和多余的话。例一,在记述开展某一运动、某项事业、执行某条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时,引用繁琐的发文机关、发文字号、发文标题、发文时间,还有的把领导人的“指示”也不嫌累赘地引上一大段,以此占据和浪费了一定的篇幅。引用这些赘言有无必要?答:可有可无。“可有”的理由是,在近年、在当代可查寻“做事的依据”、“执行的根据”。“可无”的回答是,志存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考察研究的是史事,而非查证某一事的起始来源根据。从长远看,一个文件的出处、一位领导的讲话,在《志》中来说,确是“可无”的。有它无它,无伤大雅。例二,为了“体现唯上、尊崇”,述事前来一番多此一举的套话:“根据党中央……决议,省委……会议精神,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工作中,取得了如下成就:一是……二是……”这些与《志》无关的语言,因“套”致“废”,完全是多余的话。例三,把某些口头语言如写《讲话》《发言》《汇报》稿时的用语写进志书,司空见惯的有:“据统计”、“据调查”、“据了解”、“因此”、“所以”、“并且”、“而且”、“当时”、“当前”、“进一步”、“积极”等等。还有没完没了的“了”字:“开展了”、“进行了”、“举行了”、“完成了”、“实施了”、“实行了”、“竣工了”、“宣传了”、“贯彻了”、“执行了”等等,不胜枚举。主体词本身都明明白白地含有或带有“了”的意思,即“完成”——已成,“执行”——已行,“竣工”——

已竣,“实施”——已施等等,后赘一个口语“了”字显然是画蛇添足。

五十、“民族地区”一议。笔者在许多地方志书和其它文献中常常发现有这样的句子:“×××在民族地区工作了35年”“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复杂,治安任务繁重”、“加强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等等,此处所说的“民族地区”,主要指的是以少数民族为主聚居的地区,如甘南、临夏、天祝、肃南等。

词语解释,“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也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就是各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人数有多有少,居住的地方有大有少。我国56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占据的地方也最大;其他民族人数较少,称为“少数民族”。无论“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构成民族大家庭。“五十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团结起来就是一大家”。汉族尽管人数众多,他也是五十个兄弟民族之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政治生活,社会地位人人平等。他所居住的地方,当说也是“民族地区”。

笔者的疑义是,“民族地区”一说不确切,因为“民族地区”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地方,不单是指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居住的地方也可称“民族地区”。鉴此,建议在表述此意时,不要笼统地用“民族地区”,可否用“少数民族地区”妥当些。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现存三种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版本考辨

王立明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庆阳府知府赵本植修纂的《新修庆阳府志》(四十二卷)标点校勘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点校者之一,在点校过程中,我发现赵本植修纂的《新修庆阳府志》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根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1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可知该刻本尚见于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天津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不全)、南京图书馆、南京地理所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泸州图书馆。第二个版本是(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庆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第22册)。第三个版本是《华池县志》编写组于1979年10月辑录抄写的影印本。

一、三种《新修庆阳府志》版本的异同

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复印本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庆阳府志》绝大部分册页文字相同,只不过前者志中的“真宁”(含《图考》所附《真宁县城图》)未因避雍正胤禛之讳而改作“正宁”。且通过有关页面的文字和第二个版本的相互参照,可确认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复印本是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的原始版本。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庆阳府志》存在的问题,诚如出版社在卷首扉页所言“本书四十二卷,据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刻本影印。书中间有漫漶缺字处,诸馆藏本皆同,无法补配”。其

“漫漶缺字处”,主要存在于《艺文》中。有以下7处:

1.卷之四十二(上)《艺文》第22页、第23页文字付之阙如,即缺少李应奎的《张铁铺记》一文。

2.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13页末尾一行文字付之阙如,即缺庆阳知府傅弘烈《庆阳歌》(二首)的标题及作者姓名、职务、所处朝代的相关文字,使《庆阳歌》第二首全部植入随之紧接的陈斐《合水晓行看山》之后,极易使人误认为是一首诗。

3.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15页前5行文字付之阙如,即缺署名“前人”的《宁赋歌》自“吁嗟乎,庆民此苦!”后的5行文字。

4.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35页中间,在强晟《桥山》诗后,缺强晟《阳周城》诗。

5.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37页后4行缺少傅弘烈《庆阳杂咏》(十首)中的第1首的诗题及作者姓名、职务、所处朝代的相关文字。

6.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39页缺少傅弘烈《庆阳杂咏》(十首)中从“师帅先生履不全”后的第8首、第9首、第10首诗全部内容,却另用李梦阳的《小至》《忆西南陂九日之泛》《九月晦日西南陂再泛》3首诗填补了12行空隙,但尚留出3行空白。

7.卷之四十二(下)《艺文》第44页第3行至第6行缺高观鲤《哭强刺史霓兄弟殉难》诗。

而且,该版本志未将3个《跋》的页面顺序摆布错了,令人一时有文字上下不衔接的感觉,经反复端详后才能分辨明白问题之所在。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庆阳府志》所谓的“漫漶缺字处”,均可从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

本全部补齐,由此看出其所谓“诸馆藏本皆同,无法补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说明该出版社影印时未知《新修庆阳府志》的版别,未见到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也更能证明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确系最原始的版本。

《华池县志》编写组辑录抄写影印本,错讹实在太多。该本在抄写过程中,除有错、脱、倒、衍等一般性错误外,还有整段、整篇(首)文字缺漏、衍出的情况发生。现不惜篇幅,举其要者如下:

1.《艺文志·记》阙文

首篇,即缺梁李启明《柱国牛公新筑州城创建公署记》。在李梦阳《华池杂记》后,缺李应奎《张铁铺记》。在杨天宠《段公庙碑》后,缺卜瑗《重修段公祠碑》。

2.《艺文志·诗·五古》阙文、衍文

(1)赵本植《环县岁饥,筑城代赈,予往来寒暑中,赋长句以志其事》诗在“畚鍤疾如雨”句后缺“不见书城郎,非时病吾鲁。不见秦蒙恬,遣戍生怨府。忍俾沟壑填,矜全及寡户(见《小雅》)”一段。

(2)李梦阳《从军》诗本为四首,但华池抄本仅有二首,缺二首。李梦阳《塞上杂诗》本为二首,但华池抄本仅有一首,缺一首。

(3)缺石茂华《驻节乾盐池》、陈凤《望灵武台有感》、李仲熊《赠真宁巩母褚夫人旌节》诗三首。

(4)衍文。增加了原志没有的李梦阳诗《喜雨》(二首)、《郊园步花》(一首)。

3.《艺文志·诗·长短句》阙文

(1)傅弘烈诗《庆阳歌》(二首)无标题,第一首诗阙如,第二首全部植入陈棐诗《合水晓行看山》之后,使人误认为是一首诗。

(2)署名“前人”的诗《宁赋歌》在“吁嗟乎,庆民此苦!”之后,阙文如下:

“郡所共宁赋,之加更重重。

君不见,思齐据州南山巅,明祖怒之赋税偏。

君不见,边饥借支供西夏,权宜一旦成久假。

此恨亟需达九重,谁似长沙痛哭者?

嗟予沥血百千言,万里君门无由写!”

4.《艺文志·诗·五律》阙文

(1)李梦阳诗《春日漫成》后,缺谭元礼诗《赠

巩母褚夫人旌节》。

(2)孙良贵诗《癸酉大暑后晦夜洪德城查赈》后,缺高观鲤诗《灵武古台》。

5.《艺文志·诗·七律》阙文

(1)在强晟诗《桥山》后,缺强晟诗《阳周城》。

(2)在巩尔馨诗《温泉夜月》后,缺巩尔馨诗《过景忠烈公庙和韵》(二律)。

(3)在高观鲤诗《环城怀古》后,缺高观鲤诗《哭强刺史霓兄弟殉难》。

(4)在胡俊诗《阅张庆人遗文,回溯昔游,不禁怆然涕下》后,缺韩观奇诗《春日登镇朔楼》。增加了原志没有的孙良贵诗《庆阳怀古(和张学政作第二首)》。

二、版本一和版本二文字变动原因浅析

从上文比较中,我们知道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新修庆阳府志》是原始版本,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专辑·庆阳府志》是修订本。通过研究两个版本抽换的文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修订本注意了避讳,订正了涉及的避讳文字。如因避雍正胤禛之讳,将原始版本中的所有“真宁”(含《图考》所附《真宁县城图》)改作“正宁”。

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替换敏感文字。修订本编者不惜违反志书体例,将清代傅弘烈诗《庆阳歌》《庆阳杂咏》(十首)基本替换为明代李梦阳的《小至》《忆西南陂九日之泛》《九月晦日西南陂再泛》3首诗。而反观《庆阳杂咏》,其内容无非是反映了傅弘烈任职庆阳知府后,庆阳府存在着赋税奇高、民吏均不聊生的状况。如“吁嗟乎,万亩干原空有土,九州谁似庆州苦”、“大有犹苦税难完,大荒安贡一王赋”、“吁嗟乎,民生疮孔日以多,无儿可卖更若何?君不见,新征旧欠累万千,官亦除荒缺俸钱”、“满野哀鸿嗟羽肃,离乡士女尽衣牵”、“莫说人间主纳赋,犹愁宦署也成田”修订本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将这些文字基本替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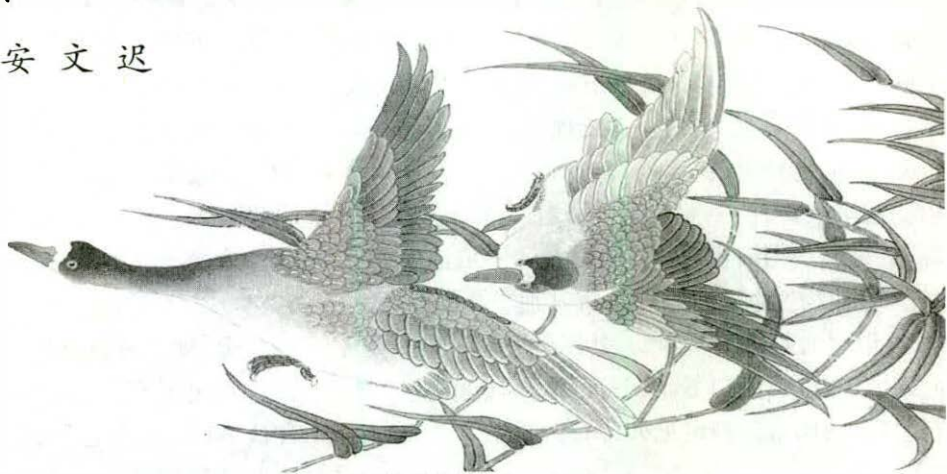
好在有青海省图书馆馆藏刻本《新修庆阳府志》,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中,发现玄机,弄清事情的真相。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肃王只取李
 皇亲宗室
 方信内祀也

今昔肃王府(下)

安文迟



(接《甘肃史志》2013年第一期)

五、千秋碧血痕

碧血碑是明肃王府内一通石碑，上刻肃宪王绅尧的一首诗，但它确有一段血洒石碑的贞烈故事。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阶级矛盾加剧，加之天灾不断，各级官府不但不予赈济，反而加征赋税，造成饥馑连年、哀鸿遍野的悲惨境况。广大农民无以生路，遂奋起反抗，形成了“群盗满山，四方鼎沸”的壮阔局面。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陕甘地区的农民军在明军的追剿下，遭受严重损失，李自成率农民主力军退出陕甘，活动在三陇地区的一小股农民武装，未获重大战果。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分兵四出，扫荡明王朝在西北的势力，农民军所到之处，明王朝军政机关土崩瓦解，陕甘农民革命形势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局面。

十一月，李自成遣大将刘宗敏率军五万人入陇东，潜伏在这一带山区的农民军复出，加强活动，积极配合。宣统年间《甘肃新通志》载：“自成大发兵攻屠榆林，遂乘胜降宁夏，屠庆阳，韩王稟塔被执，副使段复兴一门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自成别将贺锦移攻兰州，巡抚林日瑞等死之。肃王识铉被执，宗人皆死。”，当时，李自成农民大军势如破竹，连攻数城，十一月下旬，

贺锦率领的农民军直逼兰州城下，兰州人民自动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的到来，由于来势甚猛，肃王府的官兵未来得及抵抗，肃王朱识铉被农民军生擒处决。

当时，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卒率宫人二百余，由邸园奔上北城墙，欲投河自尽，由于闯王军队追了上来，颜氏、顾氏当即以头触肃宪王诗碑而歿，其余妃嫔、宫人皆刎颈而亡。后来人们将此诗碑唤作“碧血碑”。

清景廉曾作《碧血碑》诗载于《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诗)》。全文曰：“明崇祯末，流寇(指农民军——著者)陷京师，逆党西走陇右，破兰垣，肃藩遇害，三妃同时殉节，迄今拂云楼下碑阴渍血犹新。”

殉夫兼殉国，生气凛然存。
 一代红颜节，千秋碧血痕。
 乾坤留短碣，风雨泣贞魂。
 凭吊增悲感，楼头日色昏。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督署后园建烈妃庙。他在《烈妃庙记》中云：“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遣贼(指农民军——著者)陷兰州，执肃世子识铉，不屈遇害，三年明亡。方贼之陷城也，肃王妃颜氏、赵氏、嫔田氏、杨氏，仓卒率宫人二百余，由邸园北城楼将投河，贼追急，颜妃遂以

首触肃先王所书碑死。”(摘自庄泽宣《西北视察记》1931年)

左宗棠在修葺督署后花园时记：“园中有肃王烈妃大冢，及肃藩僚属两家，余既废延祿亭为烈妃庙，复废环碧山庄为忠义祠，祀肃王僚属。”左宗棠在建烈妃庙时，为文记之，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

左宗棠曾有“一杯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的楹联，深情缅怀殉夫殉明王朝的贞洁嫔妃。《庄子·外物》载：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以碧血石称赞其烈妇，其评价可谓高矣。《碧血碑》高3.6米，宽1.6米，碑面除“肃藩翰墨”、“磐石之宗”两印章清晰可见外，尚有60字。碑文为：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
边城春柳解娉娑，别殿香风□□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衷□□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欢□□，□堪回首阻关河。

“碧血碑”现存兰州工人文化宫南部，永远是末代肃王的见证。曾任甘肃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长的王烜曾写《碧血碑词》：“拂云楼，矗城北。下有碑，号碧血。碧不风吹尽，血不雨淋灭。缕缕留殷血，天殷乃赫赫。嗟乎顾与颜，千秋犹烈。”

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周应泮(1865年—1944年)曾有《拂云楼》诗：“阅尽兴亡是此楼，茫茫凭吊几千秋。朝云暮雨归何处，秋月春风忆旧游。”“风月凄凉歌舞歇，河山寂寞藩屏绝。不见当年楼上人，百尺碑头留碧血。”民国慕寿棋碧血碑联：“古墓几朝存，锈成一片肝肠铁；边城阴雨湿，流作千秋血泪碑。”

六、肃王陵墓

明代帝王都追求厚葬，北京有十三陵，南京有孝陵卫，明代肃王也在甘肃榆中县境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墓，人称“甘肃十三陵”。

坟墓一律坐北朝南，全部用青砖砌成，有三道门，顶呈拱形，内分五室，其中两室是耳室，和北京

十三陵相似。

十一位肃王中，有肃庄王、肃康王、肃简王、肃恭王、肃靖王、肃昭王、肃懿王、肃怀王、肃宪王夫人薛氏、肃王识鏊的陵墓，都在米紫堡至寿隆沟平顶峰，次第排列，若望山陵。肃定王弼桃的陵墓在榆中县西圃子湾，肃宪王绅尧的陵墓在榆中县西南二十里周家山。历代肃王的陵墓规模宏大雄伟，结构严密复杂，充分展现了明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肃王的陵墓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平顶峰的陵墓多数被盗，墓内的殉葬品大都佚失。正是：“草疏空寂落，冢毁任凄凉。青山浑不语，默默记兴亡。”

七、陕甘总督府

明肃王府到了清代初为巡抚府，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改为总督府。

清康熙元年(1662年)巡抚都御史刘斗自甘州(今张掖)移驻凉州，五年(1666年)复移驻兰州：创建为巡抚府。刘斗为兰州新建巡抚府题名碑记，碑上详细记载甘肃“满目黄沙，寒烟数点，岩城一线，孤系天垠，且地瘠民贫，逃亡过半，赋逋如山，壤亟于雨”的经过战争摧残的甘肃人生活的悲惨情景，并提出“请免积逋三十万”，“可民命稍苏越五年”的请求。

碑上还记载修建巡抚府的原因及过程，清代甘肃已从陕西分出，“又以宁夏、平、庆裁归甘肃”，又将巡抚府移驻兰州，当时兰州在明末经过战争破坏，肃王府一片瓦砾，“未有衙宇，其何以息事而宁人，无已惟故肃邸遗址(指肃王府)”，刘斗选定肃王府的遗址来重建巡抚府。“挥瓦砾，披荆榛”，开始建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春天，完成于夏天，“六月上浣(指上旬)而视事”。碑中在写建设的过程中载道：“是役也，地取诸废藩，材取诸市易，砖石取诸烬余，夫匠役取诸雇募，不劳民，不捐帑(钱币)，屹乎峙都会焉？”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总督来驻，巡抚府遂改总督府。据《甘肃新通志》载：总督署“方广二里，中为大堂，堂前东西为官厅，为巡捕厅，后为二堂，堂东为大书院，为‘集益轩’，又后三堂，最后为内宅，为花园，大堂为宜门，门外为立中居正坊，坊东为土地祠，西为集房，南为大门，又南辕门，辕门

外旗杆各二,署东为箭道(新设督练公所于内),署西为笔帖式二署。”

乾隆三年(1738年)巡抚元展成在总督府西侧(《甘肃新通志》载“在省城中偏北”)建立庆祝宫,“正殿五间;东西朝房十八间,拜庭、牌坊具备”,目的是为清王朝歌功颂德,“恭逢万圣节及元旦冬至日,为百官朝贺之所,每月朔望(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庆祝宫富丽堂皇,极为壮观,黄瓦鳞比,瑞彩纷披,朱轩鸟跂,挹二仪之悬象,输百尔之丹衷,未央庭燎,恍若可见。“建设庆祝宫共需材料工价银5146两,皆取资于历年库存;”而修建者仍称“不扰民,不累官”,实际上是甘肃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供统治阶级的官员朝贺天子之用,所谓“天子受祉,百工稽首,永勒金石,四方来贺。”

清陕甘总督谭钟麟曾有总督署大堂联:“三代之边在民,毋作好也,毋作恶也;四民观化于我,何以当之,何以教之?”又为陕甘总督署仪门联:“政简刑轻,所期黑山红水,同登乐土;民安物阜,从此五风十雨,共步阳台。”

注:①笔帖式 官名,蒙语必阁赤,满语巴克赤。顺治入关后,汉语译为笔帖式,其初为文职的赐名。康熙时,各部院衙门皆置笔帖式,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有七品、八品、九品之分。

八、千重树色荫楼台

明肃王府的凝熙园,在肃王府东北角,垒石为山,东有庭院,中有桥,桥西亦有庭院,山下有洞,洞中塑像甚佳。洞下可通至城西雷坛,窥之黝然而深黑,莫敢入者。

清嘉庆、道光年间;总督那彦成数加修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遣戍伊犁,途经兰州,总督富海颿(富呢扬阿)在总督署留饭,他在日记中曾对后园作了记叙:“其署中后园甚宽整,连及北城,之上有楼曰拂云楼,登楼望北岸诸山,俯瞰黄河,眼界颇佳,其下有小碑林,镌怀素、米(芾)、董(其昌),诸帖于壁;皆那文毅公(即那彦式,嘉庆间任陕甘总督)所留物也。”(摘林则徐《荷戈纪程》)

道光四年(1824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墓刻米芾行书《虹县诗帖》共石十块,并附跋语、附录、备考。同年,摹刻《怀素自叙帖》,并附跋语、附录、备

考。这些碑石皆藏于省城督署后院碑洞,实为一大功德。(摘《甘肃新通志·艺文志·金石》)

光绪年间,总督左宗棠重修凝熙园,称“节园”。园北有阁曰“澄清”,引黄河水经其前汇为二池,东行北折。砌外垣如雉蝶状,曰:“三受降城”。河水复南行绕“瑞谷亭”之东,以东南出园。有巨石矗立,左宗棠题之曰“砥柱”。出园外南复为池,名曰:“饮和”。砥柱之西有土山,左宗棠题曰“太华夜月”。山之西麓有亭,曰“一去”。其南为“贞烈遗阡”,阡上有亭。澄清阁西有“烈妃祠”,旧为“延禄亭”。太华夜之前旧有屋,曰“环碧山庄”,左宗棠改为忠义祠,祀肃藩、僚属及总督杨岳斌从之死难者。其东有碑洞,原为那彦成所修。园西墙外亦有池,名曰:“扼清”。扼清、饮和池之水,与民共之,汲取者时属于途。园北登城则至“拂云楼”。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署后花园——“节园”,曾留有不少楹联、诗文。澄清阁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拂云楼联:“积石导流归大海,崆峒倚剑上重霄”。节园榭亭联:“八月榭横天上落,连畦菜长故园春。”节园饮和池联:“空潭泻春,若其天放;明漪绝底,饮之太和。”

清陕甘总督升允节园碧洞联:“匿景藏光,嘉遁养浩;循图访典,志泰捐雕。”

陕甘总督杨遇春在《拂云楼记》中,曾对拂云楼之大观作了生动的描述:“高插天关,云岭矗其前,黄流绕其下,西有木塔,李峪之雄,南有五泉,桦林之秀,盖极天下之大观矣。楼固枕北城上;今夏公余偶登,俯看城垣渐圯,乃于众僚属捐廉更新。南北仪事补葺,东西则楼堞券洞,半行拆卸,仍其基础,甃以砖石,使以丹雘,鳩工募力,不日落成。”多少文人达士曾为拂云楼吟诗作赋。清·鄂弥达有《拂云楼诗》:

拂云高阁势崔嵬,
耸秀河山面面开。
万顷涛光寒九壑,
千重树色荫楼台。
平川芳草王孙度,
曲峡芙蓉少女裁。
八郡苍生歌饭熟,

筹边漫道伏波才。

清·谭嗣同《拂云楼诗》：

作赋豪情脱帻投，
不关王粲感登楼。
烟消大漠群山出，
河入长天落日浮。
白塔无俦飞鸟回，
苍梧有泪断碑愁。
惊心梁苑风流尽，
欲把兴亡数到头。

清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督甘，住在总督府。左宗棠和湘人名士郭嵩焘从往至深，一次郭给左写信说：“目前西方各国都市，皆有园之设，供市民游览。兰州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可仿西方开辟公园，以庆升平。”左宗棠采纳了郭的建议，于是年四月开放“节园”，供市民游览。并许从北城墙上，西至西城门，东至东城门为游览区。并在园内“备香茗”，置“瓷碗百余，供游者解渴。”左宗棠离甘后，节园又成禁区。宣统元年(1909年)秋八月，毛庆藩督甘，又开放此园，但门卫森严，游人多为却步。

九、修建兰州城池

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移驻兰州。六年(1667年)，巡抚刘斗补修重建城楼。二十四年(1686年)，巡抚叶穆济修。乾隆三年(1738年)巡抚元展成砖包全城。二十八年(1763年)，巡抚常钧嘉、嘉庆十六年(1811年)，总督那彦成皆加修葺。道光十三年(1833年)，总督杨遇春再葺，并易门名，内城改“承恩”曰“来煦”，永宁曰“镇远”，崇文曰“皋兰”，外郭改天堑曰“庆安”，天水曰“通济”，永康曰“安定”，靖安曰“静安”，余如旧，惟静安久闭。同治元年(1862年)，护督恩麟增修四密城重门。二年(1863年)，浚外壕。六年(1867年)署督穆图善再浚。光绪三年(1877年)，总督左宗棠、十四年(1888年)，总督谭钟麟、十六年(1890年)，总督杨昌浚屡修。三十年(1904年)夏，黄河水溢，东郭城址被冲，敌楼亦圯，旋补葺之。《甘肃新通志》建置志·城池

巡抚元展成《兰城碑记》载：“是役也，兴于三年之二月，竣于六月。丹楼霞举，粉堞雾列，城毕之后，岁则有秋，阡陌绣错，掩映如昼。”可见当时兰州城墙整修之后的壮观。

刘于义在《会城记》中记载：“兰州旧城东西南俱系土垣，惟北而下临黄河，虽用砖包，而石岸被水冲啮，年深倾圯，故城垣残剥尤甚，兹则北而竖筑石基，再加石堤为护，既已永固无虑，而凡四面城垣、女墙、悉起，窑工烧砖包裹，蔚为壮观。是役兴于乾隆三年二月，建五月中余适以事至兰谯楼、雉堞，焕然一新。兴筑之役，寓赈恤之慈于固圉保拜之中，得仁民爱物之道，宜乎！工甚巨而效神速也。”

“共用城砖 3808088 块，土坯 3625096 块，瓦 82000 页，石条 13128 丈，山石 10640000，石灰 4957793 升，大小木植 1210 根，浆米 570000 石 9 斗，木、石、泥各匠 52230 工，民夫 121232 工。(原文为汉字数码——著者)并详志之，以备后人之观览焉！乾隆年间，耗费如此巨大资财，修筑城墙，可惜这些遗迹在兰州市城市建设中均已拆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实为可惜。一个古老的城市，“金汤设险，以固辐域，而兰为省会，要区锁钥”，让后人怎样去寻找金城古老的印痕。

十、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甘肃省都督、将军、督军署，甘肃省政府的办公所地仍为明肃王府。历任甘肃省最高行政长官有赵惟熙、张炳华、张广建、蔡成勋、陆洪涛、薛笃弼、刘郁芬、孙连仲、马鸿宾、马文车、邵力子、邓宝珊、朱绍良、于学忠、贺耀组、谷正伦、郭寄嶠、马鸿逵、王治岐等 19 人。

清至民国，昔日之陕甘总督署之布局，已经有听改变。根据庄泽宣(1895—1976年)1936年《西北视察记》记载：“省府已实行合署办公，署在城之中央偏北。署之中心为民政厅，后为主席办公处，左为教育、建设二厅，右为财政厅。自署南行，为南大街；东行为东大街；西行经鼓楼为西大街，皆市廛密接，但高楼甚少，街亦不长。”

在此之前，宣侠父(1899—1938年)在他的1930年《西北·远征记》中，对督署 1925 年的布局，也作了记载：

“督署的大门前，并峙着两株高入云霄的大旗杆。这是明朝肃王府的旧基，清朝是陕甘总督衙门，所以规模非常宏大，几乎占了兰州全城五分之一的面积。我走进大堂，大堂上排列着枪刀矛戟这一类的武器，前后密悬歌功颂德的匾额。走过了二堂，寻着我们暂时住处，却是在西偏院内，和参谋处同院居住。”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甘肃解放前，省政府内教育、民政、建设、财政四个厅与秘书处合署办公。甘肃省保安司令部警卫大队，人数一千余人，驻省政府后花园营房(今省工信委大楼处)。甘肃保安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内。

抗战时期，原省政府内的大堂改为中山堂。中山堂有楹联：惟公揭平等自由独立解放之旗，唤起四百兆同胞，有如春风来临，瞻仰遗容思报国；此地乃金城王塞古杰时贤所在，继承五千年历史，好挟黄河东下，誓除倭寇出重洋。”

甘肃省府气势恢宏，牛剑秋曾作门联：“九曲波平，椒花作颂书金管；三边峰靖，杨柳迎春度玉门。”

民政厅进思堂联：“步步进行，作事当顶天立地；时时思考，在官应济物利民。”

建设厅进用堂联：“宦游四载，壮志未酬，看农林工商矿甫具萌芽，恐辜负玉塞葡萄，金城杨柳；胜地重三边，环奇待辟，愿汉满蒙回藏共殚心力，齐造成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财政厅联：“此地勉为廉吏易，天才欲慰小民难。”

十一、民国时期甘肃省府后花园

明凝熙园，清为节园，民国八年(1919年)，督军张广建于澄清阁西、烈女祠东建一亭，曰“来鹤”，又改筑一去亭曰“船亭”。民国十二年(1923年)，督军陆洪涛凿池船亭之南，遍植以莲芡；又筑室园于西北隅名曰“柳庄”。民国十五年(1926年)改为中山东园。陆洪涛为柳庄作楹联：“躬耕乐道追莘野；抱膝长吟忆草庐。”

1926年，宣侠父《西北远征记》中写道：“花苑的范围非常广大，后临城堞，登城闲眺，泛滥的黄河以及北岸诸山，都历历映入眼底。园内花草杂蒨，老树参天，然而在这初冬的天气，满地的落叶，

和枯萎的花草，全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一切园林所有的美，都被无情的秋风所摧毁了。”

“塔影移占据花苑的南角，曲曲的栏杆回绕着三间平屋，后院有偏门通着刘氏(指刘郁芬——著者)的休息室，有一座土山环抱着，屋外遍植桃李、葡萄等各种花木；这是张广建督甘时的书斋，现在却成了我们小有的天下了。”

宣侠父的记载，虽然有些凄凉悲怆，但也可以窥视出省政府后花园的景色。

1936年4月，庄泽宣在他的《西北视察记》中对省政府后花园作了详细的叙述，因为是春季，百花盛开，草木发绿，显示一派生机。“后花园原名节园，面积甚大，有亭榭花木之胜，余初至时梨花盛开，自青(海)归来，则牡丹已含苞欲放。”“园之中央有榭亭，高形阜上，其形如榭，为同治十二年左宗棠所建，颜曰“一系”，现为省府会议厅宴会宾客处。榭亭前后牡丹颇多，盛开时每株开花一二百朵，每朵大可三四寸。丰腴艳丽，为各地所无。东数武为贞烈遗阡及忠义冢；东北隅长廊曲折，旁有翎毛鸡、狗熊等奇禽异兽数种，围以铁丝；再北有碑洞，壁间满嵌怀素、米海岳、董重光诸先贤手迹。过北山一门，古长城也，相传为秦蒙恬督军所筑。城上有楼；旧城源远楼，创建时代已不可考；今称拂云楼，朱绍良在任时，加以修葺，窗牖栋宇，轮奂一新。楼高二层，北临黄河，铁桥横亘其上，翻水车轮远挂城边，南望兰垣了如指掌。”

从明凝熙园、节园，到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东园，花园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已具有北方园林的特色。

除了中山东园外，又有中山西园，在甘肃省府民政厅后，旧名“望园”，又名“鸣鹤园”。清道光年间布政使和德润修之，更名“若已有园”。自旧藩署“乐寿亭东入门”，有亭曰“四照亭”。

东偏有小池，池北有小楼曰“夕佳楼”。前有潭水，水自西关外引阿干河入城，经宫沟沿以入园，自园之西南而东流以汇于潭。四照亭北有桥跨水上。过桥至园之北垣有巨室五楹，曰“蔬香馆”，中有木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书“圣主得贤臣颂”。馆西有游廊，通西北隅有亭，曰“天香”。迤南为“花神庙”，又南为“月波亭”。西南有小山，山之

东有楼，曰“拱辰”。东有小阁架石门，曰“昆仑之墟”，由是稍东复至四照亭。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此园为兰州公园，后改为中山西园。

十二、辕门前的“午炮”

民国初年，直到1949年8月兰州解放，兰州报时不用敲钟而用放炮。每天放三次，早晨五六点放的叫“醒炮”，中午十二时放的叫“午炮”；晚九时放的叫“二炮”。一般的统称“午炮”。有时，一昼夜放五次炮。除了上述三声炮外，另外在黄昏时放的叫“头炮”，也叫“定更炮”；半夜两点放的炮叫“子炮”。醒炮、午炮是起床和午饭、午休的号炮，二炮则是关锁城门，禁止行人，熄灯入睡的号炮。

民国初年，有时白天要放六声炮，这增放的三声炮，不是报时炮，而是大帅出府(又叫“大帅起轿”)的号炮。时任甘肃督军陆洪涛，在乘轿出辕门时，要放三声炮，并鸣锣开道；令行人肃静回避。

当时用的炮以生铁铸造炮筒，高约40厘米，直径约10厘米许，内装火药，引入火药线；上心捣实黄土，竖立在地，用粗香点燃，一声巨响，声闻十数里。

火炮置放地点在省政府门前月牙桥旁，抗日战争时期移至白塔山顶，后移至曹家厅以南城墙上鸣放。午炮直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才停止。

兰州辕门前的标准钟是1944年西北钟表行朱建中制作安装的，直径70厘米，四面钟。每天中午放炮报时，就以此钟为准。兰州人留下一条谜语：“群众观点——打兰州一景”。此钟一直到1969年才拆掉，延用25年。钟塔的显眼位置上铸成“把握时间”的箴言。

朱建中，山东淄川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1994年4月建成兰州钟院，恢复了兰州八景之一——兰州晨钟。

十三、鸿门宴刀光剑影

民国十四年(1925年)，甘肃督军陆洪涛患病瘫痪，旅长李长清与张兆钾暗中勾结，打算迎张代陆，自己接替张兆钾当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派亲信施国藩到兰州联络各方，酝酿倒陆拥己，但他打算在取代陆后，把陇东镇守使的位子留给儿子张柱。李长清闻此声，预谋先夺陆的师长职务，掌握军权

后再夺省督军，因为计划得不到旅长黄得贵赞同，遂决定先除去黄。

是年9月27日，陆洪涛遣其妻徐氏先行往天津，然后自己再离开甘肃。李长清乘机发难，事先安排好了围攻华林山黄得贵旅的驻地，又邀黄一同前往送行，他们送陆洪涛的妻子刚出城，李长清就借故先回，黄得贵继续再送一程，李长清指挥军队突然袭击黄得贵旅，缴其枪械。黄于返城途中闻变，未敢入城。后收集溃散部下数百人，退到兰州城南阿干镇驻扎。李长清赶走黄得贵后，加紧胁迫陆洪涛。陆洪涛迫于无奈，只好让李当了师长，自己卸任，仓皇离兰。在中途给段祺瑞、冯玉祥发了电报，告以李长清搞兵变自己被迫出走的理由。

1925年8月24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任命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冯玉祥即派刘郁芬、蒋鸿遇分任正副总指挥，率师入甘。刘到兰后督署，时李长清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驻扎在兰州城郊。刘郁芬到兰州布置防务，表面上与李握手言欢，但对李飞扬跋扈深为不满，寻机予以除之。

刘郁芬提出李部移驻兰州之外，以宁夏、陇东、兰山三道，任择其一。李长清坚不欲往，仍驻省垣东关外大校场和拱星墩一带。李提出将所部两旅外另编一混成旅，由包玉祥为旅长，刘郁芬与蒋鸿遇断然拒绝。这时，冯玉祥军扩充编制，孙良诚旅扩编为第二师，刘提出将包玉祥旅调归孙良诚指挥，“李以甘肃士兵与他部混合，颇不相宜”为词，拒未受命。刘郁芬感到非除李长清不可，乃电报向冯玉祥请示，谓“李长清叛逆显露，拟相机图之”。冯复电“嘱慎密办理”，批准刘郁芬杀李。

1925年11月11日，刘郁芬假称已奉中央命令，任命李长清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表示为李要好好庆贺一下。是日，先宴地方各机关行政长官。2日，复宴李长清及部下。事先，刘已预召孙良诚、张维玺入署，密授方略，布置张部在五泉山一带进入阵地，并派一部绕至大校场以东之拱星墩；同时秘密调集炮兵，在白塔山和五泉山上设置炮位，对准李长清驻军防地；令驻阿干镇之黄得贵部暂开至拱星墩以东之金家崖；孙良诚部则密布督署之内，团长梁冠英、安树德等率手枪队伺于督署后花园之土山后。闻李长清擅长武术，又特意安

排力大无穷、身怀绝技的营长赵登禹扮作勤务兵，专门对付李。李长清接到邀请，怀疑有诈，但自己准备尚未就绪，无把握与刘抗衡，考虑如不去，刘更加怀疑。

当日上午10时，李偕包至参谋长魏鸿发(绍武)山字石私寓，约魏一同赴宴。李等刚入督署，大门立即关闭，伏兵四起，李、包及魏被引入参谋处后之“方圃”休息。刹那，手枪队实弹持枪而入，枪口直指三人胸膛。李等未及反抗，三人同时被缚，押往署后花园。三人押至花园榭亭东侧，蒋鸿遇自土丘上下来，喝令手枪队将魏放开。魏问蒋：“究系何事？”蒋言：“他二人(指李、包)屡次抗命，竟敢将步哨放至广武门，公然与政府为敌，如何能容。”即喝令将李、包押走，命魏至大厅听刘总指挥讲话。

刘郁芬在大厅，声色俱厉，略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李、包等反抗命令，公然与政府作对，实为国法所不容，今天我已将队伍布置停当，看谁再来抗命，与他一拼。”“你们是违抗政府，还是听从政府命令？”众口同声答应：“我们都愿听从政府命令。”众皆禁若寒蝉，俯首唯唯而退。

李长清等被十几个大刀队员，高举着明晃晃的大刀，押着转过土山。约莫半小时，第二师军法处处长王法仁带了两名铁工，从西苑门走向园丁所住的土屋内，给李长清去钉镣。不一会儿，有一个兵士将李长清从土屋中，驮到土山西麓的土地庙内，是一种狼狈的情形，可笑而又可怜。李氏因在土地庙以后，就有一位参谋勒令李氏亲笔写下一个命令，大意是：“部下切勿盲动，使他的性命发生危险，听候刘氏改编云云。命令写好了，刘氏就令李氏的参谋长魏道明拿到东校场宣示全军。

和李氏同时被捕的除了包玉祥外，还有一位姓华的营长，这些都是李长清的死党。还有一位营长，进了督署的东偏门，猛然听到里面几声枪响，知道事已不妙，急忙勒马往回走，被一个卫兵拉住丝缰，加以阻止，但是，那位营长还是用足跟力蹶马腹，想冲出重围去，忽然另一个卫兵奔上前去，向脑后奋力一刀，一片天灵盖就和瓜皮样滴溜溜飞出一丈以外，走入另一个世界去了。

11月16日凌晨二时，李长清、包玉祥和营长华连升被刘部用布勒死，埋在督署后花园内。翌

日，督署煌煌的布告说：“已将李、包等解送包头，听候冯督办亲自审讯发落。”

后来，取消陆军第一师的番号，部队改编成两混成旅。

一个人权欲熏心，最终又被权欲吞噬，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人们不久也将此事忘怀了。

后来魏绍武先生在《东花园事变三十二韵》中写道：

叛逆今业惩首恶，
盲从无罪当留情。
可怜数载共袍泽，
异路幽明泪暗零。
梅花滴雨经红泪，
黄水临风咽苦声。
熊黑叱咤疏韬略，
魂魄冤仰伴碧莹。
从来疑案成三字，
大将自古几保身。
三陇乱阶从此始，
河湟事变为此因。
三军闻悉成鼎沸，
誓救将军各请缨。
总帅招我面告诚，
衔命奔驰安魄鲸。
东郊各寨曾亲历，
声泪俱下表精诚。
官兵一体齐听命，
邻火居然徒积薪。
余生自庆心无愧，
忘命且知救庶民。
韶华已过十余载，
每怀往事辄沾巾。

注：魏绍武(1887—1982年)，又名魏鸿发，甘谷人，国民党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常务委员。

十四、船亭议事

省政府后花园之船亭(原为“榭亭”)，民国时期为省政府的议事亭和接待处。至今甘肃省档案馆

仍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省政府船亭议事的会议记录,格式一致,毛笔字行、楷记录,年、月、日,出席人员、列席人员、主席、记录等——记录在案。这里我们查阅了一份《甘肃省工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时间是民国三十年七月九日下午六时,地点——省政府船亭。出席的理事:谷正伦、翁文灏(孙越崎代)、钱昌照(杜殿英代)、孙越琦、杜殿英、张维、陈国梁、张心一。列席张广宇、阎树松。缺席理事朱一民、沈怡、许本纯。主席谷正伦,记录吴伯琼。一、开会如仪;二、报告事项,杜理事报告各厂局及水泥公司筹办经过。三、讨论事项:(1)拟定各合办事业省会投资比例请公决案。决议:“照表通过”。(2)拟定甘肃机器厂计划大纲及组织章程提请公决案。决议:“修正通过”。(3)拟定甘肃酒精计划大纲及组织章程提请公决案。决议:“修正通过”。(4)拟定永登煤矿计划大纲及组织章程提请公决案。决议:“修正通过”。(5)拟请聘阎树松为甘肃机器厂厂长请公决案。决议:“通过”。(6)拟请沈颢泰为甘肃酒精厂厂长请公决案。决议:“通过”。(7)拟请聘刘宝忠为永登煤矿局局长请公决案。决议:“通过”。张理事心一提议:各厂局计划及设备概算,业经本日公议通过,记录在卷,惟现在交通不便,材料来源缺乏,市价颇不稳定,而建筑工程又非能克日办竣,为避免将来物价增涨牵动概算,影响建厂计划起见,拟请准视实际需要情形,将来由各厂局呈请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府核准,增加其资本金额,仍由会省双方按照原投资比例担任,可否请公决案。决议:“通过并由会呈报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府备案”。四、散会。

我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段会议记录,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民国十年(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国民党已迁往陪都重庆,兰州市抗战的大后方,工业生产很落后,而且又严重缺乏资金,甘肃省府主席谷正伦聘请张心一为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甘肃临夏人,清华1914级学生,毕业后赴美,学畜牧和农业经济,归国后曾先后任职于金陵大学和中国银行。1940年11月,谷正伦任甘省政府主席,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谷正伦提出三项施政原则,其中第三项就是“借助中央,开发地方富源,培养地方,提供抗战需要”。用

今天的话说,就是引进外资,开发甘肃。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建甘肃机器厂、甘肃酒精厂、永登煤矿厂。甘肃省府与资源委员会的投资比例悬殊甚大,几乎是2:8(原定4:6),甘肃省府的投资主要是旧厂房、旧设备和人员,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资金投入,购买设备,扩大生产。甘肃机器厂原定省方担任400万元,会方担任2600万元,省方由水利农矿公司拨2549356.73元,机器造币两厂机料价值拨1450745.27元。1942年甘肃机器厂在土门墩征地建立新厂房,1943年由萃英门正式搬入投产,即现在的兰州通用机器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工业“利用中央,培养地方”的一个重要举措。抗战胜利后,这些企业都归入甘肃地方,即后来的甘肃煤矿局、甘肃化工材料厂、甘肃机器厂,一直到1949年8月兰州解放。

1941年7月参加“船亭”会议的甘肃省工矿理事会理事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时任国民党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2年5月7日,在甘肃机器厂新厂奠基典礼的致辞中称:“吾以农业之国,更以工业建国,今日甘肃机器厂举行奠基典礼,可谓西北机器工业之基础,而东南、西南、西北三大机器厂,亦与焉完成,吾人今后即自力更生,无惧敌人之封锁矣!”可见当时对甘肃工业之重视。理事钱昌照是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理事孙越琦也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琦对开发玉门油矿建立了功勋,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孙越琦生于1893年10月,1995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谷正伦在甘肃省主席任内的“经济措施”,为国民党中央所肯定,1946年10月,被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1953年11月3日,病逝于台湾,终年63岁。

“船亭议事”,已经是60年前的事,历史只是瞬间,这些历史陈迹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也是有所深思的。

十五、国民党甘肃省府溃逃河西

1949年8月24日深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已转青海,由副长官刘任代理长官职务)迫令甘肃省府立即撤离兰州。25日晨,代主席丁

宜中率领省府职员逃往河西。大部分中下级职员，由财政厅各发遣散费白洋(银元)20元。当晚住永登县，26日到达武威。主要人员驻武威专员公署，中、下级职员分住武威县政府和武威师范学校。

随代主席丁宜中逃往河西的省府高级人员有民政厅厅长马继周、财政厅厅长寇永吉、建设厅厅长骆力学、教育厅厅长宋恪，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崔世昌、社会处处长余衡达、会计长朱煌、地政局长何让、田粮处处长吕宗祐、兰州市长孙汝楠、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王富国、兰州市警察局局长郭庄、武威市专员张作谋、临洮专员何世英、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秘书长张开选等。其中王富国随即由武威离去，扬言赴民勤赴绥远靠拢他们的总机构。何让自以为是地政专家，新政府或许还需要他，亦留武威。其余随行的二三百中、小职员，由丁宜中召集讲话，告以前途无望，不必同退，并再次发给遣散费白洋20元作第二次遣散。于是又再退到张掖。退张掖时，武威专员傅子赉同行。这时随行的中下级职员还有百人左右。到张掖不久，又奉长官公署命令，向酒泉撤退。

9月23日，刘任突然飞离酒泉，前方情况不明，秩序紊乱。丁宜中与同行人员商议暂时退入新疆，并宣布解散甘肃省府，对随行职员第三次给资遣散。与此同时，接长官公署命令：“将甘肃省府所存白银拾伍万两，扫数拨交第十财务处接收，并由财务处派员会同方押运员至哈密点交。”押运员赵佩琴(原会川县长)先行。丁宜中与陶峙岳所属一七八旅旅长莫我若商洽，将甘肃省府所有物资由他们接收后转交新疆省政府。移交的物资计有甘肃省财政厅白银15万两、民政厅烟土10箱(毛重8100两)、卫生处卫生器材药品82箱、秘书处大汽车3辆、雪佛莱黑卧车1辆等。

省政府人员到哈密后，住在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公馆。9月29日，丁宜中召集到哈密来甘肃省府人员开紧急会议，提出三条办法：一、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二、绕南疆翻大雪山，入印度，再转入内地；三、回兰州交代。丁宜中分析：第一条办不到，因陶峙岳已经答复说“不必”。我们甘肃省府，

虽然在甘肃境内宣布解散，但主要负责人依然同行，已经起义的迪化，绝对不能让我们随便进入。第二条，绕出南疆翻过大雪山，要有坚强的体力。况且变兵多逃南疆，很不方便。剩下只有回兰州向人民政府领罪一条路子。

这次会议结果，马继周、寇永吉、宋恪、骆力学、蔡呈祥、傅子赉、郭庄(省会警察局长)等都愿回兰州。王孔安、吕宗祐、刘望苏等或则畏罪，或则因为钱多，都不愿回来，而径由南疆逃走了。

9月29日，丁宜中等一行14人从哈密启程回甘肃向人民投诚。10月2日向酒泉军管会报到，并移交以下物资：1、黄金900多两，2、银币1000余元；3、大卡车17辆，吉普车数辆；4、重要档案70余箱。10月13日回到兰州，由丁宜中出面向兰州市军管会政务处已交国民党甘肃省府各厅、处、局、专员公署、县政府铜质印信26颗，并送上国民党甘肃省府丁宜中等投诚人员简历名册：

丁宜中：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

马继周：国民党中央委员、民政厅厅长

寇永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副主任委员、财政厅厅长

骆力学：建设厅厅长

宋恪：教育厅厅长

邓春膏：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

蔡呈祥：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郭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

傅子赉：第六区(武威)专员

王维墉：第七区(酒泉)专员

何世英：第九区(临洮)专员

栗智：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民政厅主任秘书

丁玺：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处长

赵世英：省政府秘书、民政厅视察室主任

至此，甘肃省府政权机构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宣告结束。

(以上资料由省文史馆馆员赵世英提供)

十六、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成立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为副主席。从

主席、副主席名单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党外人士担任省主席,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担任副主席,曾经和我们交过手的西北“五马”之一马鸿宾担任副主席。可见中国共产党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团结各族人民的广阔胸怀和远见卓识。

邓宝珊在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大会上指出:“甘肃省人民政府的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一样,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

甘肃省人民政府仍设立在明肃王府的所在地——中央广场一号。

大门依然是昔日省政府的红柱绿瓦,庄重的国徽挂在上方,两边站着威武的持枪战士。

中山堂,解放兰州时,人民解放军三军七师攻入兰州城内,在中华路和敌人展开巷战,胜利之师直入省政府,七师政委梁仁芥就在这里向彭德怀司令员报告,我军已攻占省政府,指挥所设在中山堂,彭总让他们扩大战果,全歼城内之敌。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中山堂经过修缮,更加金碧辉煌。屋顶绿瓦、脊兽、套兽,狮、虎、麒麟,窗户透雕。檐下椽檩,有装饰彩绘,四时风景、人物花卉,以红色、深黄色为基本色调,八根红柱,耀眼夺目。中山堂面对大门,道路两旁鲜花柏墙,门口喷泉假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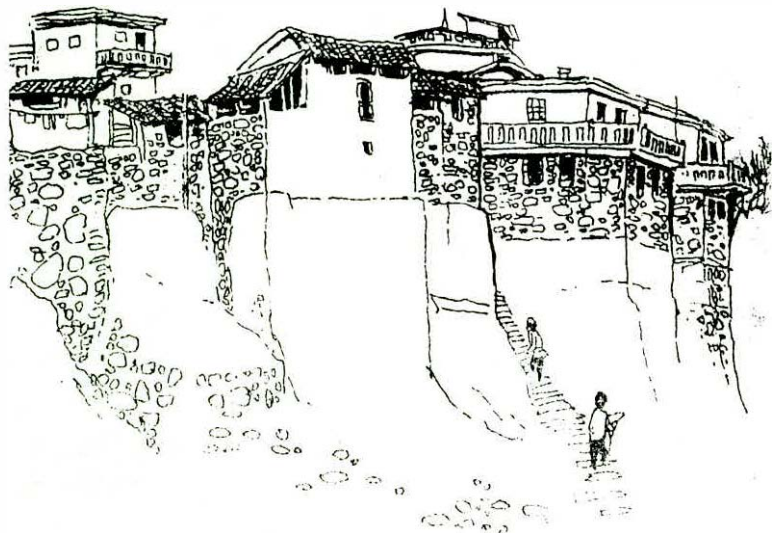
色。

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于1953年8月开工,为三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4849平方米,立面整个底层作为大楼的基座处理,并以粗糙的凿假石饰面,二、三层光平的磨砖贴面形成协调而强烈的对比,加以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具有鲜明民族建筑风格,屋顶有脊兽。工程由省建工局设计公司设计、省建工局工程公司二工区施工,1954年6月建成。2005年,省人民政府办公楼在原址上又重新修建,中部五层,两翼四层,设地下室。总建筑面积12168平方米,中央屋顶高28.2米,于2006年12月竣工。

办公楼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直对中山堂,中门有平台、石台阶、石栏杆,门口为广场,周围可停车。广场西有小花园、水榭亭台,广场东也是花草树木,并有健身场地以及休憩所。办公楼周围苍松翠柏、牡丹飘香,青竹、迎春、泡桐、丁香相间其中,春夏之交传来各种鸟鸣,清新幽静;百年古树——古槐、臭椿,数人合抱,根深叶茂,是古肃王府沧桑变迁的见证。

悠悠肃王府,至今600年矣!记录着多少风云往事、刀光剑影,这一切都是值得后人追思的。

(作者系《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主编、高级编辑)



甘肃民国大事记

(公元 1949 年 1 月 1 日—10 月 1 日)

1 月

1 日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和”声明。6 日，国民党统治区甘肃省议会发出通电，支持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14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蒋介石的和平阴谋，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6 日 国民党政府在兰州成立甘肃省戒严司令部。省主席郭寄峤兼任司令。13 日，蒋介石颁发“戒严法”。

18 日 陇东分区机关所在地华池元城子，遭马继援部队突袭，贸易公司物资被抢，干部、群众多人遇难。

21 日 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是月 中共皋榆工委委员窦志安，到华家岭地区开展策反工作，控制了通渭、会宁、定西三县联防大队，并组建“华支纵队”。后又在当地成立人民支前委员会，筹集粮物，积极支前。

2 月

1 日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整编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

4 日 国民党统治区全国邮资加价 4 倍。电报每字金元券 5 元。平信邮资 3 元。航空信加邮资 6 元。兰州至上海飞机票涨至 4.405 万元。公路运输：客票每公里 10 元。货运吨公里 68 元。

15 日 国民党兰州市政府公布 1 月份物价。以“金元券”发行日为基数，其上涨率为：物价总指数上涨 87.05 倍。其中：食物类(包括 12 种)上涨 74.42 倍；衣着类(包括 12 种)上涨 90.54 倍；燃料

类(包括 4 种)上涨 11.724 倍。

18 日 国民党兰州市航空运输费复上涨 3 倍；公路运输费上涨 50%；邮资上涨 4 倍，电报费上涨 5 倍。

24 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抛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有金元券结束发行，铸发银元；田赋归还地方。停止征借；限制金银出国。严禁外币流通等。国民党甘肃省府为控制金银外流，规定旅客携带金银出境限额为：黄金 2 两，银币 100 元，白银 50 两。

27 日 美国人陈纳德组织之民运航空队，开辟兰州——汉中——成都——重庆——昆明航线。

28 日 张治中离开兰州赴南京。率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由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职务。

3 月

9 日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维辞职，副主任委员寇永吉代理职务。4 月 9 日，国民党中央派郭寄峤为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

14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决定：撤销肃北设治局，并入安西县；撤销湟惠渠管理局，并入皋兰县。

18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开征全省土地增值税。

20 日 天水、平凉、临洮县各中、小学教师举行游行，抗议欠薪。

22 日 玉门油矿公布：石油年产量 60 万桶，汽油 800 万加仑，煤油 200 万加仑。每年需投资 90 万银元，本矿生产收入不到三分之一。

29 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籍学生为首组织、发动，并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农业技艺专科学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兰州市部分中小学生

20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甘肃省府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这次学生运动迫使省政府撤销了搜刮民财的决定，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势力。

30日 临洮县民桑文炳自称“大清复兴忠孝王护国军师兵马云帅”，在陇南、河西及藏区进行复清活动。夏河县捕获其所派第8路总司令高文治等18人，并解送兰州枪决。

4月

2日 国民党统治区航空及邮电涨价。平信邮资金元券100元，兰州至上海飞机票价196.7万元。

5日 玉门油矿工人掀起“反迫害、抗议欠发工资运动”。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派兵镇压。7日逮捕工人33人。严刑拷打，并将其家属逐出矿区，直至9月间玉门油矿解放始获救。

11日 郭化如、杨友柏率游击队一部，在漳县桦岭山与国民党漳县自卫队遭遇，郭化如在战斗中牺牲。

12日 国民党甘肃省银行发行银元本票100万元。票面分5角、1角两种，以银元兑换。

17日 兰州水烟工人不甘资本家欺压，由“一林丰”烟坊工人发起罢工，各烟坊工人纷纷响应。

20日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至此，国民党当局的“和平攻势”宣告破产。

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18兵团、19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作战。

28日 甘肃省戒严司令部公布9项规定，加紧镇压革命群众。

是月 兰州学生运动活跃。15所中学中有13所同中共地下党发生联系，4所国立大专院校均有共产党员活动。兰大附中、一中出版《春雷》《朔风》等刊物，评论时政。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皋榆工委建立了兰州市学委。

5月

8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决定：管制全省粮食及主要资源，严禁金、银、粮食出境。

24日 马步芳就职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扬言“破产保命，拚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在兰州地区加紧修筑工事，征粮拉伕，抓丁扩军，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并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以千万多兵力组成宁夏兵团。两兵团均进驻平凉，合组为联合兵团，由马继援任总指挥。

22日 中共甘工委开会研究兰州工作，要求尽快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斗争，防止敌特潜伏破坏。当月，皋榆工委对兰州市党组织进行调整，成立东西两个区工委，组织力量，收集了大量情报，为解放和接管兰州进行准备。

31日 5月份兰州市申请停业商号48家，倒闭商号72家。

是月 国民党正宁县自卫总队800余人，带枪炮512支(门)，弹药210箱，在山河镇武装起义。

△晋南400多名干部组成甘肃随军工作总队，霍维德任团长，杨一木任副团长。

6月

3日 国民党甘肃造币厂在兰州开始铸造民国3年袁世凯头像模型1元银币。所需白银，每两以定价8角向民间收购。

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交由陕西关中分区管辖的新宁、新正县，划归甘肃陇东分区。8月，恢复原宁县、正宁县名。

19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兰州等地教职员连续示威，反对国民党暴政。

21日 胡宗南、马继援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遭到惨败后，开始全线溃退。

24日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公布：金元券5亿元兑换银元一元。

26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组织“各界慰劳戡乱将士委员会”，以“募捐”慰劳品为名，搜刮民间金、银、衣物、药品、军需品、日用品、房屋、田产等。

28日 马步芳向甘肃各县摊征“劳军款”银币20万元。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郭寄嶠离开甘肃。主席职务由秘书长丁宜中代理。

△截止是月，全省中共地下党员达 1.6 万余人，比 1948 年底增加一倍。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均建立了自卫的游击队；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也得到全面发展。

7 月

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消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军队的战斗动员指示。

11 日 1943 年甘南民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仲甲，在岷县良弓被国民党政府诱捕后，押送兰州。9 月 5 日夜被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杀害于武威。

19 日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西北地区于是日起发行“银元券”。票额为 1 元、5 元、10 元三种；辅币券为 1 角、2 角两种。

23 日 合水县解放。

24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 1、第 2、第 19 兵团和第 18 兵团之 62 军共 10 个军，进入甘肃陇东境内，展开以追歼马步芳、马鸿逵军为目的的陇东战役。

25 日 灵台县解放。

26 日 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迅即解放甘肃与加强甘肃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甘肃行政公署、甘肃军区，原甘工委在省委成立后结束，所管工作均移交省委。省委由张德生任书记，孙作宾任副书记。王世泰兼任甘肃行署主任，霍维德、吴鸿宾分任第一、第二副主任。王世泰兼任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任第一副司令员。确定甘肃行政区划为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岷县、临夏、会宁（旋改定西）、武威、酒泉 9 个分区和兰州市。

27 日 宁县、正宁县解放。

△ 泾川解放，县自卫队起义。

△ 国民党政府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调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未到职）。

28 日 陇东重镇西峰镇解放。

△ 崇信县解放，县自卫队起义。

29 日 国民党中央派国防部长徐永昌、空军

副司令王叔铭来兰州进行活动。

△ 中共皋榆工委兰州市西区工委遭到严重破坏，杨国智等 30 余人被捕。

△ 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由 18 名委员组成。张德生、王世泰、孙作宾、霍维德、魏怀礼、陈成义、强自修、徐国珍 8 人为常务委员。

△ 华亭县、张家川县解放。

30 日 镇原县解放。

△ 平凉解放。次日，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潘自力任主任。

31 日 清水县解放。

△ 陇东解放区群众踊跃支前。共支援粮食 40 万石、食盐 1 万余斤、猪羊 3000 余只。曲子、合水、华池等县群众组成千人的担架队随军西进，直至武威解放后始返回。

是月 中共在兰州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和保护银行、城市公共设施的斗争。兰州面粉厂、西北毛纺厂、兰州电信局、甘肃省银行、印刷厂等职工组织起护厂委员会（队）；兰州大学、西北师院、兰州图书馆等师生员工，抵制迁移青海的命令。

8 月

1 日 清水县召开庆祝解放暨纪念“八一”建军节军民大会。1 兵团司令员王震作关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3 日 天水解放。次日，天水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王震任主任。

△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水电厂职工坚持护厂斗争。把重要的机件隐藏，拒绝胡宗南军队运走，至天水解放的当天，即装好机器发电。

4 日 秦安县、庄浪县解放。

△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马步芳军的作战命令。

5 日 甘谷县解放。

△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公布：黄金每两合银币 60 元。

△ 中共武山县工委领导之武装力量，拦截国民党政府军 120 军 173 师骑兵团、571 步兵团，缴获长短枪 1250 支、轻重机枪 73 挺、迫击炮 9

门、六〇炮20门、电台5部、战马400多匹和200多辆大卡车所载之粮食、药品和服装等物资。

6日 通渭县、静宁县解放。

7日 中共陇右工委在陇西县文峰镇小湾决定成立陇右游击司令部，毛得功任司令员，陈致中任政委。8日，将陇西、渭源、临洮等县的200多名地下党员和武工队员编为4个中队，举起陇右人民游击队的旗帜，投入迎接解放的战斗。

8日 甘肃行政公署在定西县正式成立。

9日 中共陇右工委陈致中等与陇西县苟少五等8位地方绅士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陇西的《五项协议》。10日，陇西县和平解放。

10日 武山县解放。驻武山国民党政府军119军247师骑兵团及甘肃师管区补充2团3营、武山自卫队共1700余人起义。

上旬 平凉地区人民踊跃支前。崇信、灵台两县筹集军粮4.2799万石，马草41万斤，做军鞋1.46万双。调集骡马195匹、毛驴200余头，4.4万余人运输粮草，支援解放军西进。

12日 会宁县解放。国民党甘肃省师管区补充第3团1000余名官兵在渭源县莲花镇起义。

13日 漳县解放。国民党甘肃师管区补充第1团300余人，在漳县瘿虎桥起义。

14日 定西县解放。

△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组织“战地服务团”。

△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令：成立临洮、河州、甘凉3个警备司令部。并委派洮岷、陇南各路游击司令。马步芳在全省大肆抓兵，扩充部队，作垂死挣扎。仅韩起功在临夏东乡地区，一次就抓兵5000多人，在岷县抓兵3000多人，编为骑兵军，妄图扼守洮河、黄河，负隅顽抗。

△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订“兰州决战计划”。

△ 在中共陇右工委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策动下，渭源县自卫队起义，抓获国民党县长等人。渭源县和平解放。

1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甘肃行政区划命令，划全省为1市9行政分区：兰州市，辖市区和皋兰县，直属省行政公署管理；庆阳分区，辖8县；平凉分区，辖9县；会宁分区（后省人民政府改

为定西分区），辖8县；临夏分区，辖8县；岷县分区，辖6县1设治局；武都分区，辖7县；天水分区，辖8县；武威分区，辖8县；酒泉分区，辖8县1设治局。

△ 会川县解放。

△ 宕昌沙湾白龙江渡口翻船，死44人。

16日 榆中县、临洮县解放。

17日 礼县、西和县解放。

19日 洮沙县解放。

△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在定西县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宣布省委正式成立，并讨论了兰州解放后的工作及省委机关机构设置等问题。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会师于兰州城郊，形成对兰州城的包围。

▲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是日乘飞机从广州赶回兰州，布置兰州城防。全部守军约5万余人。兰州作战指挥部设在庙滩子，由马继援任指挥官。

20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在榆中定远镇南乔家营设立兰州战役指挥所。彭德怀发布解放兰州的作战命令。

△ 甘肃军区在定西成立。

△ 康乐县解放。

21日 和政县解放。国民党政府新编骑7师2团两个连在康乐境内起义。

22日 中共中央电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集中兵力，充分备战，连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 1临夏县、宁定（今广河）县解放。马步芳、韩起功守防洮河之骑兵全线溃散。25日，临夏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鲁瑞林任主任。

△ 马步芳离兰赴西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一切事宜，均交刘任、马继援处理。

23日 永靖县解放。

24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发布进军甘肃第一阶段（7月24日至8月11日）作战公报。共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属及甘、青两省保安团、队1.19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3座。

25日 拂晓，第一野战军开始向驻守兰州的马步芳军发起全面总攻。6时许，首先占领沈家岭，10时占狗娃山。至17时又攻占营盘岭、窰家

山、古城岭、马家山。至此，兰州以南、以东各主要阵地均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马步芳部全线溃退。

△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马继援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继援连夜逃至西宁。

26日 兰州解放。凌晨2时，解放军攻占兰州西关，并控制黄河铁桥（今中山铁桥），切断了马步芳军的退路。5时许攻入城内。7时，兰州全城解放。11时，解放军渡过黄河占据白塔山阵地。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是役，第一野战军共歼马步芳军82军100师、248师、青海保安1团、甘肃保安4团全部及82军190师、129军181师、357师各一部共2.7万余人（跳入黄河淹死者2000余人），俘2.4万余人，缴获战马3400余匹，各种炮120门，机枪550挺，其他各种枪枝6000余支及大量军需物资。

△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宗逊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军管会派出军事代表多人进驻各有关单位、企业。

△ 兰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吴鸿宾任市长，孙剑峰任副市长。

△ 兰州广大工人积极复工生产。电信局职工在兰州解放当天迅速复工，畅通市内各机关的电话联络。次日，恢复市内所有电话。兰州面粉厂工人于解放之日即刷洗机器，次日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省银行印刷厂工人连夜为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印制布告、通知等20多种，5.43万份。

△ 皋兰县解放。

27日 刘任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率部逃往酒泉。

△ 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接收兰州电厂。该厂职工在兰州战役中，积极护厂，除萃英门发电所原装102千瓦发电设备被马步芳部拆迁西宁外，其余设备保护完好。至8月26日解放军攻占兰州战役中，仍坚持发电，街衢通明。

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举行雄伟入城式。兰州市7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击落国民党空军窜扰兰州飞机1架，另1架仓惶飞逃。

△ 兰州、天水、临夏、西安恢复通邮。

△ 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颁布《紧急治罪法》，在兰州、临洮等地大肆

搜捕共产党员、民主人士、革命群众，分别扣押在中统沙沟秘密监狱和军统广武门121号秘密监狱。仅沙沟秘密监狱就枪杀、活埋76人，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沙沟惨案”。

31日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通告：责成军管会文教委员会负责接管兰州市各种学校、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及文化机构。并宣布对兰州市报纸、刊物、通讯社处理办法。

是月 临夏各族人民积极投入支前工作，供应人民解放军西进部队粮食63万多斤，柴6万多斤，草50多万斤，调集大车124辆。随军西进，运送给养。

△ 临洮知识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在短期内，报名者达1200余人，经1兵团短期培训后，大部随军进疆。

9月

1日 新华社兰州分社成立，并开始发稿。

△ 中共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在兰州创刊发行。

△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成立。同时在全省建立24个金融机构。

△ 西北新华书店甘肃总分店在兰州开始营业。

3日 是日至28日，第一野战军1兵团（2军）、2兵团进行河西战役。2兵团3个军从兰州出发，6军为右路，经松山、大靖、土门西进；3军、4军为中路，沿兰新公路攻击前进。1兵团解放西宁后，以2军为左路，北越祁连山出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

△ 永登县解放。

△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兰州解放，支援大军西进》。

4日 贺龙、习仲勋到平凉视察。

5日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关于管理私营银钱业办法》22条。

△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凡过去服务于国民党政权系统之一切人员，应各按原单位到军管会各有关处、会报到登记，听候安置处理。先后登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3500余人。

6日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宴请参加抢修

黄河铁桥的孙发端、任震英、陆祖福、陈卓尔、周文斌、黄震亚、许纪生、柴应龙等 24 位工程师与技师。彭德怀到会讲话,向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欢迎。

7日 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并于当日开始播音。

△ 靖远县解放。

8日 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关于解决目前兰州市粮食问题的决议》。兰州市解放之初存粮极缺,平均每人不足 2 公斤,草料全无。省委作出 4 条决定,把粮食问题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派出得力干部筹措。在各方支持下,很快使粮食问题得到缓解。到 20 日以后,随着新麦上市,大批粮食进入兰州,粮价下跌。

9日 国民党政府军 91 军直属骑兵团官兵 800 余人、马近千匹,在古浪县大靖起义。

11日 任谦受彭德怀派遣,在康君实、李般木陪同下,在岷县与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甘肃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孙伯泉、洮(州)岷(县)路保安司令杨复兴等谈判成功。周、孙、杨和曹鼎、陈叔铎等率领所属部队共 6000 余人及各县、局长通电起义。岷县、临潭县、卓尼县和平解放。彭德怀复电嘉勉。

13日 古浪县解放。

15日 景泰县解放。

16日 武威县解放。武威保安大队 500 余人由张聘之(中共党员)率领起义。次日,武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护平任主任。

17日 兰州市 5 万余人在东教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兰州解放。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张德生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张德生在讲话中提出了兰州市人民当前的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团结起来,继续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二是建设人民的新兰州;三是支援人民解放军向玉门、宁夏、新疆进军。

△ 民乐县解放。

△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国民党特务登记办法”8 条。附“兰州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方法”。

19日 张掖县、永昌县解放。

20日 国民党政府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起义。夏河县和平解放。

21日 山丹县解放。

22日 临泽县、民勤县解放。

△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120 军军长周嘉彬等从酒泉乘飞机逃往重庆。

23日 第一野战军代表与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代表曾震五(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在酒泉举行谈判。25日,陶峙岳等 11 人通电率部 5.8 万余人起义。彭德怀复电嘉勉。

24日 高台县解放。

△ 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及 91 军、120 军残部在张掖、酒泉地区起义。

25日 酒泉县解放。28日,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朱辉照任主任。

△ 玉门油矿解放。玉门油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解放前夕,油矿工人积极护矿,使解放军完整地接收了老君庙生产点,保证了正常生产和支援部队用油。

26日 金塔县、鼎新县和平解放。金塔县自卫队 85 人起义。

27日 玉门县解放。

28日 肃北、安西、敦煌县解放。安西自卫队起义。至此,河西战役胜利结束,共计歼灭国民党政府军和地方部队 3.6 万余人。

下旬 酒泉地区群众为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筹集军粮、准备草料、做军鞋。至 10 月初,共磨面粉 900 万斤,筹集草料 200 万斤、军粮 3 万石,做军鞋 1 万多双。

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大会选举毛泽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张仲良在庆阳的足迹

李培蕾

张仲良(1907-1983),陕西耀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

1932年春,因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经党组织营救,4个月后出狱。随后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和中共西安市委职工部工作。

1933年夏奉命回耀县,趁王泰吉部队起义,和张邦英等发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财物,组织游击队。不久,率部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刘志丹、习仲勋和吴岱峰领导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翌年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后所部和其它部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任政治委员。1935年夏参加了中部、宜君、郿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中宜郿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因省委在“肃反”中犯扩大化错误,一度被捕。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随后被派到关中地区工作,任独立三团政委,参加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围剿”的战斗。

1937年初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陕甘省撤销后,任关中分区军事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夏关中分区改为警备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年底,改任关中分区专员。1944年5月调任教导一旅政治委员。1946年3月,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党中央派往陇东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局势。同年11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成立,任纵队政治委员。后第四纵队改为第四军,继续任政治委员,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接着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1960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79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83年2月逝世。

1932年,张仲良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其革命活动主要在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庆阳进行,在庆阳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张仲良征战庆阳的革命故事。

王郎坡战斗

1934年初,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张仲良任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第三路游击队建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消灭陕甘边区甘肃正宁县湫头王郎坡的反动民团。王郎坡民团有三四十人,头子叫高楞娃(关中把厉害不怕死的人称楞娃),在当地十分猖獗,对游击队威胁很大。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让张仲良带领游击队铲除这一祸患。他带领10多个游击队员伪装成土匪,故意抢了一家富农的财物,然后又故意将那个富农放走,让他给高楞娃报告。高楞娃不明就里,一听有人敢对他保护的富农抢劫,就贸然带领团丁出来报复。游击队早已布好口袋阵,只等他来送死。不一会,

那个富农带领着高楞娃和团丁，气势汹汹的杀奔过来。张仲良瞅准时机，等他们全部钻进了口袋后，大喊一声：“打，给我狠狠的打！”游击队员一齐开火，不一会儿，30几个团丁就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不足20分钟，作恶多端、横行一时的高楞娃民团就此完蛋。这一仗，游击队旗开得胜，缴获几十支枪，自己却毫发无损。既为当地除了一害，更为游击队今后的活动扫清了障碍。此后，经过几个月的连续战斗，三路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人枪增加了一倍。之后，又新建了正宁、邠县、宁县、湫头、耀县、中宜等6个游击队，使照金苏区迅速恢复和发展。

正宁建党

1934年2月，张仲良带领第三路游击队来到湫头孟家河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加快了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湫头地区又发展了15名党员。10月主持在南邑西头村秦善合家召开党员会议，正式成立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郭存信任支部书记，秦善合为组织委员，郭廷藩为统战委员，支部共有党员19名。至1935年7月，发展党员70多名，建立了3个区委，一区湫头，二区三嘉，三区长舌头（现属陕西旬邑县）。8月，在湫头峁子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中共新正县委员会。由于张仲良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宁湫头塬的工作局面很快打开，正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湫头塬顺利建立。是年9月，陕甘边特委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活动区域划为陕甘边南区，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成立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1935年7月，迁驻正宁三嘉后坡村），张仲良兼任区委委员。接着在正宁、淳化等县相继成立了党、政机关，还在农村发展了农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

反摩擦斗争

自1939年始，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5县，地处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关中分区，东、西、南三

面处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之中，是抵御胡宗南部队进攻，反摩擦、反封锁的最前线，守住关中对于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关中分区司令员的张仲良，倍感责任重大。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有理有节、不打第一枪，积极、稳妥、有效地开展了反摩擦斗争。5月19日，国民党预备三师两个营的兵力会同宁县保安团队及壮丁队约千余人，侵占了新正县的西坡村。6月14日至17日，关中分区在司令员张仲良的率领下组织部队予以回击，此间，共发生大小战斗90余次。在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他遵照中央精神，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与国民党顽固派巧妙周旋和斗争，巩固和发展了关中分区，取得一个又一个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守住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力地保证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坚守陇东

1947年初，蒋介石调遣胡宗南等部23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2月，胡宗南部队向陇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此，3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住处召开会议，决定派张仲良到陇东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7年3月18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西北局关于加强陇东地区地委领导的决定》，由张仲良任陇东地委书记、专员兼陇东军分区司令、政委，原书记李合邦改任第一副书记。会后，张仲良立即离开延安奔赴陇东，开始新的工作。他到任后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就是千方百计尽快恢复工作。张仲良采取先组建游击队，通过武装斗争扩大影响，再通过开一些小型会议联络人员，恢复组织。对一些实在不合格的干部，坚决予以撤换。在张仲良的主持下，1947年4月1日，陇东地委作出《地委关于战争工作检讨和任务的决议》，为坚定群众战胜敌人的信心，张仲良通过地委适时提出“熬过三个月的困难”、“打垮胡宗南”等口号。为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他主持精简了分区机关，使地区党政军机关编制紧凑，人员精干，没有拖累，行动自如地与敌人巧妙周旋。

在各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环县、曲子、华池、庆阳(今庆城)、合水、镇原等6县游击队(约5500人)和民兵、自卫军(5521人)、军分区步兵团、回民骑兵团、警卫团等武装力量紧密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为稳定陇东局势,张仲良先请野战军来陇东活动,打击敌人,鼓舞士气以促进工作。1947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实施陇东战役。张仲良带领一个精干的地方工作班子跟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以便随时接受彭总对地方情况的询问。同时,也便于及时解决军需和组织担架队支前等具体问题。这样张仲良就和野司领导战斗、生活在一起,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在张仲良的精心组织下,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只要是部队所需,随时提供,宁可自己瓜菜代粮也要保障部队供给。由于陇东地委的密切配合,野战部队在陇东先后取得了西华池、悦乐、将台战斗的胜利,收复了曲子、环县;为部队输送兵员5000多人,发展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8100多人,就地作战近百次,组织担架队21000人,担架1515副,驮畜24000匹,驮运工24000人,运输军粮4万石,饲料1万石,开创了陇东地区解放战争的新局面。不久,野战部队撤往三边,准备实施三边战役,张仲良又为部队补充了三四天的口粮,保证了军需。

再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陇东地委在《关于战争工作的检讨和任务的决议》中强调,组织群众生产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战争中决不可忽视的两项工作。在自卫战争期间,发动群众开展清算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战争。与此同时,张仲良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建设。在中共陇东地委的领导下,普遍开展赏功罚过运动。提出“三个月见人心,好的忘不了,坏的漏不了”的口号,并调整领导不力的基层班子。1947年12月,陇东地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在研究部署全区土改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以“三查”(查思想、查阶级、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随后,中共陇东地委从分区各县抽调300多名干部,在进行土改的25个乡镇同时进行整党试点。接着又根据上级指示在其他

县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另外,张仲良还十分重视战争环境中统一战线工作。他主张,在战争环境下对富农要采取争取的态度。这些工作,都对稳定陇东局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7年7月,在全国解放战争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张仲良又适时组织召开较大范围的干部会议,宣传、动员干部认清形势,积极工作,为战略反攻、解放大西北作贡献。此时,国民党抽调甘、青杂牌军队,配合其新一旅对陇东分区发动新的攻势,陇东地委领导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重创敌军。这一切,都为此后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上的最后胜利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7年9月21日,西北野战军建立第四纵队,张仲良调任政委。他于同年10月离开陇东,但仍兼任陇东地委书记到年底,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到1948年2月。

参加陇东战役

1948年5月1日,彭德怀总司令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向董志塬开进。5日,先头部队六纵教导旅在屯子镇被敌八十二师骑兵第三团包围,第一、第四纵队前往解围。张仲良、王世泰率领第四纵队下午4时左右到达屯子镇附近,立即由东向西发起攻击,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午夜时分教导旅长在外围部队的掩护下突围成功。

屯子激战后,张仲良、王世泰接到命令,率四纵向东撤退,路线是经三不同向宁县方向撤退。撤退中,张仲良和高锦纯、高维嵩、左爱带警一旅1个营掩护纵队、两个旅部机关和伤员先行撤退。6日中午,四纵到达三不同附近,按前总的命令攻打宁县县城,警三旅第五团担任主攻,第七团扫清宁县外围敌人。翌日清晨,前总和其他纵队经过宁县向东撤退,警三旅第五团、第七团方交替掩护撤退下来。在主力撤退的时候,马步芳骑兵第八师的几个团跟上来。当第四纵队到达宁县东塬时,与马步芳骑兵遭遇。四纵一边抗击一边撤退,到达平子镇一带,由于第五团、第七团相隔一段距离,结果被

马步芳骑兵从侧面插入,隔断了五团与七团,并将七团包围。七团集中兵力,依托良平村有利地形,坚守在村寨,顽强抗击,给马匪以重大杀伤,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直到深夜才撤出战斗。此次战斗七团受到前总通令嘉奖。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与一、二、六纵队依次从正宁和职田镇之间向边区开进。

张仲良在陇东工作,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务相当艰巨。但他不畏艰难困苦,带领大家迎难而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经常是风餐露宿,饥不择食,因而落下了胃病。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陇东局势很快得以稳定、恢复,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势头,为扭转西北战局、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资料来源:

1. 百度百科网

2. 《正宁党史人物小传》,中共正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编,2001年内部版,第26页

3. 《张仲良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9月,第24页

4. 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50页

5. 《张仲良纪念文集》第26页

6. 《张仲良纪念文集》第37页

7. 《张仲良纪念文集》第38页

8. 《正宁党史人物小传》第28页

9. 《张仲良纪念文集》第39页

10. 《张仲良纪念文集》第44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镇原

何等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高校停止招生,大量初、高中毕业生面临不能升学的窘境,同时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城镇就业途径狭窄,庞大的就业群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毛泽东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包括比解决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是推动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永远不要脱离实践,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措施。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

镇原县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以后,立即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落实的群众运动,并要求县直各单位、工厂、学校要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动员所有符合条件的子女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断开展,根据中央及省、地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精神,1969年1月4日,镇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镇原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职工家属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董巨民、索国栋、张锡、曹步宣、苟汉权五人组成,董巨民任组长,索国栋任副

组长,下设办公室,抽调专人办理日常工作,加强对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项工作的领导。同时,县革命委员会还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也要成立相应的办公室,有专人负责,统一规划,定出方案,调查研究,分期分批搞好安置工作。到4月初,全县已有知识青年1243名,城镇居民、家属572名,到农村插队或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镇原县是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接受庆阳专区安排的知识青年下乡。8月28日,上海中专、半耕半读学校1968届毕业生211名首次来本县,分别被安排到上肖、屯字、平泉、新城、曙光5公社插队劳动。劳动锻炼二、三年后,国家分批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有上海、兰州等地知识青年800多人来镇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除随父母或亲属回原籍外,大部分为集体安置。各社、村在安置知识青年时,多选择政治、经济、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的大队、生产队。由国家投资、集体投工修建房屋,作为知识青年集体食宿、活动的场所,当时叫“知识青年安置点”(简称“知青点”)。知青点配有必需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订有书报、杂志。每个知青点民主推选一名负责人,协助生产队以及公社“知青专干”负责知识青年的管理工作。知识青年从下乡插

队之日起,一律转为农村户口,和所在生产队队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评分记工,按工分红。这些知识青年,每人每月16元生活费,口粮标准是每人每月42斤,由国库供应,吃住在贫下中农家,布证、棉票凭粮户关系按规定发给和供应,其它生活用品均自理。

1970年10月5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注意解决一些地区对“再教育”和安置工作抓得不紧,经费使用管理混乱,对下乡青年生产、生活中实际困难不能够妥善解决,致使一部分青年不够安心等方面的问题。通知还决定在没有省农宣队的44个县、市设立1700个知识青年安置点,进一步推动知识青年的下乡工作。镇原县革命委员会遵照省革命委员会和庆阳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确定了“知青点”的设置地点。据统计,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全县从1971年开始,国家先后拨款为插队的知识青年购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在三岔、孟坝、太平、临泾、开边、新城、平泉、中原等公社共设置知青点95处,安置来自上海、兰州等地和本县的知识青年800多人次。

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了一定的调整,对下乡插队知青的生活待遇从政策上进一步优惠照顾。同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严格检查,揭露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1973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1973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使用管理的暂行规定》等5个文件,对全省当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系统的调整安排。

镇原县委积极贯彻“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于9月份成立了由王生金任组

长、袁立志、鄢荣章任副组长的镇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决定县内下乡插队知青(包括回原籍落户和到集体所有制场、队的),每人每年补助480元,到地方国营农、林场落户的,每人补助400元(包括建房费、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购置费及书刊费、医疗补助、旅差费等)。口粮第一年由国家供给,第二年起执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原则,在所在生产队参加分配。因病影响出勤或因灾欠收月口粮不够22.5公斤的,由国家统销补足。同时分给与所在队社员同等数量、质量的自留地,种菜养猪,用以补充调剂生活。外省插队知青,每年按规定享受两次探亲假,并报销往返车船费。下乡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病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在招工、招生中优先照顾。知识青年所在的公社、大队广大的社员群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们在各级领导及社员群众的关心帮助下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对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劳动有了体验,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在下乡期间,他们有的被选为生产队长,有的成为共青团、民兵连或妇女组织的干部,为农村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农村留下了他们创业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人生中无法泯灭的记忆。

在下乡的过程中,广大知识青年经受了一定的锻炼,他们学着挑水、施肥、灭虫、收割、起圈,也经历了种种考验。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有的帮农村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对山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他们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这期间,他们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的参军入伍,这些成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应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政策、方针都存在严重的错误。在下乡的政策上搞“一刀切”,不区别各个地区、各个对象的具体情况,中学毕业生一律下乡。在动员方式上偏重行政手段。在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使用和管理上,过分强调接受“再教育”,使下乡知识青年在政治上受到了压抑,使他们既学不到科学知识,也难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错误的做法,造成了许

多不幸的后果,对国家、对接收单位、对知识青年个人,总体上说是得不偿失的。从财政方面看,县财政为每批知青上山下乡都要拨出专款作为生活补贴和安家费,给县里的财政增加了压力。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取得了劳动报酬,但远不能满足他们生活需要,大部分知青仍需要家庭在经济上进行援助,给家庭增加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由于上山下乡耽误了他们继续深造的机会。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最好年华,却拿起农具从事农田劳动,实际上贻误了大批人才的培养。在对知识青年的使用和安排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过分强调“再教育”,加重了国家、知青本人和家庭的负担,遗留了不少社会问题。实践证明,这种以下乡插队为主要形式,采取政治运动方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对

农民、对知识青年都是不利的。

1975年,学习湖南株洲“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甘肃省机械局与镇原直接对口、挂钩、定点,对本系统、本单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集体安置。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除在这之前一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外,每年都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考入大中专院校。1979年以后,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上山下乡工作逐渐停止,已经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工作由劳动部门招干、招工、参军等渠道陆续离乡返城,有的则自愿组织起来自谋职业。到1985年,全县安排在财贸、文教、卫生、工交等系统的知识青年有621名,从而使这一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作者单位:镇原县政协文宣委)



朱太岩小传

朱令昕

现在，兰州市的图书馆界、档案界的年轻人中，知道朱太岩先生的人不多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亲聆过先生授课的人更少了。作为同时代的人，先生的音容笑貌仍令我不能去怀。我想，让界内的年轻人多了解一些前辈的人品、工作和贡献，对传承祖国文化遗产、建设新的文化队伍也许不无好处，因此不揣浅薄，为先生作此小传，并就教于方家。

先生祖籍甘肃平凉，1917年10月22日生于兰州市贤后街38号的朱家大院。原名令炎（按族谱令字辈火旁名），以字行。1935年9月，从兰州师范学校高师毕业后，在该校程翰青老师的鼓励下，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上学，时年十八岁，是当时北师大的甘肃同乡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像漆荫棠教授、窦振民教授都比他年长。他是受当时乡贤水桢先生的影响，准备学成后实现实业救国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诺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他只好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兰州。由于家境无法供给继续上学，便在兰州兰园小学、兰州师范、西宁师范任教，还担任过景泰县教育科科长、兰州市教育科科长。但他教的并不是尚未完成学业的化学，而是凭藉医儒世家传授下来的坚实功底的语言文。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先生在兰州兰山中学任教，并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地址就在原来的白衣寺（现在的兰州市博物馆前院），在这座明代肃王修的玲珑宝塔上朝街的一面，挂上了《兰山中学》四颗隶书大字，路人都能看到，这正也是先生的手笔。1951年中学调整，调入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图书馆工作多少后台勤务，完全体现在出纳台上。看似一取一收的枯燥工作，却显示了一所图书馆的水平。先生从出纳工作中，读者借阅和咨询的频率，了解到师生的需求。在采编工作中，贯穿了既节省资金又切合读者的进一步需要。他认为，图书馆是搜集、管理、提供人类文化结晶的场所，尽管图书馆学有着方方面面的内容，而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使馆藏的人类文化结晶最大限度的为读者所利用，以充分发挥其效益，而为社会的不断进步做出贡献。因此，图书馆事业首先是一种服务性的事业，图书馆员也就首先是一名服务员，是一名把用文字记录的人类文化结晶传递给读者、传递给社会的服务员。为此，图书馆员既需有广博的文化基础，还要有专精的文化知识，才好肩负起这个担子。《荀子·劝学》有“积土为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话，图书馆员应该从“积”作起，由积微到广博，把自己首先塑造成一名“杂家”，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有了坚强的业务水平，然后“由博返约”，选择一定方向，向专精纵深发展，才能较好地完成将馆藏人类文化知识结晶介绍给读者、社会之间的中介任务，才可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作出一定贡献。高校图书馆工作者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教师和学生，因此，高校图书馆工作者首先应在为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用工夫，必须掌握目录学、了解版本学、熟悉图书资料分类法，并且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一些工具书；还需学习主题标引、计算机检索等知识，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使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以便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作出应有的

贡献。顺便说一下,他很爱读书,也爱买书,在为图书馆采购时遇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便另外开一张发票并粘贴在每一本书的封底里,绝不和公家的书相混。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先生又受命走向课堂。先后担任师大历史系本科生、中文系研究生及助教进修班、古籍整理讲习班、夜大学图书情报专修科兼课教师、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副教授、金城联合大学图书情报专修科主任、教授及甘肃省历届图书情报短训班、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兰州函授站兼课教师。在此期间,他编写了《常用中文工具书简论》作为试用教材,从1981年起修订了3次,使用了13次。他在教学上言传身教,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教书育人的精神,深受学生好评。

他的高尚品德和献身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得到组织上的肯定。1981年以来,担任的职务有:西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统战工作咨询指导委员会、校史编写组成员、图书资料及实验系列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图书馆学会一、二届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档案学会一届理事,甘肃省高校实验技术四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图书资料学科评审组成员,《兰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等。他还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1987年12月3日,先生被西北师范学院评为副研究馆员。1987年12月31日被评为研究馆员。他的生平简介已收入《甘肃教育人名录》。《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图书馆学》有传。

由于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业务精益求精,成果累累,1978年先生当选西北师大图书馆先进工作者。1987年获学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及奖章。1982年10月获甘肃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三十年以上馆龄纪念证”。1981年5月1日获甘肃师范大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三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从事革命工作克尽职责”证书及纪念章。1984年10月1日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

“三十年以上教龄”荣誉证书及纪念章。1984年10月获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图书资料情报工作”证书,198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坚持边远地区工作满三十年以上,为母校争得了荣誉”证书及纪念章。1990年8月30日以《导读书目及其编制》获得“西北五省(区)图书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颁发的第四次科学讨论会论文奖。

先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潜心钻研业务,辛勤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撰写了《知见明版古籍写刻工姓名录》,并与人合作校辑黎锦熙先生的《方志今议》,收入《方志学两种》一书。1981年以来,还发表论文10余篇。主要有《阅读古籍应注意的一个问题——谈谈版本学知识》《王符〈北堂书钞〉小考》(《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获校科研成果二等奖)《社会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儒学典籍辞目》40条(《中国儒学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漫谈写刻工》(发表于《古籍整理学刊》1988-1990年各期)、《建国四十年来版本学成果述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获198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图书馆学、情报学、资料工作》1990年第1期转载)。

1989年,先生在退休之后,依然发挥余热,笔耕不息。又担任了由吴坚同志任主编的《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副主编,兼《西北稀见方志文献》主编。该《丛书》收书560种,共分八个专辑,16开本202册,约一亿字。首批发行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提倡西医学习中医期间,曾以前清名医程国龄所撰《医学心悟》为必读书籍之一。先生业余整理了祖上关于阅读程著《医学心悟》(雍正徽郡慎德堂版)时眉端所记心得,五年而成稿。改革开放以后,重加整理,修订了例言。1991年春,写了自序,详述了曾祖序东公及祖父仪亭公在兰行医受到的尊重、以及先祖对病者如己之病的态度。故居上房檐下有前清甘肃臬司邓承伟为曾祖序东公书赠的匾额,文为“年高德劭”,板联曰“笑我雪盈颠,甚望儿曹娱白发;是谁春在

手，竟于人海遇丹溪。”下房檐下是凉州教谕孙寿山鸣谢先祖仪亭公的匾额，文曰“丹溪品望”，抱柱的板联是由乡贤刘尔圻撰书，文曰“承家有柏庐格言，垂老不忘修己法；救世守椿庭遗教，毕生能读活人书。”原稿题名《医学心悟杂症要义》，经甘肃省中医学院图书馆郑元成馆长推荐，由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傅景华审稿，于1993年2月出版发行。先生虽未亲自见到成书，但夙愿已偿，可以含笑九泉矣。先生于整理《要义》时，原积有《引方》卡片一大箱，后因国家将要出版中医方剂词典，遂付之高阁。但将有关养生的偏方传播于亲友间，如双手梳头、摩耳轮、敲天鼓、叩齿、摩脐轮、提肛等，或将对症的《引方》卡片送给亲友，大家反映受益匪浅。先生志趣广泛。青年时能唱秦腔，任兰州师范教师时，曾在师生联谊会上扮演过《三堂会审》中的刘秉义和《拜土台》中的诸葛亮，一时传为校内佳话。尤善书法，擅八分，中年以后，功力遒劲，师大同仁尚有留存墨迹者，1988年10月他的一幅作品经甘肃省文史研究会评选作为该馆藏藏品，在馆初展，并颁发《藏品证书》。1990年10月，另一幅作品被选入甘肃省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首届书画展展出，由协会发给荣誉证书。可惜忙于本身业务，存世遗墨并不多。先生还在默默学习雷锋，1966年邢台地震后，他向灾区捐款，收到中共邢台地委、河北省邢台专员公署的感谢信称：“我区遭受地震灾害之后，你为了支援灾区的阶级兄弟姐妹，伸出友谊之手，寄来了汇票一件，我们收到后万分感谢，您这种高尚的风格值得很好学习，这

里特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这封信他生前从未示人，去世后才被发现。

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91年夏季住院治疗。时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吴坚同志、西北师大党政领导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都前往医院看望。先生在病危之中，仍然关心图书馆工作和《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向前来慰问的同志热情询问和叮嘱。终于在当年12月5日12时40分不治逝世，享年75岁，与夫人田兰瑞女士合葬于兰州七里河韩家河公墓。过世后，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会。对先生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发展我省图书情报事业，培养人才作出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有挽联云：“通津梁，卅年导引学子游四海；精典籍，一生积累知谙富五车”，可以看做对先生一生的概括。先生虽没有等到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实施和多介质文档时代的到来，但在祖国浩瀚的藏书海洋里，却遨游得非常自得，他对图书、版本、档案工作的贡献，受到公众的赞赏，也是值得欣慰的。

(作者系兰州大学外语学院退休职工)

参考文献：

1. 治丧委员会在朱太岩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话
2.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图书馆学》第72页





丁益三传

沈明江

丁益三,原名丁尚谦,号龛谷,字逸山、炳青,1896年腊月初八出生于榆中县三角城乡丁官营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开明的乡村教师。丁益三自幼在父亲的熏陶和教育下读书、练习书法、学习音乐,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革命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求学读书

丁益三,7岁进入三角城乡丁官营村的私塾读书,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和练习书法。父亲利用闲暇时间继续教儿子学习声乐等功课,并指导其练习书法。丁益三勤奋好学,在这一期间他的文字功底、书法和声乐基础知识都有很大的提高

1911年,丁益三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进入了中学,丁益三能写会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施展,他积极地参加学生社团,与同学们一起办板报、演话剧、开展习作和书法交流活动。由于丁益三扎实的书法功底和深厚的文字基础,他的书法作品和文章在兰州一中颇有名气,在话剧表演中,他的唱腔字正腔圆,动作到位,深受广大师生的赞誉,同时他性格活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在同学们中有很好的的人脉,交往的同学既有高年級的,也有低年級的,榆中的同乡张一悟、张亚衡、水楠就是他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此期间,丁益三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积极关心甘肃的时

局,与同学们寻求和探讨改变甘肃贫穷落后面貌的途径和办法。

1916年丁益三高中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到了北京,他深受北大文化倡新、博学于文、科学民主、兼容并包的学风影响,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在京求学期间,他与同学们经常讨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以家乡兰州古城楼上的匾额“万里金汤”为题填词一首,抒发报国之志。“莽莽昆仑,万里金汤不现。泱泱中华蛰戟,还我河山。国殇民殇,谁能复之兴起。一片汪洋哀叹,狂我少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最深,唤起了丁益三的民族意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的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向导》和《觉悟》。

1919年5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丁益三与所有中国学子一样义愤填膺,冲破军警的阻拦,走上街头,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并与在京的榆中籍青年张一悟、张亚衡代表甘肃籍学生到段祺瑞官邸递交请愿书,事后他们被在京的甘肃籍学生誉为“榆中三杰”。五四学潮后为躲避北洋政府迫害,他们三人挥泪分手,经他们的人生导师、良师益友、尊敬的师长李大钊推荐,已在北大毕业的丁益三去日本深造,刚刚上完预科的张一悟、张亚衡去武昌国立高师去上大学。

丁益三到日本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中国留日学生介绍国内五四运动的盛况,留日

学生介绍了5月7日他们在东京举行的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情况。同年秋,丁益三经过紧张的准备,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食品制造专业。丁益三发奋苦读,立志要以实业救国,他在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的同时,经常利用节假日与留日学生一起深入到日本的工厂、农村参观学习,与他们一起彻夜长谈中国的时局,为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祖国寻找出路。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彭湃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20年丁益三加入了澎湃发起成立的赤心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1年5月1日,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在东京参加了日本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1921年放暑假期间,丁益三回国到浙江、上海、广东一带考察实业发展情况,在西湖边留有照片一幅,并配上了本人的题词,“民國十年調查實業,行抵杭州,正值六月,蓮花盛開,泛舟於西湖之中,高歌之後,遂攝影三角亭中,以志不忘。龕谷農記。”通过对南方实业发展情况的考察,丁益三对办实业充满了信心。

实业救国

1922年,丁益三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办实业心切的丁益三匆匆告别了在日本的同窗和好友,乘船回国。在回国途中,他就构想着自己的发展蓝图,在家乡办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工厂,发展实业,用实业救国,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回国后,他放弃了教育发达的北京,经济相对繁荣,生活富裕的东南沿海,回到了交通不便利,人民生活落后,信息闭塞,经济不发达的西北边陲——兰州。因为,这里有生他、养他的父母,还有阔别多年的妻儿。到了家乡已经是年关了,一家人格外的高兴,父亲见到了自己学有所成的儿子,妻子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丈夫,一家人张罗着过一个团圆年。可是,办实业心切的丁益三顾不上这些,乘着过年走亲访友,筹措办厂子的银子,考察工厂所需的原料等事项,谋划着开办工厂。1923年,丁益三在东岗镇选定了厂址,创办了西北第一家罐头加工厂。从厂房到机器的购买、运输、安装、调试、工人的培训,每一个环节,他都要手把手的教和示范,这里

的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洋玩意,什么都是新鲜和陌生的。到了当年的六七月,兰州周边的桃子、杏子等水果成熟的时候,厂子建起来了,开始试加工,刚生产初期,问题层出不穷,丁益三带领工友们边生产边改进。到了当年的八九月兰州周边的水果大面积成熟的时候,他们的罐头厂已经能够生产出合格的罐头食品。

罐头在当时是新鲜玩意儿,在西北的人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它的问世,在陇原大地传为佳话,争着购买,厂子的销量和收入颇为可观。但是,受当地所产水果质量和产量的影响,厂子的生产规模无法继续扩大。这时的丁益三积极投身于果树的改良和选育,他教兰州周边的农民嫁接果树,培育和改良果树苗木,扩大优质果品生产规模。此时,丁益三在省城兰州的名声大振,省政府邀请他担任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一职。他在担任公职后,积极推进甘肃的耕作技术和食品加工技术,在继承中国传统食品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食品制造工艺的优点,撰写了《农艺》一书,详细介绍了麵种、干鲜果品等71种常用食品的选料、制作工艺。在此期间,丁益三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印章等物品,同时自己书写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还根据自己广博的知识和见闻写成了随笔《文艺》一书,介绍了他对许多新事物的认识和对未来的设想,有许多的见解和观点具有前瞻性,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应用。

丁益三在罐头生产方面,不仅仅满足现有的局面,继续进行探索和完善,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和品种,生产品种由水果扩大到蔬菜、肉类,生产时间由水果收货后集中生产扩大到常年生产。产品的销量和销路大增,把甘肃的一些特产销往东南沿海,这样一来,在工业发达的东南沿海也能见到西北的工业产品了。丁益三的知名度和影响在甘肃进一步提高,成了当时省城兰州家喻户晓的实业家,他本人被誉为丁罐头。

投身革命

他本打算利用担任省府公职和办罐头厂的机

会大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工作中逐渐发现，在当时政局混乱，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很难行得通的。中国当时的形势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用一种思想唤起全民族的意识，特别是像甘肃这样落后的地方更需要民众的觉醒，才能建立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他的实业才有更大的用处。这一时期的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6年丁益三先加入国民党，尔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丁益三参加了甘肃特支领导下的皖江会馆斗争，与宣侠父、钱靖泉等人一起揭露国民党右派田昆山的种种罪行，得到了与会的两百多人一致拥护，同意对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取得了皖江会馆斗争的胜利。他被选为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9个执行委员之一。这是甘肃特支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甘肃特支的全体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工作打开了局面。他充分发挥其能写会唱的特长，积极宣传以“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后又成为王孝锡、胡廷珍建立的“青年社”第一批社员。丁益三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以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为集合地点，以兰州一中校刊为阵地，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还热情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帮助藏族同胞学习汉文、汉语，对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身陷囹圄

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军警早想对丁益三动手，但考虑到丁益三是当时兰州有名的实业家和社会名流，在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丁益三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若盲目动手，把丁益三抓了，会引起省城兰州绅士们地强烈反对，会对国民党在兰州的工作造成不利局面，便对逮捕丁益

三的事情压下来了。国民党军警特务们密切监视丁益三的一举一动，搜集丁益三从事共产党活动的证据。

1928年2月的一天，国民党甘肃省军法处在检查信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封署名“杨秀英、杨瑞云妹收”的信件，检察人员便持怀疑的态度拆开了这封信，发现寄信人是共产党员杨和鑫。杨和鑫是国民党甘肃省军警通缉的一名共产党要犯，于是军法处逮捕了杨秀云和杨瑞云姐妹二人。那年二月，杨秀英20岁，杨瑞云17岁。面对军警们的种种询问，姐妹俩始终摇头，拒绝回答。军警们便将姐妹俩分别绑在柱子上，用皮鞭在脸上、身上狠劲抽打，打得她们俩脸上鲜血直流，姐妹两人仍然是昂首挺胸，一字不吐。后来，气急败坏地军警们恐吓道：“扒光她们两人的衣服，烧焦皮肤，看她俩说不说？”年幼的杨瑞云情急下脱口而出：“去我家的就有丁罐头，……”。丁罐头就是丁益三在当时省城兰州的人皆知。军警们如获珍宝，迅速行动，缉拿丁益三。

丁益三被捕以后，国民党军警对他进行秘密关押，先后一年多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消息。在监狱中丁益三遭受了敌人“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化”等酷刑，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是他始终没有出卖党组织和任何同志。1930年家人获悉丁益三在狱中的悲惨情况以后，开始多方托人进行营救，找甘肃当时的社会名流裴建准、水梓、杨思等人保释过，也通过省政府的要员向当时甘肃的最高统治者求过情。1931年2月，当时的甘肃统治者考虑到丁益三是一个难得的实业家，为甘肃做了许多的实事，只是涉嫌共产党，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就是共产党，还有裴建准、水梓、杨思等绅士的多次保举，同意他保外就医。在狱中，尽管他的处境非常艰难，但是他长期养成的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的习惯没有改变，仍然坚持读书、写字，他用毛笔抄写了大量的诗词、药方、对联、歌诀。

教育子女

1912年，丁益三与小康营乡王保营村的张氏

女子结婚。他们育有3女1子。由于早年丁益三一直忙于求学和办实业，对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疏于管理，给予子女教育和影响最深的时间就是他刚出狱在家疗伤的时期。

丁益三出狱以后，忍受着国民党军警毒打的伤痕，在家里边读书，边教儿子写字。每次习字课开始以后，他先讲写字的要领和注意事项，然后示范，接着让儿子写，儿子写完字，他亲自批改，提一些要求，按照他的批语让儿子重新写，直到写好为止。丁益三儿子的书法就是在父亲这样严格的教育下炼成的。

丁益三心情好的时候经常唱歌，有时也教孩子们唱歌，教给他们很多的歌曲。在空闲时，也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讲他的经历。他讲的故事可多了，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身边的，有国外的，有神灵鬼怪的，有异国风情的故事；也有他非凡的经历，从兰州上中学，到北京大学读书、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开办西北首家罐头加工厂、帮助藏民学习文化、监狱里受敌人残酷折磨等等的事情。孩子们每次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入了迷。这时的孩子们最开心，无拘无束，问他一些问题，活泼可爱的小女撒个娇，嚷着让父亲抱上，坐在父亲的怀里听故事。

这种宁静的生活在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骚扰下中断了，丁益三在伤势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出走。一天早上，长女和儿子上学去了，丁益三把次女和小女叫到身边，把小女抱了抱，然后饱含深情地叮嘱次女：“秀芳，爸爸要出远门，走得急，就不告诉你姐姐和哥哥了，他们两人平时上学去，家里就你们娘三人，你母亲有病，身体很虚弱，需要休息，妹妹还小不懂事，你要多操些心，照顾好母亲和妹妹，有机会时多学习。”女儿轻轻地点了点头，丁益三转身离去。姐妹俩久久的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流出了伤心的泪水，心里想着何时才能见到他们心爱的父亲？

多少年过去了，孩子们每每想起了父亲，他们就唱着父亲教给的歌曲“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薄云快飞开，让那红球显出来，变成一个光明地、美丽地世界……”，沉浸在对父亲的深

切地思念和美好的记忆之中。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32年丁益三辗转江苏、上海、江西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因病返回兰州，1937年9月10日因狱中留下的伤痕复发病逝，终年41岁。在他去世以前把自己在监狱受刑的一件血衣亲手交给了女儿，要求她们妥善保管，等革命胜利的时候交给党组织。按照丁益三的嘱托，他的女儿丁兰香于1952年把血衣交甘肃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保存。1957年，血衣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被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为了缅怀他为党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共榆中县委、榆中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4月2日在兴隆山烈士陵园为他树立了一座事迹碑，记录了他光辉的一生和战斗的一生，供人们瞻仰。丁益三的一生尽管很短暂，但他留给我们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鼓舞着榆中人民奋勇前进！

（作者系中共榆中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



武山秧歌

陆胤 唐吉林



武山秧歌是民间歌舞演唱艺术的一朵绚丽山花,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风情浓郁,生活气息浓厚,唱腔质朴,艺术性高,被誉为“元杂剧的活标本”。秧歌也叫“社火”,每年春节期间,武山各村都有盛况空前的“耍秧歌”、“闹社火”传统习俗。

耍秧歌的目的主要有:敬神祭祖,祈安纳祥,丰富文化生活,祈祷风调雨顺,进行社事交流等等。

武山春节耍秧歌,一般经过四个阶段:吵秧歌,请神接官,正式演出,卸架。

吵秧歌。正月初三送纸(送先人)后开始酝酿,带头打锣、钹、鼓乐器者就成为秧歌头,也叫社火头、连头。由他们组织筹集资金,分配身子,公布执事榜,明确村民在耍秧歌中的任务。

请神接官。通常在正月初九即天爷(玉皇大帝)生日,推选村上有威望的老人作春官(还有衙役二人),拿上“官帽”、“官服”,敲锣打鼓,扭上秧歌到家去接。并设坛请神,乡民进香祀奉,在神坛扭秧歌,晚上在神坛耍夜秧歌。

正式演出。大多数村庄的秧歌正月初九出来后,十一日开始进院。以往各村的秧歌都要出庄,现在川区秧歌很少出庄,一般在本村演出,也参加县城汇演,山区秧歌仍然出庄演出。

秧歌出庄时,先由探马到要演出的村庄插旗

联系,外出表演的秧歌会受到村头迎接的礼遇。迎接有文接和武接之分,文接时两村高炸相互作揖后,由本村秧歌领路到预定地点演出。武接也称迎秧歌,搭高炸者一手搭高炸,一手拿佛尘,跑前相接,退后相迎,缠花稽首,看似极尽礼让相迎的盛意,实则常含“比武”结谊的韵味。高炸相迎毕,就是灯笼对灯笼,龙灯对龙灯,狮子对狮子等,举行迎接表演仪式。龙台一带武接时,由年轻人执棍护送本村秧歌,举棍摇绕,喊声雷动,前呼后拥,好不热闹。

卸驾。卸驾也叫送神。卸驾有文武两种形式,武卸,也称武送。卸架时装扮黑虎爷、孙悟空和土地爷,搭上火把,打上火面,敲锣打鼓,颇具紧张、威武之势。如家里有病人,三“神圣”用棍棒轻打,病就会好。逐户跑到后,都到神坛领香,然后大喊着跑到送神地点,连头点燃纸钱,跳过三次火堆后,静悄悄而回。到了村头装身子的卸下身子,洗了脸,把耍秧歌的器具放到神坛,一年的秧歌就结束了。

有文昌宫的村庄,不扮神圣串庄,称文卸。文卸固定在正月十七日,在文昌宫唱秧歌到时辰后,将神单取下,就地烧掉,秧歌就算圆满结束。

有些村庄卸架时,要装扮出韩湘子、灵官爷、齐天大圣、土地爷和马赵温杜邓辛张陶庞林苟必

十二位天神元帅,有设坛、熏坛、祭坛、击鼓(发梆)、点将(遣神)、逐户驱邪、送神等程序。清池村卸架除装扮上述神仙外,还有哪吒、雷部二神等共二十四位元帅,卸架的过程一样。

武山的秧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是反映历史故事的,如《皇姑打朝》《兵丁哭五更》等;二是反映神话传说的,如《盗扇》《白蛇传》等;三是反映传统戏曲内容的,如《书房相会》《华亭相会》等;四是反映生产活动的,如《摘棉花》《摘草莓》等;五是反映买卖活动的,如《银匠》《下四川》等;六是反映爱情题材的,如《粉团》《送郎君》;七是体现生活情趣的,如《转花园》《放风筝》等;八是赞美山川胜景的,如《四小景》等;九是歌颂历代清官的,如《清官颂》等。这些秧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传播,古圣先贤的崇敬,劳动创造的赞美,幸福生活的追求,生活情趣的向往。

洛门等地区唱秧歌时还盛行唱眉户、道情。滩歌地区还有白天表演的马社火。高台也是很多村庄白天表演的主要内容,武山许多村庄曾有戏班,高台文化十分浓郁。

武山秧歌唱腔多变,但主体唱法大同小异。一般有“越调”、“背宫调”。“越调”中的前越调是全曲的内容提示,后越调是全曲内容的总结。《背宫调》俗称空腔,多用虚词。《越调》、“背宫调”是秧歌的主要曲调,可随情节、演员、行当的不断变化表现欢快、喜悦、愁苦、悲伤等多种感情。

秧歌演唱时的步伐有倒八步、跑马步、十字步、进退式、风摆柳、插花步、过堂步、钻花园步、旋场步等。

秧歌以演唱为主,同时穿插跑纸马、打鞭子、跑旱船、耍龙灯、耍狮子、武术表演、耍大头等活动。

跑纸马由四个马夫和四个花旦表演,马夫先进场打一趟引马拳,然后牵引腰系纸马的花旦入场。跑马动作很多,以跑马步为主,跑一段,唱一段(跑马曲),颇具生活情趣。

打鞭子由马夫和花旦配合,手执两端镶有铜钱用红绸等装饰的竹鞭,边打边唱《四小景》,十分

欢快。

耍龙灯,有双龙也有单龙。主要动作有:二龙戏珠、黄龙抱柱、珍珠倒卷帘、白马分鬃、黄龙转身、黄龙滚身、乌龙摆尾、二龙交头等,由一人拿绣球去引,真是“生龙活虎”。

跑旱船,或为一个船姑娘,或为两个船姑娘,船似鱼形,前后左右置莲花灯,意为莲(年)年有鱼(余)。起初船姑娘由男生装扮,现在船姑娘多由女孩扮演。由一艄公搬船,跑数周后停跑摇荡而唱《慧娘》《殷满堂》或《断桥》等曲子,极为雅致精彩。

耍狮子,秧歌进院先耍狮子打开场,秧歌演出临近结束时再专场表演。狮子进场,然后静卧;引狮子的人进场表演一段武术(软拳)后惊起狮子,引狮子上桌子,打立爪,在地上打滚,乐器紧迫,演者痛快,观者酣畅。

武术表演,表演者都是本村会武术的人,有盘春秋大刀或混元刀(八门套九星)的,有耍软拳的,有舞鞭杆和棍的,老少出场,各显身手。

耍大头,大头戏柳翠是群众很喜爱的秧歌。此外,还有扭秧歌、踩高跷,这些活动主要在白天。扭秧歌(现在主要是女人)不仅白天表演,晚上也穿插进行。踩高跷是白天的活动,过去一段时间盛行,近年只有滩歌地区还盛行表演,其中技巧好的还会跌岔,演出高难度的动作,表演时边唱边演。

随着时代的进步,秧歌的内容和演出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秧歌演出也一改过去女人不能参与的传统,而且有些地方女人成了耍秧歌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耍秧歌插入女人表演的传统舞蹈和时尚歌舞,已成为渭河沿川一带秧歌的一大特色,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山旋鼓也成为近年滩歌秧歌表演的重头戏,也是县城秧歌汇演的重要内容。这些体现时代风貌的新变化、新内容,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开放精神,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了秧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秧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奇葩有了旺盛的生机,有了继承发展和发扬光大的生命力和原动力。

(作者单位:武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康乐地方名吃

马晓春

肉食

一、手抓羊肉。被认为是风味名吃清真食品中的“代表作”，具有很浓的地方色彩。选用精心喂养、膘肥肉嫩的“骗羊”，请阿訇按伊斯兰教规宰后，洗干净，投入清水盆中浸泡约30分钟，将全羊投入锅中，用旺火烧沸，撇去血沫，再加入适量花椒、生姜、小茴香、三奈、胡椒扎成调料包，用温火炖熟，捞出、凉冷，然后按不同部位块，装入大盘，随食盐、新蒜、香菜上桌而食。手抓羊肉，肉质细嫩滑爽，不油不腻，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味香喷鼻，别具风味。二、平伙羊肉。平伙羊肉的吃法及操作烹调也很别致，首先要定股份，然后把羊（即“羯羊”）拉到东家院内，宰后吊挂在树上或梯子上剥皮清理内脏，取出肝、肺、心、肠子、肚子等，洗净剁碎，放在开水锅里煮，即“羊杂碎”。然后，从羊脖子骨剁上一块“害命骨”，送给宰羊人，再剁一块肉交给揽头（操办平伙者），让他准时收齐平摊的肉钱。再按定好的股分阶数，以6大部件（即前腿、后腿、胸衩、背子、肋巴、尾巴骨），均匀的分堆摆在桌子上，要求件数缺一不可，并一份份用麻线捆好，注意一定要给东家留一份，叫做锅头份。羊皮一般留给羊主人，头蹄则留给东家。平伙羊肉分好时锅里的“羊杂碎”也就熟了。东家先把“羊杂碎”舀给吃

平伙羊肉的人们，然后把分好的羊肉放在锅内，再调入花椒、食盐、生姜、草果等作料，接着用大火煮烧。羊肉熟透了，东家把煮熟的羊肉每人一份送到吃平伙的人手中，再给每人端上一碗羊肉“清汤”。三、清汤羊肉。“清汤羊肉”是康乐城乡群众待客的上等佳肴，它是将新鲜羊肉清洗干净，放入凉水锅中用旺火烧开，打去泡沫，加进适量的盐、生姜、花椒、大葱、辣椒等作料，尔后改用文火煮熟，捞至案板，切成小薄片。将锅内肉汤舀入盆内沉淀，待渣滓沉淀，肉汤清澈透亮时再倒入锅内，将切成的肉片放入锅内肉汤中煮开，连肉带汤盛入碗内，再把事先切好的香菜、葱、蒜苗放入碗内清汤表面，便可上桌食用。四、牛杂割。系指牛的五脏六腑及头蹄，经过精心加工烹调后的牛杂割是一道人皆喜欢的丰盛早餐，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味名吃。牛杂割制作工艺精细，烹调技术性强，煮制一次要有一定的量，因此锅要大，灶台设置配套，具备相适应的作坊环境。制售牛杂割一般设有专营“杂割铺”。一般家族式经营，父业子承，很少改行，所以形成名气和特色。烹制牛杂割一般必须经过选料、清洗、烹调、兑汤、切割等环节。牛杂割必须及时清洗干净，无异味，煮熟后的原汤才能用作兑汤主料，若不及时清洗干净有异味时，煮后的

原汤一般不宜使用,杂割汤另兑。另兑时用清水、撇油,加足调料,食盐、味精等人工兑汤,但这种汤没有原汁汤味鲜。牛杂割一般用于早餐,经济实惠,味道又好,天冷时吃了热和,吃的人很多。吃牛杂割一般要泡上馍馍,以油炸麻花为最佳。吃牛杂割不但肉绵味香,而且耐饥,所以一般工薪阶层和进城农民自带干粮,吃碗牛杂割和干粮共餐,花钱少,既实惠,又耐饥,且干活有劲。五、羊肉筏子。制作极为讲究的,用新鲜全羊,先取大肠,经过多道工序整治,清洗洁净待用。再将心、肝、腰子及精选肉剁细成肉馅,拌上细切葱白、生姜末、精盐、胡椒粉,调和好,仔细灌入肠内,还可以加味精。最重要的是,精盐一定要适量,不能淡,也不能咸。之后,将灌好的肉肠,用细麻绳扎口,放入蒸笼蒸熟才算完工。将蒸熟的肉肠切成1寸段,待铁锅油热时,加葱花、鲜姜丝,入锅炒热至微黄后,盛碗,又浇上蒜泥、辣椒油、老醋,顿时香气浓郁袭人,因形似当地水上运输工具羊皮筏子而得名。特点是肥而不腻,鲜嫩味美。

面食

一、油香。是穆斯林群众的传统食品,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家家都要煎炸油香,除自己食用外,还相互馈赠亲友或阿訇。有的家里过节纪念亡人,红白喜事,接待客人也要炸油香以表尊祖继俗。“油香”是穆斯林传统的圣洁食品,吃油香要掰开,如果身边有人,应分成若干份,按照《圣训》不可一人一个直接食用。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习惯,“油香”被当作一种珍贵的食品,是待客和送礼的佳品,只有当宗教节日或办喜事或纪念亡人时才做。油香以面粉加酵母,用温开水和好。发酵后的面用碱水中和后掺进鸡蛋等辅料,在案板上揉好后摊成碗口大小的圆饼,表面划二三条刀纹,然后放在锅内用香油炸熟,色红松软,味美醇香。油香表皮容易炸焦,所以有“慢火炸油香、两面都发亮”,“爆油炸油香、里生皮焦不发亮”的说法。

二、馓子。是一种油炸面食,是穆斯林群众风味名点之一。在欢度的古尔邦节、尔德节、圣纪节,以及婚丧大事中,都把馓子作为待客的主要面食品。“炸油香、从头学、回回的馓子是一绝”,这是人们夸赞回族馓子和喝盖碗茶的诗句。馓子以股条细

匀、香酥脆甜、金黄亮润、轻巧美观着著,深受人们青睐。因股条细而松散得名,据说始于南北朝时,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诗赞美馓子:“纤手搓成玉数条,碧油炸出嫩黄深,夜业春水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诗人把金黄色的馓子比作佳人臂上的金钗,说是由于晚来嗜睡不小心压扁了,真是浪漫动人。油炸馓子要有娴熟的技巧,和面前先熬一锅放有一定比例量的花椒、红糖、蜂蜜的开水,冷却后再将面粉和成面团,在案板上反复揉压,使面团又软又劲富有弹性。然后切成小块,再碾成筷子粗的面条,拌少许食油放入,醒面到一定程度烧油锅,以纯胡麻油为佳。油沸腾时,掌锅人将搓好的馓坯,套在筷子上边摆边扯,放入油锅,馓子炸硬时即可抽出筷子,再炸成棕黄色即成。油馓子,造型独特,有麻花馓子、细股馓子、酥馓子,各有风味。油馓子色泽黄亮,香脆味甘。每逢春节,有的汉族人家也请少数民族邻里巧手帮做油馓子,用以招待兄弟民族客人,可见馓子亦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喜爱的名点美食了。另外,还有一种叫酥馓,其做法和上述馓子相似。还有麻花、花果子等清真面点。

三、馍馍。是回族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油炸面点,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先以蛋清、蜂蜜和出浅黄色的面,再以酃茶、红糖、枣泥为料和出褐色面,然后将浅黄与褐色面迭合一起,高超者会捏出孔雀、锦鸡、蝴蝶、蜻蜓、荷花、石榴、秋菊、如意、灵芝、鼈草等形状各异图案各异的馍馍,又称为嵌花馍馍。

四、麻浮包。其原料有白面、麻子、洋芋、葱、盐、味精、花椒、碱面等。麻子要捣碎捣细,置入开水锅中搅拌,及时将泛起的白沫舀出另置,继续加凉水搅动,将泛起的白沫舀出,直到不再泛起白沫。舀出的白沫就是麻浮,即麻子油面脂。把洋芋煮熟剥皮,将其和麻浮共拌,加入葱花、盐、花椒粉、味精揉匀,成麻浮馅。然后将面叶展开,置入馅子,旋捏成包,上笼蒸熟,滋味之鲜美,难以言说。

五、浆水面。浆水面的吃法多种多样,如浆水面片、浆水面条、浆水花面旗花等。可素食,用清油将葱末炒成葱花,用野葱花炆浆水,其味更佳。然后调入浆水滚沸,象浇臊子一样拌面吃,其味清淡适宜,也可

把浆水直接调入锅中,做成“一锅面”吃。浆水面的另一种吃法,是跟牛羊肉相配,将新鲜牛羊肉剁成肉末,同样用清油将葱和牛肉爆炒,再倒入浆水滚沸,用来拌面,牛肉火大,浆水性凉,二者合一,正好中和。特别是在盛夏,不吃肉嘴馋,想吃肉又嫌腻,于是牛肉浆水而这样的独特吃法,馋与腻的矛盾迎刃而解。六、花而饭。康乐适合种植生长期较短的荞麦和豆类。当地群众为改善这种杂粮的粘性和味道,将其按比例混合后,加工成一种新面粉—花面。花面营养丰富,适合做成浆水面、臊子面、菜叶面,清淡爽口、开胃解腻的一道辅助餐。

甜食

甜醅亦称甜麦子,是民间流传下来以原粮为主料,经过加工酿造后制成的甜点食品。甜麦子制作时,将原料去皮,理净。煮熟沥干、凉温,撒入甜酒曲拌匀后放置器皿发酵,产生浓烈的醇香味时即可食用,食时加少量水和白糖,味道更佳。吃起来醇香浓郁,酸酸甜甜。甜麦子原料除小燕麦外,亦可用青稞、小麦等酿制。甜食还有糖包子(馅为白糖或红糖与生羊油、葡萄干、花生米等混拌),糖油糕等。

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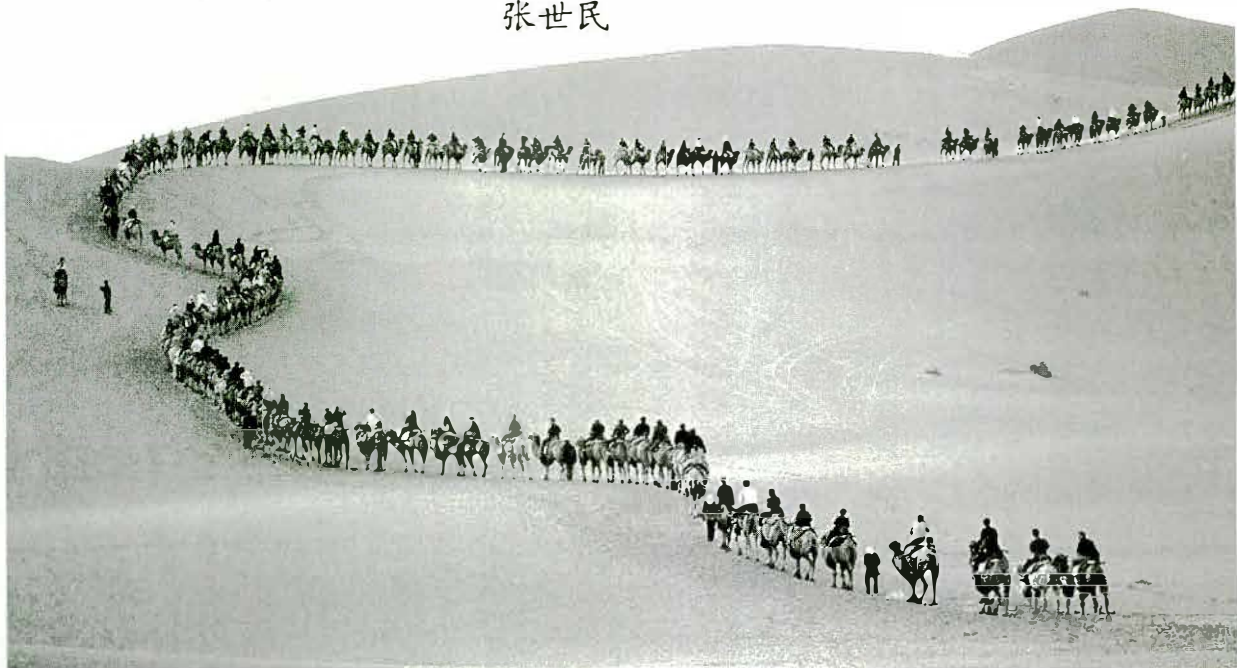
一、“酿皮子”。是夏令食品中的佼佼者,是一道用面粉制成的食品。制作时面粉加水合成硬团,然后在清水中揉搓,使面粉中的蛋白质和淀粉分离。面粉中的蛋白质,俗称面筋,被分离出来后,另外放置。游离于水中的淀粉,待其沉淀于容器底部后,调成稀糊状,随即舀入大平底盘中,上笼蒸熟,成薄圆片形,待凉后缕切成条即成。面筋则另外蒸熟,切成薄片,随碗搭配入内。食用时,将切好的酿皮,上面放几块面筋,再伴上青蒜、椒盐、芥末、辣油、醋等佐料。看起来色泽鲜亮吃起来质地柔筋,咸、酸、香、辣、鲜五味俱全,使人食欲大振,愈嚼愈香。酿皮子价廉物美,其味独特,既可当零食小吃,也可当作主食来用。这种凉食面制品,在夏秋炎热天气,极受人们喜爱。二、搅团。清爽可口,为人所偏爱。“花儿”赞:“油泼辣子油泼蒜,辣辣的吃一碗搅团”。做搅团有许多讲究,所用面粉必须是粗粮豆面、玉米面、荞麦面、熟洋芋(马铃薯),搅团以白

豆面被为上乘。做搅团时,先在锅中倒入水,等烧开加入少许精碱,一边搅和,一边将豆面均匀撒入,直到把面搅作一团,不沾锅底为适中。然后尽力搅拌,谨防面团藏在其中,再倒入适量的开水,盖上锅盖,用温火慢慢闷烧,让面全部熟透,再行搅拌,令其柔韧。至此,搅团就算做成了。舀入盘中,用勺背抹得薄而平滑,浇上陈年老醋、辣油、蒜泥,便可食用。吃起来光滑如鱼,酸辣可口,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萦绕口中,让人回味无穷。也有人喜欢浇上浆水吃,还有人在吃搅团时,浇上用土豆丁和羊肉沫做的臊子,其味甚绝。三、撒饭。所用面粉跟搅团一样,做法也相似,只是比搅团稀得多。宜加入土豆块、肉丁之类的食物,舀入碗中,浇上辣油,调上咸菜,很好吃。特别是在天阴下雨,或是在寒冬腊月,吃一碗烫烫的撒饭,周身顿觉烘热,精神为之一振,不愧是一种极好的冬令食品。四、浆水。做法是先准备好一只坛子,舀一碗现成的浆水倒入其中做发酵引子用,再把新鲜的芹菜(山区则多菜挖苦苣菜)、萝卜、土豆、紫花苜蓿等蔬菜洗干净了煮熟,勾少许而水,稍晾一会儿倒进坛子里,搅匀了把坛盖封好。冬天用棉被捂住,放在火炉旁,夏天就不必了,两三天后启开坛盖,浆水就算做成了。浆水菜既可做饭,又可充当饮料,是极好的夏令食品,不仅能去热消暑,解酒除油腻,而且具有帮助消化,清肠利尿之功效。在酷暑盛夏,喝上一两碗浆水,或者吃上一碗浆水面,立即会感到清凉爽快,还能解除疲劳,恢复体力。每当喜庆节日,酩酊大醉之时,吃顿浆水面,即可解酒开胃。浆水对某些疾病也有疗效,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浆水,能起到清血脂、降血压的作用。对便秘浆水也有特种疗效。医院还用浆水配合药物,治疗烧伤病人,效果甚好。五、凉粉。是夏秋季节人们最爱吃的一种凉食,将豆类淀粉或荞面粉用凉水搅匀,搅撒入有盐和明矾底开水锅中,成糊状,能立住筷子后,烧煮十分钟左右即成。然后再盛入用凉开水冲洗过而未擦干的瓷盆凉透,待全部凉后切成条状或块状盛入碗碟中,调以蒜泥、油泼辣子、醋或浆水、盐等调料后食用。其形色清白透明,润滑柔软,食后辣香满腹,散热爽身,可谓盛夏酷暑中的凉食之一。

(作者系康乐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西行敦煌

张世民



一

从兰州到敦煌，路经著名的河西走廊。河西者，黄河以西是也。走廊者，深深的庭院，深深的过道之谓也。可是河西走廊，竟像那“长虫的肚子”——深不可及。从西安到兰州，乘坐列车，也就七八个小时；而从兰州到嘉峪关，竟然摇摇晃晃地，要走整整一个对时还多。所以，要乘坐列车从西安抵达敦煌，兰州决不是中转站，而仅仅是河西走廊的前哨站。

在茫茫的暮色中，我们告别兰州、告别黄河，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而在熹微的晨光中，我们又抵达了河西走廊的一个重要关口：嘉峪关。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一条长长的绿色长廊，沿着河西走廊中的绿洲，早在秦汉时期的人们就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汉家政权与西域列国的交界地带，恰恰就在这个大沙漠的边缘。嘉峪关、玉门关、阳关，其实都是河西走廊上的一道道军事重

镇。从今天的地貌来看，这里早已是一片沙国，荒凉、悲悯与穷极视野的黑色戈壁，以及牢锁两岸的祁连山、马鬃山，都让人们难免产生“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联想。

在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成为祖国的一部分，唐王朝的有效统治已经延伸到帕米尔高原，站在高原之端，是可以与新崛起的波斯人、大食人分割天下的。高原之巅的中亚地区，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各种势力的潮涌潮动，乃至在兵戈铁马之间达成的势力均衡，都促使着众多的军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站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读到了苍茫与恢弘，读到了伟大与雄壮，读到了铁血与文章，但从一个个兵哥哥与孀妹妹的离情别绪中，我们又读到了一种忧伤一种别绪一种离情一种怅惘，读到了宏观叙事之下那渺小的水滴渺茫的个体飘渺的生命和飘忽的眼神……

嘉峪关、玉门关、阳关，如今早已沉浸在空旷

的沙漠之中。在茫茫的大戈壁,偶尔会出现一片绿色、一派绿洲,我知道,那是捍卫水源的结果,更是种植绿色的结果。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茫茫的戈壁是如此平整,以致允许数百辆汽车并排而行,一个盲人司机也能掌握方向盘;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点点的绿色如此重要,以致有了绿色就有了生命,没有了绿色生命既要枯萎,生态就要灭绝;一片片的骆驼刺,既是顽强的使者,更是宝贵的财富。有了点点的绿色骆驼刺,才有了骆驼的生存,才有了茫茫沙海中的叮咚驼队,才有了中西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的丝绸之路!

二

下榻嘉峪关市。这里是中国西部的一座沙漠城市,其设市的基础,在于开发祁连山麓的石油和矿产。一座十五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有十万矿冶工人;一座茫茫戈壁中的城市,竟然要在种植绿色的进程中立足。想到南方,人们有时会感觉绿色的单调;但只有到了沙漠、戈壁、绿色的宝贵、绿色的点缀,才能够放射出夺目的靓丽与清爽。沙漠中的城市延伸,必然是绿色的延伸;沙漠中的人文环境,必然是与自然竞争的人文环境。

在嘉峪关,我们从掩映的绿色之洲中,远远地望见了嘉峪关的连绵女墙。女墙的整齐与完美,让人想到的不是前人的惨烈,而是今人的造作。为了旅游,人们在保护城墙的同时,也改造了古老的墙貌,不过巍然依旧,苍茫依旧,进入城堡之中,更有一种压抑与沉重。军事重镇、国防要塞的感觉,其实就诞生在这一瞬间。

走进嘉峪关,将军的府邸依旧存在,但是将军的袍泽早已星散;走进嘉峪关,南来的燕子依旧呢喃,可是有关戍边兵士与燕子的故事,早已成为一种沉浸中的记忆。是那些单调的军旅生活,让戍边的士兵们有了与燕子对话的机会;铁打的营盘、铁质的城门,上上下下,有十四排乳丁,锁得了岁月中行人的脚步但却无法阻断历史的流失。是啊。熠熠闪光的宝剑依然按在草莽将军的肩胛,可是这些宝剑怎么也割不断历史的联系,割不断时空的苍茫。

一颗大树站在古堡的出口。这个大树有几人合抱之粗壮,其巨大的伞盖笼罩了一片绿色的土地。据说这是有名的左公柳,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左宗棠将军西出新疆的历史见证。然而大树无语,历史有情。众多的游客走过大树之下,都愿意立此存照,拍下个人的身影。古堡是历史的参照,而大树是自然的见证。古堡是戍边战士生命的物化,大树更是戍边战士生命的延伸。我抚摸着肤色斑驳的大树,一种寄托生命、寄托感情的心思油然而生。

一瞬间,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名叫刘岩的醴泉故友,他写过一本名叫《影像人生》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沙枣树》,写的就是当年他在张掖当兵的记忆,一名战士与一棵沙枣树结下了不朽的情缘,几年服役也就留下了这篇关于沙枣树的记忆文章,其观察之细致、移情之切真,都曾让我感动。而当我与沙枣树为伍,与沙枣树作伴,我的这种友情记忆就更加深刻。

三

在玉门关,我们见证了一座矗立在戈壁上的古老城堡,烈日下的城堡在向人们诉说,而烈日下的骆驼刺,在抗拒烈日的同时,也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和黑色的颗粒献给人们的眼球。我拍摄了古堡,也拍摄了花蕾;我见证了历史,更见证了今天。古堡的旁边,是一座新造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内容有待填补,博物馆的苍茫也让人揪心。专门为了旅游者而建造一座新的戈壁博物馆,在渴望绿色的大戈壁中,怎么说都是一种奢侈,一种造作。

汽车在戈壁中位移,一会儿是茫茫的沙海,一会儿又是点点的驼草。黑色的戈壁与黄色的沙海,构成了两种交映的大漠景色。在戈壁滩中前行的车辆是如此异类,而在戈壁滩中延伸的道路是如此蜿蜒,想一想人类在戈壁沙漠中的位置,恐怕只有一种大漠游戏的感觉。

我们走进了雅丹地貌。敦煌雅丹,是狂风的产物,更是岁月的见证。在走进雅丹之际,狂风暴作,似乎是要告诉人们雅丹的起因;一座座雅丹荒丘,以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千颜万色的形貌,展现在

人们的眼前,展现在戈壁之上。鹤舞翔天,舰队出发,狮身人面,婀娜多姿,奇巧绝伦。在漫漫的沙海中,游客们奔走摄影,叫嚣前涌,摆出了各种姿态,与自然对话,与心灵对话,更与形形色色的天公造型对话。

告别是不由人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从爆裂的阳光中,走进玉门关下的农舍,仍然酸涩的葡萄架上,挂满了丰收的笑脸;来自远方的客人,与屯戍阳关的人们,有了一席热烈的对话。荒凉之上,竟然是主人的富足。这里的农民们,住在敦煌却生活在阳关,如候鸟般安排自身的生活情境,也使我们这些初游的人们感到惊诧。

我想亲自到阳关去,攀登一下那里的汉代烽燧,可是酷暑阳光中的游客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涉足的向往。在夜幕中告别阳关,旅游大巴并未走上“独木桥”,而是沿着高速公路,向远方的目的地——敦煌开去。

四

敦煌,是我沙漠中的一个偶像。敦煌,更是外空间的一种符号。

造访敦煌,曾是我年轻时的梦想;而再到敦煌,更是我不敢设想的梦呓。

早在九年前,我从西藏阿里归来,穿越了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从乌鲁木齐乘坐小型飞机,直抵沙漠中的敦煌。那时的敦煌市,显得如此的土气,如此的偏僻,连那街道上的人群,也都有种乡土的感觉。我当时与同行的侯姓伙伴,想在敦煌市政府找一下同行,谁知传达室的老头先挡了驾,让我装了一肚子的愤懑与怨艾;到了敦煌博物院,一连看了十个洞窟壁画,其中的大佛和画像,令人记忆犹新。飞机而来,飞机而走,几乎没有与当地的土著生活搭一点儿界。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两位南疆军区的边防军人,他们得悉我们从西藏阿里归来,在拼接而成的旅游车上马上活跃起来,中午吃饭时,一定要我们共进午餐。

这次,我们从西安到兰州,又从兰州到嘉峪关,一路上乘坐列车。从嘉峪关到敦煌,则连续乘坐大巴车,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感知,一边是巍峨壮

观的祁连山,一边是黑黢黢的马鬃山。窄窄的河西走廊,曾经走过了多少商旅,走过了多少过客,他们的荣辱悲喜,他们的驼铃叮咚,都被两岸的山脉所记忆,都被沉潜的沙海所钩沉。看到祁连山,我就想到了绵延中国中部的巨大的山带,茫茫秦岭不过是东部的余脉而已。至于马鬃山,其实与马鬃没有多少关联,主要是沙山筑起的一道道黑色的梦中山梁,让人顿生一种世外桃源的仙境感知。

临近敦煌的时候,大巴车上的导游小姐,滔滔不绝地推销起用敦煌壁画创造的民间艺术。据悉敦煌民间歌舞有两种:一种是敦煌歌舞剧院的专业杂技表演,一种是可餐、可演、可参与的民间歌舞表演。两辆大巴车上的陕西游客,大多介乎参与与不参加之间,而导游小姐的推销,更加不遗余力。

当天晚上,由于长途跋涉,人们疲倦至极,几乎没有几个人报名参加,其他的游客们乐享其中,逐渐感染大家,暂时放弃了敦煌民间舞蹈节目。

第二天,众人奔赴月牙泉观光,观赏大漠与水泉的奇特组合。有的人骑马,有的人乘车,我等一路徒步走来,赤裸着双脚在泉水边游弋。与我结伴而行的老逮,更是习惯于赤脚步行。他早年走在秦岭深处,早已适应了赤脚的环境。我曾想,当年人们将乡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恐怕正是因为一些地方的人们,并不适应穿鞋的习惯吧。

参观敦煌石窟寺,是大家最最期待的地方,却也是旅途上最最吝啬的地方。观光而不许拍照,听讲而无暇垂询,走马灯似地匆匆一过,看了八九个洞窟,听讲解员挂一漏万的点评,我们也就茅帘草舍般地走进了历史的空间。除了必看的睡佛之外,两岸的菩萨胁从,以及众多舞姿翩迁的飞天造像,都鱼贯般地投入了人们的视野。或世俗,或典雅,在彼此和谐与含蓄中,人们终于告别敦煌而踏上东归之路。

再到敦煌,城市变了而壁画没有变,佛窟变了而佛陀没有变……记忆中的敦煌是肤浅的、荒凉的,而生活中的敦煌是慷慨的、喧嚣的。从敦煌出发抵达兰州,我再次选择乘坐小型飞机。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全省年鉴编辑人员业务培训班在天水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年鉴工作繁荣发展，提高全省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质量，加强年鉴编辑队伍建设，2013年5月22-24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在天水市举办了首次年鉴业务培训班，来自省直部门、单位及全省州市、县区年鉴编辑人员共160多人参加了学习。

中国出版协会年鉴研究会会长、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家康，甘肃省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车满宝，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处长石为怀三位同志，分别作了题为《年鉴性质、功能和条目编写要领》《图书出版与编辑规范》《年鉴编辑应注意解决的具体问题》的辅导讲座。

在培训班开班式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做了重要讲话，对全省年鉴工作发展历程、状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围绕实现“三年逐步展开，五年实现全覆盖”的年鉴工作目标，对今后全省年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杨国泰，笔名阿凡。1953年生于甘肃天水，童年在白银市渡过、自学书画，擅长工笔人物画、山水、花鸟。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曾担任甘肃省飞天书画学会、西部书画院理事副秘书长、甘肃陇风诗书画社会员。作品曾多次参加各种书画展，在白银市等地举办个人展和三人联展，作品曾被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香港、台湾书画爱好者收藏。

